

# 阳刚气质的女性主义解读

林存秀

(山东女子学院, 山东 济南 250300)

**摘要:**当下对男性气质的忧虑变成一种普遍现象。阳刚和阴柔气质的划分,一直是父权制控制社会性别秩序的手段。阴柔化的男性气质之所以被攻击,在于其打破了内在的男性团结,挑战了既定的性别规范。父权制除了依靠政治和经济上整套完整的体制外,还有情感文化上的“恐惧-控制”机制。我们倾向于不假思索地按照既定的游戏规则走“阻力最小的路”,但这种做法既伤害了女性也伤害了男性。要触及到父权制下两性气质的根本问题,必须把男性气质也纳入到性别研究的范畴。

**关键词:**男性气质;恐惧-控制机制;父权制

**中图分类号:**C913.6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838(2019)01-0001-05

人们可以像带儿子一样带大他们的女儿,但几乎没有人敢像带女儿一样带大儿子。

## 一、隐而不见的男性性别

在女性和性别议题中,往往不把男性性别作为讨论的中心,使得男性性别隐而不见。其实,父权比较多的是关心男人之间发生了什么事,女人受压迫当然是父权体制中重要的一部分,但矛盾的是,它却不是父权体制的重点。如果我们不从这个视角来看,很多问题其实切不到性别压迫的实质和要害。例如当下对男性阴柔气质的讨论,往往谴责其气质女性化,而问题的根本则是对男性气质的担忧。当下制造的阳刚气质危机,以及对阴柔气质的攻击变成非常普遍的现象。诸如所谓“伪娘”“娘炮”等词语,其本身就含有文化建构的痕迹,含有性别歧视的涵义。我们不带着偏见来看,这些人也可以是指背叛了普遍意义上的男性气质的人群。在父权制下,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的划分,成为性别控制的手段。阳刚、

勇敢、果断、有事业心是既定的男性气质;而女性拥有的则是娇小、柔美、温柔等具有阴性的、没有威胁性的气质。与这两种气质相对应的,是社会生活中公私内外的性别分工。如果对这种两分法进行挑战,就会受到惩罚和攻击。例如有些男性不愿意接受这种控制与支配的游戏,爱和女生玩在一起,想回避具有攻击性的行为,不想加入嘲弄女性的行列。他们或者不太敢于尝试,情感很敏感、脆弱,这些背叛了男性性别气质的行为,就会受到惩罚,而且惩罚是非常厉害的,会被叫“怪胎”,受到侮辱和挑衅。所以一些性格偏向安静的男生常常遭到校园欺凌。究其原因,是因为这种消弭男性气质、破坏男性团结的行为,触到了男性的“阿喀琉斯之踵”。大多数的男人在早年就学会借由挑战锻炼男性气质来提升自己,这几乎是无所不在的一种社会现象。相比而言,女人偏离阴柔特质时,社会上的反应则大不相同。女生着男装,被认为是认同男性,是社会上可以

接受也是被优势集团认同的行为。

另一方面,性别议题常常被看作是女性和从女性自身来考虑,将压迫定义为受压迫的人的问题,这种做法跟压迫本身一样长久和古老。男性性别及其气质特质越是不被看见,例如暴力和歧视等性别问题,就越容易跟女人划上等号,我们也就越不容易去正视父权体制作作为一种压迫系统的存在。例如,我们常常在新闻上看到各种男人犯下的罪行:殴妻、尾随跟踪、谋杀,以及因对社会不满而在大街上砍人等,我们却很难听到简单明了的陈述:这些暴力几乎都是男人干的。我们也不会去认真想,男人如此普遍地使用暴力,为我们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提供了什么样的线索。例如,思考男人主导的行事法则是不是和暴力的使用有关;也没有人建议,应该有一种方法,限制男人伤害他人的机会。

男性性别的隐而不见,使得我们仅仅停留在这些问题的表面,而看不到父权制的运作及其性别政治。在1970年出版的《性政治》一书中,Kate Millett使用了“性别政治”这个概念。通常政治指的是政府、政党、社会团体和个人在内政及国际关系方面的活动。但这里政治的定义为,“将权力结构化的关系和安排”<sup>[1]</sup>。这种权力是日常生活中一种隐性、流动、网状的权力关系,通过话语和知识的运作来产生。性别政治的概念提醒我们,要去质疑一般人视为理所当然、天经地义的想法或价值规范。思考性别问题时,若能留意到社会上针对男性与女性存在的差别待遇,就不难发现性别政治运作的痕迹。所以我们不应受限于传统的角度,反倒应该以自身经验为基础,正视权力关系和其运作,及其对个人所造成的影响。

第二波女权主义运动中,一个响亮的口号是“个人的就是政治的”。女权主义者们对等级制度非常敏感,认为这是对人类性格、人际关系的破坏。同时又指出,对于这种制度的控诉,不应该过度聚焦于女性的受害地位,而应该对男性权威进行政治批判。这种批判也不是简单地对资本主义体系的批判,而是构建一种新型的女性价值观和文化,在女性文化中,努力消除等级、限制

和压迫,强调通过建立可以替换的机构促进社会进步。在女性文化构建的社区中,一种真诚的人际关系将改变人们的隶属关系。人们相互了解,经常碰面,形成一种完整而不疏远的亲密关系。随着这种组织的增多,也会变成一种社会变革的力量。如果这种小的实验性的团体,变成在大社会中的权力交往模式,那么,个人的也就可以转变为政治的。但是,这种以姐妹情谊为基础的空间建构,在父权制的包围中,只是一个乌托邦的幻想。必须正视父权制作为一种压迫系统的存在,并且要从根本上去认识它。对于父权制的分析,从经济和政治角度的论述已经很多,但是从文化和心理上的论述尚不多见。父权制文化在精神上,存在一种控制和恐惧交替的机制。

## 二、父权制下的恐惧和控制机制

父权体制的真面目是什么?父权体制是指一种社会,而社会指的不只是一群人而已。既然如此,父权体制不是指个体男人或者男人的集体,而是一种男人和女人都参与其中的社会。一个社会是父权的,就是它有某种程度上的男性支配、男性认同和男性中心<sup>[2]</sup>。如果把父权体制比作一棵大树,那么大树的根就是控制和支配的核心价值信念,原则就是男性支配、男性认同和男性中心。树的干是制度层面的,如经济制度、国家政权和家庭结构;而叶是我们参与体系的每个人,以及组成我们每个人生活模式的团体、组织、社群、商业、工作团队、学校等等。树干是强大的,从根系不断汲取营养,加强父权观念,但是树缺少了叶子也会慢慢枯萎。

简单地说,男性支配,就是男性处于权威的位置。在政治、经济、司法、宗教、教育、军事、家庭内部,一般都是男人占据主导权。男性支配制造了男女之间的权力差异,在这个体系中,男人不但可以获得较多的收入和财富,还可凭借这种优势地位,形塑那些反映并服务他们集团利益的文化。例如可以控制电影和电视内容,借由大众传媒,在性骚扰案件中,使得受审的不是加害者而是受害者。尽管偶尔有少数几个女人在权力机关充当门面,但整体而言,男人是被举认为优越的群体。在这个意义下,尽管男人在个人生活

中未必有很大的权力,但是在父权制社会中,男性对权威的垄断加强了每个男人对女人的优势关系。男性认同,就又一次牵扯到阳刚和阴柔气质的问题。尽管阳刚和阴柔气质也是在社会化中形成的,但是两种气质却被赋予了不同的价值。阳刚气质被认为是契合社会核心价值的。这些控制、竞争、决断的气质,与父权制社会和工作价值相关,例如商业、政治、战争、运动、法律和医学。相反,同情、照顾、合作、脆弱等气质被认为是与阴柔和女性相联系的,并且被极度贬低。

总之,控制是父权体系的基础,是整个社会组成的核心原则。而从情感和情绪的因素来讲,促使父权制成为一个循环体系的,是控制与恐惧之间的动态关系。父权制一方面鼓励男人寻求安全感、地位和其他通过控制所得来的酬赏,男人控制女人成为父权式男子气概的精髓,但是,另一方面,男人却又时刻恐惧其他男人有控制并伤害他们的能力。和控制不一样,恐惧可能是人类最有力和最原始的动机,没有一样东西比恐惧更能使我们扭曲得不成人形。最强有力的压迫系统,就是那些组织起来以便引发恐惧的体系。女人有许多害怕男人的理由,但是这并非是形塑和定义父权制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原因。男人害怕其他男人才是重点。父权制之所以被驱动,是靠男人如何引发父权以及如何对它作出回应。

矛盾的是,在父权制下,控制是他们恐惧的源头,也是他们唯一可以解决恐惧的方法,这逐渐变成一种循环。男人借此重新定义亲密关系,他们被鼓励将每件事和每个人都视为他者。但可悲的是,父权建立的“弥天大谎”对于社会需求的解决之道是脱离社会关系和掌有控制权,而不是建立关系、分享与合作。我们同时也发现,正是父权制的男性控制-恐惧造成对女性的暴力和压迫。

父权制度是如何捍卫和维系的?其中一个关键的方式,就是付诸战争的神秘。父权制的宣传体系主张,为了要保卫社会与家庭,男人必须要有攻击性,并发展出暴力的能力。这种暴力的男人作为保护者的形象是与父权结合的,男人行使暴力的能力与攻击性不可避免地将导致男人对于女人、小孩与财产的宰制,因为男人必须比

他们所保卫的人更有力。战争的存在,也是因为父权特质及与其作连结的控制结构有这个需求。

用战争来正当化父权体制与男性宰制,需要用战争的浪漫形象来美化,例如正义、自我牺牲。但是我们知道这与真正的战争和男人并不符合,自我牺牲并不是父权文化中所重视的男性主流气质。事实上,两次世界大战及殖民主义的侵略战争,都不是男人对女人和孩子的爱和责任,事实上,在战争中,死亡最多的不是士兵,而是妇女和儿童。自由和独立才是父权反抗女神宗教及其男人受“自然奴役”的关键。战争只是男人用来实现“荣誉”与“英雄主义”的工具,他们以英雄式的暴力来捍卫女人、小孩、领土、荣誉以及其他受害者,这是一种展现特殊男性气质的版本。那些被保护的人并不重要,而这也是为什么女性的经验很少成为关注焦点的原因。

战争是恐惧和控制的父权体制的极端表现,而日常生活中的男性暴力行为,就是这种文化的副产品。社会上之所以对所谓的“娘炮文化”进行攻击,就是因为这种气质破坏了父权制中阳刚气质的界定,破坏了男性气质的团结。在父权之下,女人被视为擅长处理情感生活——有同情心、敏感,而且善于与人建立关系,懂得照顾别人,这些特质都是超越于“控制-恐惧”这个无解循环的。但是,支持女性压迫的父权意识形态,却竭力贬损这种人类特征,并将其放在低等的位置上。

### 三、不走阻力最小的路

对于各种性别问题,我们应该如何解决,或者如何寻找解释的途径?我们倾向于“走阻力最小的路”,但却忽视了问题,且延续和加固了父权制的运转。父权是一种体制,它提供了阻力最小的路,以无声无息的方式,鼓励男人接受自己的性别优势以及对女性的持续压迫。它提供的是阻力最小的路,也鼓励女人接受和适应她们受压迫的地位,这在某种程度上会削弱妇女运动带来的改变。

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都认同既定体制下的角色扮演,将会受到比较小的阻力。在父权制体制下,男性得到很多好处,例如支配和控制的地

位,在经济和政治上的主导地位等。他们的自信、力量和自尊,也可以在更为弱小的女性和儿童那里得到维护。正是因为“我们”(女性)安于这些固定的“好处”,父权体系才可以不停地运转下去。没有“我们”,父权体制就不可能发生。性别歧视和种族歧视等社会问题,不是由于“坏人”的过错,或者是没有好人的“坏体制”所致。相反,社会问题会产生是由于体系和人们持续作用的结果,这是一个形塑社会生活的螺旋过程。它不是由男性或体系本身所单独造成的,而是男女两性共同造就而成,若想要改变它,就不能不同时注意两者。

在这一点上,自由主义女性主义就不能给我们提供解决之路了。例如,自由主义女性主义宁愿争取女人加入军队的权利,而不去质疑战争作为一种国际关系的手段。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的基本问题是,由于它太聚焦于个人,使它无视社会体系的力量,这也是为什么女性主义从不把父权视为需要认真对待的原因。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缺乏历史观点带来的严重后果,使得父权成为一个影子概念,没有成为真正的分析对象来帮助我们了解性别的意义。回避父权与压迫也符合自由主义女性主义将焦点放在个人,视其为人类生活的全部,而没有注意到感情、动机、想法和行为都是因参与了像父权这样大的社会脉络而深受形塑这样的特点。另外,自由主义女性主义单纯地将焦点放在女人与男人平等的权利上,以男人的方式来做男人做的事,而并没有去质疑这个世界的组织方式。也即,其目的不是拆解宰制者的房子,而是把门破坏之后进驻到房子里面去。

父权体制最吊诡微妙的情况是,虽然它独尊男性,但是很多男性却很难感受到自己生活中的优越,并且感到当个男人需要付出相当大的代价。这是因为一个把控制视为最高价值的人,无法去处理任何可能弱化或戳破控制表象的关系,因此,这样的人几乎无法建立亲密关系、平等关系或是信任关系,因为这些关系都需要以放弃那些控制感为前提。父权男性的形象,也让男性失去生命的核心,即生命最重要的价值:欢乐、爱、亲密、分享和共处。当男人觉得自己不够重要的

时候,阻力最小的路也是责怪女人,这比挑战父权制要容易得多。男人不去检视父权体制,理解自己在其中的位置,而是殴打、强暴、折磨、谋害、压迫女人和小孩,以及男人彼此;男人发动愚蠢的战争,把自己送上杀戮的战场。男人所欠缺的不是女人拿走的,也不能靠女人把它还回来。

同样,对于女性来说,尽管暂时可以从阻力最小的路中得到好处:如果女性接受被设定的角色,放弃“自由”,接受被保护的角色,就会得到明显的好处,即可以避去承担真实“存在”的压力,看起来几乎不必为自己的生活负担了,但正如波伏娃在《第二性》中讲到的,人可以放弃自由,然而,明明是主体,却接受他者的角色,往往会引起沮丧和精神分裂<sup>[3]</sup>。在父权制下,女人有独立的成就与其设定的女性气质是相冲突的,因为“真正的女人”必须是客体。

在大众文化的时代,媒体对于性别文化的传播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很多人对女权主义的了解仅仅源自媒体的报道,但是媒体中充斥的却都是对女性主义的反挫力量。反挫力量并非是某个组织主控,被利用的人也往往浑然不觉,有些男权思想重的人甚至还自认为是女权主义者。大部分反挫行动都是分散的个别事例,并无一贯的目标或者做法,而且整体来看,都是把男性和女性推回“能令人接受”的角色,或者是父亲的好女儿,或是招蜂引蝶的多情女子,或者是贤妻良母,或者是被动的爱情玩物。而男性则是阳刚的、控制的,甚至是暴力的角色。反挫势力会化明为暗,同时带上各种面具:有些是虚情假意地表示关心,有些抱着看热闹的心态。它采取分化手段,使单身和已婚女性对立,职业女性和家庭主妇对立,中产阶层和劳工阶层妇女对立。它凸显遵守其规范的女性,贬抑孤立不听话的女性,把古老的神话包装成新发现加以鼓吹。若遭到指责,它便否定自身的存在,消失无形,并以更隐蔽的方式,对女性主义大加鞭笞<sup>[4]</sup>。例如在美国的1990年代,席卷媒体的对女性主义的“反挫”力量,变成美国知识界与社会大众潮流背离的一大奇观。报章杂志、电影电视等传播媒介,刻意制造一种“都是女权惹的祸”的论调。在反挫势

力的宣传下,一些成功的女性为求得社会生存,反而亟于塑造并不在乎事业成就的形象,有些人则宣告退出妇运领域,只剩下少数的女性主义者在苦苦奋争。在60%以上中国女性参加工作,性别关系日趋平等的今天,也要警惕这种对女性地位提升的反挫和回潮。

#### 四、结语

媒体对于妇女研究“回潮”的反应,表达了主流社会对巨大的社会变化的惊恐不安,特别是两性关系的变化,妇女地位的提升,对成长在传统价值社会中的男人和女人来说,有很大的直接的利益冲击。这些年来,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女研究生数量的增加等,都制造出一种阴盛阳衰的假象。而且并不是每一个女性都对自己地位的提升或者变化表示欣喜。那些接受了传统价值观念的妇女,并不欢迎自己地位的变化,对变化的恐惧使得她们对妇女研究特别是女权主义很有抵触。

对男性来说,妇女研究挑战了他们生存的每一个条件,面对巨大的两性关系的变革,他们失去的是很多过去认为理所当然的特权。失去特权对每一个男性都是挑战,并不是每个男人都能平静地接受性别特权的丧失。在攻击女权主义

的理论中,有些男性就是从自己特权岌岌可危的恐惧出发的。回潮发生的媒体效应在社会上对女权主义理论,以及妇女研究者的形象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一般没有经过任何妇女研究学术训练或女权主义理论学习的人,很容易被媒体的宣传操纵,他们对道听途说来的一知半解更感兴趣。

要找到父权的出路,迟早需要男性的加入。只要女性主义谈的是父权,男人就有潜力贡献许多的经验和不同的分析角度。另外,对女性主义的各种反挫表明,性别特权围绕着一股隐晦的男性连结,它是推动改变最大的阻力。在某种程度上,不同阶层、种族以及身份的男性连结的力量不太可能被削弱,除非男性想做些什么来改变。如果男性和女性可以公开合作,一起对抗父权制度和文化,事情就会戏剧性地改变,各种性别迷思就会被打破。尽管拆除父权的“违章建筑”,可能还是没有触及到体制的根本,但是在当下,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都能行动起来,积极去改变父权价值和男性特权的组织方式,以及日常生活中的一点一滴,也会渐渐推动大的改变。这对每个个体来说,也有极大的意义。

#### [参考文献]

- [1] 凯特·米利特. 性政治[M]. 宋文伟,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32-34.
- [2] ALLAN G. JOANSON. 性别打结:拆除父权违建[M]. 成令方,等,译. 台北:群学出版有限公司,2008:22.
- [3] 顾燕翎. 女性主义理论与流派[M]. 台北:女书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16:101-102.
- [4] SUSAN FALUDI. 反挫:谁与女人为敌?[M]. 顾淑馨,译. 台北:自立晚报社文化出版部,1993.

## Study of Masculinity in the Perspective of Gender Politics

LIN Cun-xiu

(Shandong Women's University, Jinan 250300, China)

**Abstract:** Nowadays, there is a heated debate about male masculinity crisis on media. The division of masculinity and femininity has always been an important way for the patriarchal system to control the society. The effeminate men have been attacked because they destroyed the unity of male power and challenged gender order. In addition to the politics and economy control, patriarchy also relies on fear-control mechanism. People tend to choose the path along which we will encounter the least resistance, yet it is harmful to both gender. We should put masculinity into gender studies, then, we may be able to approach the basic issues.

**Key words:** masculinity; fear-control mechanism; patriarchy

(责任编辑 鲁玉玲)

· 性别平等理论研究 ·

# 论女性主义立场 对马克思主义立场论的创造性转化

左兴玲

(玉溪师范学院, 云南 玉溪 653100)

**摘要:**肇始于20世纪70年代的女性主义立场论,是在继承和转化马克思主义立场论的基础上逐步创立的。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论,以及卢卡奇的阶级意识观念都强调,由于人们的阶级立场和阶级意识不同,其对社会的认识和改造方式也会各不相同。马克思主义的这种立场论观念被女性主义充分借鉴,并将阶级分析方法转变为性别分析方法,以这种方法为基础,系统揭示了女性在传统社会中的被压迫、被歧视、被边缘化的社会地位决定了女性主义对两性之间关系的认识,对劳动中的性别分工的评价,以及女性集体对自我意识的认知和理解,这与男权主义立场的认识有着根本的区别。

**关键词:**立场论;女性主义立场论;马克思主义立场论;性别分析方法

**中图分类号:**C913.6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838(2019)01-0006-07

## 一、一般立场论和马克思主义立场论

“立场”这个概念,是由女性主义立场论的提出和发展而得到彰显的。正如哈丁所言,“立场这个概念产生于妇女们进行的政治斗争,该斗争的目标是使她们所关切的事项能够反映在公共政策和影响这些政策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学科中”<sup>[1]</sup>。哈特索克也认为,立场并不是观点或看法,因为要直接把握隐藏在社会生活表层下面的“实在”,就必须从科学认识和政治需要这两个方面作出努力。由此可见,“立场”成了女性主义知识论分析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在一般意义上说,“立场”是指处于社会关系中的客观位置。作为一般的知识论,立场论指的是从一种特定的社会处境的立场出发来认知世界的理论,认为只有从恰当的“立足点”或“立场”出发,才能得到合理的知识,这种立场主要强调的是阶级、性别、种族

等不同身份在认识中的重要作用,及其对认识价值取向的影响。

立场论的理论来源最早可以追溯到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对“主奴”关系的讨论。黑格尔指出,主人是自为存在的意识,这个意识是通过另一个本质上隶属于物的意识(奴隶)而被承认的。由于对物的欲望,主人必然通过物间接与另一个意识发生关联,正是这种关系使得奴隶成为奴隶。与此同时,因为奴隶被主人允许对物进行加工改造,获得了物的独立性,奴隶就能借此使主人依赖于自身<sup>[2]</sup>。以此观之,从奴隶主活动的角度看,奴隶按奴隶主的意志行事,是没有独立意识的人,但从奴隶的生活角度看,他们所从事的生产活动却在制约着奴隶主的生活。从二者的辩证关系看,主奴对同一对象的理论视角是相反的,由于奴隶主只看到奴隶所提供的劳动并直

收稿日期:2018-10-21

作者简介:左兴玲,女,玉溪师范学院教师教育学院教师,博士,主要从事女性主义哲学研究。

接享受其成果,对劳动过程与奴隶依附的复杂关系视而不见,因此对生产关系乃至整个社会关系的理解是简单和片面的。与此不同,奴隶直接参与生产过程,同时也了解主人在物质上完全依附自己,因此对生产关系乃至整个社会关系反而可能有更为全面的理解。在立场论看来,所有社会群体和个人都有自己观察社会的视角,每种视角又都有其自身的局限性,尽管如此,一些视角的局限性明显大于另一些视角,这是因为在等级制度中,统治者为了维护其支配地位和既得利益,对社会现实的歪曲程度比那些在权力关系中获得较少利益的被统治者更为严重<sup>[3]</sup>。

以此为前提,哈丁将立场论所关注的核心主题作了如下更为清晰的概括:其一,揭示社会物质生活等因素是如何影响认识活动的;其二,论证社会等级和阶级对立,以及人们对同一个事物产生相反的理解的原因;其三,思考压迫者和统治者的错误认识之所以能够付诸现实的社会制度或结构原因,因此,必须将压迫者和被压迫者的对立立场统一起来进行研究;最后,获得与自己的社会地位相统一的立场会带来解放的可能性<sup>[4]</sup>。从这个意义上说,“立场”的确立其实是对主流话语霸权的质疑和挑战,同时也提出了重新理解现实社会关系的新途径。在立场论者看来,从边缘群体的立场出发,能够提供深藏在表层内部的社会知识,揭示造成和推动不平等社会现象的根本原因;能够提供对人类潜能的更好的认识,在压迫者竭力将当前的社会不平等描绘成自然事实和真理的地方,被压迫者的立场却能洞察出这种不平等其实是历史文化因素所致,进而积极展现出它们可以被克服的可能性出路,提供一幅能惠及普遍人类利益和社会进步的世界图景。

然而,实现立场论所描绘的这种理想的认知图景,首先就要对如下问题作出解释和说明:(1)认知优势视角的社会定位(social location);(2)说明这种优势的范围:宣称什么问题或主题在认识上具有优越性;(3)解释产生这种具有优势的知识的社会定位因素,如社会角色、主体的身份认同等等;(4)试图说明这种认知优势的基础是什么,例如用什么理由证明这种权利是正当

的;(5)试图说明它所宣称的认识优越性的类型;(6)试图解释与这种认识优越性相关的其他视角;(7)说明获得这种视角的方法和途径,讨论特定的社会定位是否能够成为这种视角的必要和充分条件<sup>[5]</sup>。围绕着对这些问题的解答,马克思及其思想继承者提供了一种经典的立场论——基于阶级区分模式的立场论,它是女性主义立场论的理论来源之一。

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立场观是女性主义立场论的重要基础,特别是卢卡奇的无产阶级立场论对女性主义立场论的影响最为深刻。

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最具有创建性的思想之一,其核心观点认为人类的文化和社会根植于一定的物质基础,它“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已有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只有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从物质实践出发才能合理地解释各种观念和社会形态”<sup>[6]</sup>。马克思在其《政治经济学批判》(1859年)序言中指出,不是人的意识决定他的存在,而是他的社会存在决定他的意识。他进一步强调一个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意识由统治阶级的经济利益所决定,在资本主义时代,占统治地位的是资产阶级(资本家),而无产阶级则是被统治者,处于被统治的地位。在马克思看来,区分这两个阶级的主要依据在于他们在生产方式中所处的社会地位,资产阶级就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和雇用劳动者的雇主,而无产阶级则是那些没有任何生产资料,靠出卖劳动力生存的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另一个区分依据则是阶级意识。马克思认为,只有当某个阶级意识到它自身时,它才存在,而这样的阶级意识的存在却常常意味着对另一个阶级的敌视<sup>[7]</sup>。这样的阶级意识造就了阶级成员不是从对立阶级的立场和利益出发,而是从自身的阶级利益出发来观察和认识世界。进而言之,无产阶级只有在具体的感性实践活动中才能唤醒自己的真实的阶级意识,真正意识到他们自己受压迫的境况,才能摒弃“虚假的意识”。与此同时,通过实践活动无产阶级也对自己置身其中的社会关系有了更深的认识,换言之,无产阶级通过实

践活动改造自我的同时也改造了外部环境。

基于这种阶级意识,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及其历史过程中获得了一种无产阶级的立场,他断言并论证了无产阶级立场在经济学、社会学和历史学的根本问题上都有一种认知优势。这种认知优势是由无产阶级的社会境况等客观因素所决定的:一方面,无产阶级是被统治阶级,处于被压迫的边缘地位,但同时也处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中心;另一方面,无产阶级是一种潜在的全球性阶级,代表着所有阶级潜在的集体性的自我意识。具体来说,他们所受的压迫能够使他们对社会不平等有更为清醒的认识,进而追问资本主义制度究竟为谁的利益服务;而处于生产活动的中心位置,可使他们具体经验到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关系。不仅如此,在资本主义制度中,无产阶级是保证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这使得无产阶级有反思自身阶级地位的机会,并开始将他们所处的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来认识。也就是说,无产阶级的认知模式是在与世界进行实际的生产性互动关系中得以确立的,这是一种唯物主义的知识论立场,无产阶级正是通过这种认识模式开始了解他们所置身的世界。此外,马克思宣称无产阶级将在共产主义运动中变成全球性阶级,到那时候,每个人都有着同样的阶级地位,个人同时也是集体性的统治者。因此,无产阶级具有一种集体的自我意识,与资产阶级为资本主义制度现存的秩序作辩护或至少是为这一秩序的不变性作证明的思想意识不同,无产阶级的自我意识天然就具有一种革命性和普遍性,使得他们通过自身的实践活动不断地变革现有固化了的社会关系。与此同时,也使他们更关注全人类的普遍利益,而不是特定阶级的特殊利益。从这个意义上说,无产阶级对社会的认识比资产阶级对社会的认识更具客观性与合理性。

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的区分标准,以及无产阶级的立场思想,被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卢卡奇(Georg Lukacs)进一步发展。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中,卢卡奇系统地阐述了阶级意识的内涵和无产阶级阶级意识优越性的原因,他说:“在

资产阶级社会,只有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才是纯粹的阶级。这就是说,只有它们的存在及其继续发展才完全是以近代生产过程的发展为基础的,以及只有从它们的存在条件出发,才可能设想一项组织整个社会的计划”<sup>[8]</sup>。他还指出,不同的阶级地位和阶级意识对社会结构的作用和影响也各不相同,进而形成的思想和情感也有所区别。同时,他又强调,阶级意识就是历史现实本身,“阶级意识不是个别无产者的心理意识,或他们全体的群体心理意识,而是变成为意识的对阶级历史地位的感觉……真正实践的阶级意识的力量和优势恰恰在于它能把隐藏在经济过程的相分离的征兆后面的自身的统一性看作是社会的总的发展趋势”<sup>[8]136-137</sup>。基于对资产阶级意识的批判,卢卡奇指出,在资本主义制度中,只有无产阶级的意识能够摆脱资本主义危机,能够认识到真实的社会关系的整体面貌,并能够从改变现实上来采取行动,从而实现社会的全面解放。无产阶级通过一种辩证的方法来实现这一解放的目的,它从自己的生活经验出发,找到了将主体-客体统一起来的合理的方法,因此,无产阶级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认识才是真理性的认识,而这是与无产阶级的立场分不开的。据此,卢卡奇宣称无产阶级的立场在认知上,比资产阶级的立场更具有优势性,“由无产阶级立场产生的认识,是客观上更高级的科学认识;它从方法论上使得有可能解决资产阶级时代的最伟大思想家们徒劳地企图解决的问题,它实际上就是对资本主义的恰如其分的历史的认识,这种认识是资产阶级思想永远不可能达到的”<sup>[8]251</sup>。换句话说,由于无产阶级的受压迫境况及其所处的生产活动的中心位置,使其在具体的现实的实践活动中,对以“物化规律”为基础的社会关系有着更深刻的洞察力,无产阶级立场更能清晰地反映出社会实在的真实情况,并且揭示出那些现实的潜在原因,从而实现无产阶级自身的解放。

## 二、女性主义立场论对马克思主义立场论的转化

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以及“无产阶级立场”理论对女性主义立场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主要体现在女性主义立场理论家对卢卡奇关于无产阶级立场思想的批判性继承。为了表达马克思主义与女性主义立场论之间继承与被继承的关系,哈丁把女性主义立场论称之为“后马克思主义”知识论。弗雷德里克·詹姆士(Frederic Jameson)也曾指出,女性主义立场论对马克思主义知识论遗产的借用,主要表现为对卢卡奇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和立场论的批判继承上,他说:“对卢卡奇理论最真实的传承不是在马克思主义者那儿,而是在某种女性主义理论内部被发现。在那里,《历史与阶级意识》的独特概念都被女性主义转化性地运用了,并改称为(在卢卡奇自己的用语之后)立场理论”<sup>[9]</sup>。其他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如哈特索克等也持有同样的观点。

女性主义立场论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与发展体现了二者既紧密相连又必将有所区别。总的说来,二者一脉相承的关系“在女性主义立场论所持的两个基本观点中是显而易见的:其一,认为知识是受社会境遇限制的地方性知识,所有的认识都立足于一定的社会政治立场,这一论点可以追溯至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识见;其二,妇女的立场因其处于受压迫者或他者位置而在认识社会与世界中占据更优势的地位,这一观点可以在马克思主义对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批判中发现其原型”<sup>[10]</sup>。首先,女性主义立场论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并建立了自己的批判性的知识论。从马克思的阶级分析和阶级意识出发,女性主义立场论强调“女性意识”的觉醒和主体地位的确立在自身解放中的重要地位,因此,女性意识在女性主义立场论中具有基础性的地位。其次,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的立场分析指出,知识是由占有一定的社会地位的阶级获得的,产生于特定的社会情境中,因而反映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截然不同的认识模式,资产阶级认识模式重视交换而忽略生产,将生产和交换看作是二元对立的关系。女性主义从这一观点中得到启发,发现在女性主体缺失的知识生产中,男性借助自己的统治地位,掌握了认知霸权,这样的知识论只能是反映男性的社会利益与价值的知识论,因此,只有从性别视角

切入,对知识进行重新审查,才能建立起反映女性利益和认知价值的知识论。

基于对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论的转化,女性主义创立了自己不同于马克思主义的新的立场论思想。马克思主义立场论是以阶级分析方法为理论基础的,而女性主义立场论则是以劳动的性别分工作为分析依据的。当然,女性主义立场论的这种分析视角也是在对马克思主义的劳动的阶级分工转化的基础之上形成的。女性主义从性别视角出发,对历史唯物主义中的性别盲点和性别偏见提出了自己的批评,明确指出女性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几乎完全被忽视了。马克思主义者没有分析女性及其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特殊关系,也没有对资本主义亦即男性占统治地位的父权制社会进行深入剖析。马克思所说的“我们的出发点是从实际活动的人”,而这个“人”实际上是从男性劳动出发的,忽视了女性的劳动。同时,历史唯物主义对家务劳动和妇女在家庭生活中所具有的创造性作用也没有给予关注,这样就遮蔽了男性对女性的这方面的统治<sup>[11]</sup>。虽然马克思对性别分工、家务劳动和社会劳动之间的关系也有所关注,甚至提出了性别分工是劳动分工的起源,但从总体上看,他对女性在社会劳动和社会分工中的地位和作用并没有作系统的研究。

女性主义立场论将焦点放在对劳动的性别分工上,进而对女性的劳动的重要性进行详尽的分析。哈丁指出,女性的家务劳动是她们得以进行抽象思考的基础,因为在男性看来,女性不从事社会生产,家务劳动不是真正具有创造性的人类劳动,对历史和文化没有贡献,但这种认识上的偏见是父权制男性中心主义的谬见,他们看不到女性劳动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事实上,女性的家务劳动并非像男性所说的那样不是真正的人类劳动,女性的生育、抚养等都是生产性的活动<sup>[12]</sup>。哈特索克同样也是从家务劳动和生育劳动出发,开始思考女性主义立场论问题的,并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和无产阶级的立场论作了转化,从而更适用于女性主义立场论的理论建构。她认为,要对男性中心主义的意识形态进

行更为深刻的批判,女性主义者就必须吸收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视野,从而建立一种女性主义的立场论。具体而言,哈特索克保留了无产阶级立场论的理论分析框架,但却赋予了女性主义的新内涵:(1)劳动的性别分工意味着阶级社会中的女性和男性具有不同经验以及对社会、自然世界的不同理解。(2)二元对立的认知模式一直是男性中心主义知识论的主流,其虚假倒错、扭曲偏袒的男权主义视野和生活模式,颠倒了对人类活动的正确评价,不利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发展。(3)女性主义立场论不能因为认为男权主义知识论具有虚假性而断然拒绝它。男性按照自己的理念建构的社会关系,女性也被迫参与到其中,并成为了女性生活的世界<sup>[13]</sup>。因此,以女性共同经验为基础的立场论,既要重新评估女性经验,又要以这种经验批判男权主义意识形态,尤其需要重新界定家务劳动的价值,只有这样才能彰显这种劳动的生产性,而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立场论由于忽视了这一点,没有发现男女分工中的性别不平等。据此可以看出女性主义立场论在这方面的独特思考。

首先,女性处于被压迫的地位。和无产阶级一样,妇女也是被压迫的对象,在马克思主义看来,无产阶级受到资产阶级的压迫,而在女性主义看来,妇女受到的是男性对女性的性别压迫。女性受压迫的社会地位,使她们更有实际的动力去揭示那些男性对女性真实存在的压迫现象,因为她们对这种压迫有实实在在的体验,而男性由于其拥有的父权制权力,往往会忽视他们的行为对作为一个阶级而存在的妇女的影响,在他们看来,他们的行为是天经地义的,并不具有压迫性。正因如此,从女性的被压迫视角出发,在自然和社会关系认知方面,女性比男性较少有偏见。哈丁认为,在提出和验证科学假设上,以往的知识主张以作为占有统治地位的男性群体的生活经验为依据,这些依据往往是带有性别歧视的,如果知识生产体制中的性别歧视能够被亲历这种歧视的女性所发现并矫正,那么从女性生活出发

所提供的科学论据就能比依据男性生活所提供的更为客观<sup>[14]</sup>。受压迫者在认知上具有优势,如果将这种认知优势建立在受压迫的基础上,那么很容易产生一种认知逻辑:受压迫者受的压迫越多,所具有的认知优势也越多。这一认知逻辑在黑人女性主义者那里得到进一步发展,她们从性别和种族的双重压迫出发,认为黑人女性更具有认知优势。其代表人物是柯林斯(Patricia Hill Collins)和胡克斯(Bell Hooks),在她们看来,基于黑人妇女对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的亲身经历,以及黑人女性自身独有的认知特点,能够建构出一种黑人女性主义知识论。用这种知识论为黑人提供不同的自我呈现和表达,使她们能够勇敢地站出来抵制那些既有种族歧视又有性别歧视的、贬损黑人妇女人格的认知图像,以此强化她们的身份认同<sup>①</sup>。不仅如此,柯林斯还认为,黑人妇女具有一种“局中的局外人(outsiders within)”的身份。就是说,黑人女性既拥有足够多的作为局内人(女性)的个人体验,从而能够认知她们所处社会的秩序;又有足够的临界距离(非白人),使之能够作出更为深刻的批判。

其次,女性劳动与男性劳动同等重要,但在人口生产和再生产中占有更重要的位置,就像无产阶级的劳动在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生产中占有重要地位一样。因此,人们必须改变父权制社会中贬低甚至完全忽视女性在人口生产和再生产中的作用的观念,将家务劳动和人口的生产看作是像其他物质生产活动一样的生产性劳动,给女性劳动以合理的、符合其本来价值的肯定性评价,只有这样,女性的劳动才能像男性的劳动一样,真正变成人类社会劳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以这种观念为基础,人们才能摆脱传统父权制社会中贬低甚至歧视妇女劳动的不合理的观念,使女性劳动所具有的主体性价值、平等地位等在理论和实践上都能够得到认可和接受。在女性主义立场论者看来,劳动性别的二元对立要得到消除,就必须从上述这种重新理解和评价家庭劳动

① 这里借用了社会学和人类学中所使用的“外来者”概念,这种“外来者”身份有一种亦近亦远的优势,“本地人”倾向于告诉陌生人一些他们之间不会彼此透露的东西,而陌生人能够发现沉浸于自己文化中的“本地人”难以觉察到的信念或行为模式。

和人口生产的新观念出发。

再次,女性群体的集体性的自我意识。马克思主义主张的无产阶级因其压迫地位和处于社会生产的中心地位,自然形成了集体性的自我意识。女性主义立场论认为,女性也具有一种集体的自我意识,即她们所受到的压迫经验以及处于再生产中心的社会位置,使他们能够对父权制中的性别和社会的不平等有更为清醒的认识。女性群体的这种潜在的集体自我意识是通过男性统治逻辑的洞察和觉知而获得或呈现出来的,即是说,男性统治女性是建立在将性别对象化的基础之上的。要阐明性别的对象化,首先得明确“对象化”这一哲学范畴的基本内涵。对象化是指人类有目的的对象性活动,人把外部世界看成是自己的活动对象,并借助这种对象活动将自己的目的在对象中加以实现。而在私有制社会中,对象(如自然界)却变成了外化的异己的东西,变成了人的对立面。麦金农(Catherine MacKinnon)以哲学上的“对象化”理论为出发点,最早从女性主义的角度对性别的对象化作了新的阐释。她用“对象化”概念分析人与人之间的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强调对象化是一个过程,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正是通过一种对象化得以确立的,也就是说,在对象化过程中,统治群体把他们的欲望、目的和信念投射到从属群体的身上,并通过他们的权力使从属群体按照统治群体给定的行为规范行动,而这种由统治群体的欲望和目的所产生的群体的差异,却被描述为自然的和必然性的。社会性别就是这样一种对象化模式,即妇女是由于男性的欲望(尤其是男性对女性的性欲)和目

的被建构出来的客体,这与男性如何看待女性有关,“男人将妇女视为他们眼中的妇女……男人凌驾于妇女之上的权力意味着男人看待妇女的方式界定了妇女可能成为什么”<sup>[15]</sup>。男人把女人本质地看作是男人欲望和目的的从属物,并且据此来对待和塑造她们。因此,妇女要改变被压迫的处境,就必须设法揭示并消除性别对象化这种扭曲的意识形态。也就是说,女人们要能够意识到,她们在现实世界中如是存在的“这样的女人”并非生来就是如此,而是由后天被性别对象化不公正地建构起来的社会群体。基于这种集体的自我意识,妇女们就可以根据这一共识共同行动,通过反对性骚扰、色情文学和对生殖自由的限制等抵制由男性制造的性别描述,表达拒绝充当性对象的自由意志;同时向社会展现了一个真相,即,将妇女描述为性对象并不是自然的或必然的,而是被男性人为规定的<sup>[16]</sup>。由此可见,女性的知识表现为她们对集体自我的认识,这种集体自我的知识是在实践中通过行动获得的。

综上所述,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立场论所包含的基本观念,在女性主义立场论中得到了系统的继承和运用,并创造性地形成了自己的女性主义立场论。这种立场论与男性立场有着根本的区别,从而使得女性对劳动、社会分工、女性群体的社会地位等的认识、理解和评价也有所不同。因此,只有将女性主义立场引入人类认识和改变世界的过程之中,才能对自己的生活世界有更合理的认识,并纠正男权主义所带来的各种偏见,将女性立场和男性立场合理地结合起来,以实现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方式的更加合理化。

#### [参考文献]

- [1] 桑德拉·哈丁. 科学的文化多元性: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和认识论[M]. 夏侯炳,谭兆民,译. 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200-201.
- [2] 黑格尔. 精神现象学[M]. 贺麟,王玖兴,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127-129.
- [3] 朱丽亚·T·伍德. 性别化的人生:传播、性别与文化[M]. 徐俊,高文鹏,译. 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05:34-35.
- [4] 桑德拉·哈丁. 立场方法论如何影响社会科学哲学[M]//特纳·罗恩. 社会科学哲学. 杨富斌,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329-331.
- [5] 肖巍. 飞往自由的心灵——性别与哲学的女性主义探索[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129-130.
- [6]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05.
- [7] 约瑟芬·多诺万. 女权主义的知识分子传统[M]. 赵玉春,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95.

- [ 8 ] 卢卡奇. 历史与阶级意识[M]. 杜章智,任立,燕宏远,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118.
- [ 9 ] JAMESON, FREDERIC. 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as an unfinished project[M]//SANDRA HARDING. The feminist standpoint theory reader: intellectual and political controversies.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2004: 144.
- [ 10 ] 陈英,肖峰. 重构知识与政治的边界:女性主义的三种策略[J]. 自然辩证法通讯,2014(2):105.
- [ 11 ] 鹿锦秋. 南希·哈索克的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研究[D]. 济南:山东大学,2014:111-112.
- [ 12 ] SANDRA HARDING. Whose science? Whose knowledge? Thinking from women's lives[M].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1: 128.
- [ 13 ] HARTSOCK, NANCY. The feminist standpoint: developing the ground for a specifically feminist historical materialism [M]//SANDRA HARDING, MERRILL HINTIKKA. Discovering reality: feminist perspectives on epistemology, metaphysics, methodolog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 Dordrecht: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1983: 283-303.
- [ 14 ] HARDING, SANDRA. Rethinking standpoint epistemology: what is strong objectivity? [M]// LINDA ALCOFF, ELIZABETH POTTER. Feminist epistemologies.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1993: 56.
- [ 15 ] CATHERINE MACKINNON. Feminism unmodified: discourses on life and law[M].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172.
- [ 16 ] CATHERINE MACKINNON. Toward a feminist theory of the state[M].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 On the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of Feminist Standpoint to Marxist Standpoint

ZUO Xing-ling

(Yuxi Normal University, Yuxi 653100, China)

**Abstract:** The feminist standpoint theory, which originated in 1970s, was established gradually on the basis of inheriting and transforming the Marxist standpoint theory. Marx's standpoint theory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Lukacs' class consciousness all emphasize that due to the different class standpoint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people have different ways of understanding and transforming the society. Referring to Marxist standpoint theory, feminism turns class analysis into gender analysis. And based on this method, they reveals the marginalized and oppressed status of women in traditional society, which determines their understanding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en and women, their assessment of the gender division of labor and their understanding of women's collective self-consciousness. Such views are fundamentally different from the understanding of patriarchal standpoint.

**Key words:** standpoint theory; feminist standpoint theory; Marxist standpoint theory; gender analysis methods

(责任编辑 鲁玉玲)

# 女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历程、理论界定及其发展前景

朱进进

(中国社会科学院, 北京 102488)

**摘要:**女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发展至今,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唯物主义女性主义。尽管其每个阶段的理论主张各不相同,但理论实质都是一种被唯物主义基本方法贯穿始终的西方左翼社会思潮。解构的唯物主义女性主义,作为女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发展至今的最新阶段,由于其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且理论缺乏改变社会的现实力量,因而在21世纪世界社会主义不断崛起并强烈呼唤马克思主义复归的大背景下,其必然不能正确指导资本主义社会的女性解放。

**关键词:**女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唯物主义女性主义

**中图分类号:**C913.6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838(2019)01-0013-06

女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女性主义在遭遇理论和实践的双重危机时,转而以马克思主义和女性主义为分析框架研究女性受压迫和女性解放问题的女性主义流派,其产生是理论发展和实践发展双重逻辑的必然。女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不是单一的理论体系,而是包括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唯物主义女性主义三种理论在内的理论流派。

## 一、女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历程

女性主义最早出现在17世纪的西方,从19世纪开始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活跃于西方政治舞台,并于20世纪中下叶的第二波女权主义运动中达到了理论巅峰。在第二波女权主义运动中,女性主义产生了众多流派,成果丰硕,这其中便包括女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二战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进入了经济复兴时期,虽然经济

发展迅速,但始终无法消除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带来的种种社会弊病,因此,社会上涌现出多种为实现具体目标而开展的反资本主义斗争,形成了一波又一波的“新社会运动”。在“新社会运动”中,以大学生和青年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新左派”左翼学生运动最令人瞩目,他们追求自由民主,寻求社会变革,极大地激发了女权主义积极分子力求消灭性别歧视的热情。众多女权主义者积极参加“新左派”运动,却逐渐发现“新左派”具有浓厚的大男子主义氛围,女性根本无法实现自身的利益诉求,自此女性开始了新的妇女解放运动,这便是20世纪60年代起源于美国,后来迅速波及西欧及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第二波女权运动。其中,部分女权主义者求助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马克思的妇女解放思想为分析框架,在20世纪70年代初形成了

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代表人物有玛格丽特·本斯顿、达拉·科斯塔和谢尔玛·詹姆斯,她们从女性与资本主义生产与再生产关系的视角出发阐释妇女受到的压迫,并把关注点放在家务劳动与资本的关系上。在本斯顿看来,男性通过剥削女性无偿家务劳动的方式来限制其经济地位的上升,因而其认为女性解放需具备以下两个条件:“第一,家庭外获得职业机会的平等;第二,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sup>[1]46</sup>。而科斯塔和詹姆斯则在继承本斯顿的无偿家务劳动基础上更深入了一步,她们把女性的家务劳动纳入资本主义社会生产体系之中,提出家务劳动不仅提供使用价值,而且还创造剩余价值,资本家通过向女性的工人阶级丈夫支付微薄的工资来间接占有妇女所提供的剩余价值,进而实现对妇女的剥削。因而要实现妇女解放,就应该实行家务劳动计酬策略。

随着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发展,女性主义者发现马克思主义过于重视阶级分析而忽视社会性别分析,且其理论无法解释为什么在公共领域中不同性别人群占据不同的位置以及在私人领域中女性屈从于男性的现象。为了更全面地解释女性受压迫的原因,在1970年代中期,把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和激进女性主义的性别分析相结合用于解释妇女受压迫根源的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应运而生。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的代表人物有海蒂·哈特曼、齐拉·爱森斯坦、南茜·乔多罗、艾里斯·扬、莉丝·沃格尔等,主要理论内容包括“一元论”和“二元论”。“一元论”的代表人物艾里斯·扬认为资本主义在本质上是依赖父权制度而建立的,因而资本主义本质上就是父权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女性在社会中的边缘化、女性与男性的等级分工以及资本主义社会中对女性母职的意识形态宣传都造成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父权制。“二元论”源于琳达·菲尔普斯所提的“父权资本主义”,指的是女性受压迫的境况源于资本主义和父权制这两个相互区别同时又密切相关的制度,主要代表人物有海蒂·哈特曼、齐拉·爱森斯坦、南茜·乔多罗。海蒂·哈特曼认为女性受压迫源于资本主义和父权制这两

个相互区别又彼此联系的系统,她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以前,父权制的性别分工就已然存在,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以后,性别分工成为资本主义社会运行的基本机制,在资本主义和父权制两种制度的相互作用下发展出了性别等级分工,并且通过家庭工资、意识形态等手段使二者之间的联系互相加深,因而要实现妇女解放就必须同时同这两种制度作斗争。齐拉·爱森斯坦也同样认为资本主义和父权制是决定妇女受压迫状况的核心要素。南茜·乔多罗则从妇女的母职与社会性别组织、母职的意识形态及其与资本主义再生产之间的内在联系阐释了资本主义与父权制之间的相互联系。

准确来说,唯物主义女性主义在20世纪60年代就已经产生。到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主流女性主义遭遇了多重危机。首先,在现实方面,同性恋、有色人种、工人阶级及第三世界妇女,她们用自身不同于主流妇女的独特女性经验使主流女性主义不得不质疑她们所使用的“妇女”“妇女经验”和女性主义研究的普遍性,同时对妇女的暴力、对女性性行为、再生产的控制以及对女性工作和女性气质的贬低又呼吁女权主义运动的继续。其次,在理论方面,西方进入后工业社会后,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精神分析等后现代理论如狂风一般席卷了西方知识界,对原有的女性主义理论造成了巨大冲击。再次,在时代背景方面,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受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的影响,唯物主义女性主义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面临着被消解的危险,在后现代主义理论的推波助澜下,唯物主义女性主义进入了结构的唯物主义女性主义阶段,并成为女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潮流。与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和社会主义女性主义都作为一种流派不同,解构的唯物主义女性主义只能看作是西方女性主义者的一种独特话语,其内部各个代表人物关于“唯物主义女性主义”的理解以及与唯物主义的密切程度也各不相同。“唯物主义女性主义是多种理论综合的产物,它是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激进主义女性主义、关于意义和主体性的后现代理论、心理分析理论

等各种话语相结合的产物。”<sup>[2]7</sup> 其主要代表人物有克里斯汀·德尔菲、唐娜·兰德里、格拉尔德·麦克林、罗斯玛丽·亨尼西。解构的唯物主义女性主义深受后结构主义大师理论的影响,它解构一切,否定所有的宏大理论体系,主张话语即权力,对马克思主义所主张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系统理论以及实行社会变革的观点均持否定态度,不再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分工、生产与再生产、阶级等概念,把关注点聚焦在语言、文本、意识形态、国家和文化实践、身体的意义等上,主张用微观的、动态的、偶然的、多元化的视角解释当下女性的生存环境。唐娜·兰德里、格拉尔德·麦克林高度重视语言的作用,认为语言是实践的意识,是在世界中会产生物质后果的思想和行为方式,语言和文化产品的产生是“实践的意识”形式,是物质、生产性的活动。解构的唯物主义女性主义过于重视文本、叙事、解释或者阅读世界,具有强烈的非政治性和去实践性。

## 二、女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界定

### (一)理论实质:是一种西方左翼社会思潮

虽然女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关系密切,但我们应看到其实质是与马克思主义的文化传统和政治经验截然不同的左翼社会思潮。女权主义作为类型庞杂的新社会运动中的一员,其与马克思主义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政治立场和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的价值取向大为不同,它使“人们在享受‘富裕社会’的同时感到自己的自由、自尊、自主等自我价值受到了威胁,新社会运动的抗议主题就是这些新威胁和新异化”<sup>[3]</sup>。女权主义从性别的视角拓宽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当代的理论视域,其分裂的、离散的和多元化的理论包含着对资本主义激进批判的潜能,但同时又存在着致命的缺陷,如过于依赖文化分析而远离实际、回避阶级政治,因而缺乏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强有力批判的现实力量。女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虽然也反抗资本主义制度,但并没有彻底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能力和切实可行的行动策略,因而其实质是与西方左翼有着相近政治立场的比较激进的左翼社

会思潮。

### (二)应用的基本方法:唯物主义

首先,从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与唯物主义的关系来说,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是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运用的典范。这一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把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最基本和最核心的经济决定论作为立足点,通过对家务劳动的性质和价值的探讨来说明资本主义社会对女性的压迫。玛格丽特·本斯顿认为家务劳动是未付酬的生产性劳动,而资本主义通过把其归为非生产性劳动来剥削和压迫妇女,达拉·科斯塔和谢尔玛·詹姆斯则对此进行了深化,他们直接把妇女的家务劳动纳入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体系之中,认为妇女的家务劳动是资本主义的劳动力再生产必不可少的一环,因而与男性的社会劳动一样具有价值,而广大的家庭妇女却未被支付任何报酬。很显然,这些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都认为女性被剥夺的经济地位决定了其屈从于男性的地位。

其次,从社会主义女性主义与唯物主义的关系来说,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在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经济分析的基础上加入性别分析,从资本主义和父权制两个因素相结合的角度分析女性受压迫的原因,其基本理论主张主要包括“一元论”和“二元论”两种,二者都把经济分析作为基本分析理论。“一元论”的代表人物艾里斯·扬在劳动性别分工这一概念的基础上阐发了资本主义就是父权制这一单系统论,并且把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看成是研究女性问题的基本的分析框架,致力于实现一种彻底的女性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二元论”代表人物哈特曼认为,父权制是具有一定物质基础的社会关系结构,“父权制的物质基础不仅建立在家庭要养育孩子这件事上,而且建立在能够使男性控制女性劳动的所有结构上”<sup>[4]</sup>,通过这些男性阻止女性占有重要的生产资源,并控制他们的性生活。米切莉·巴雷特十分强调意识形态对于妇女受压迫的建构和再生产的作用,但是她同样认为,不能把意识形态和经济关系分开来讨论女性受压迫问题。这些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都是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经济分析的基础

上展开其女性主义理论研究的。

再次,从唯物主义女性主义与唯物主义的关系来说,早期的唯物主义女性主义者安妮·弗格森沿袭历史唯物主义的经济分析,把劳动性别分工作为其分析性行为、父母角色和社会纽带的基础,并通过分析妇女在性别劳动分工中所处的位置得出妇女是“革命”阶级的结论,虽然这种“革命”是意识的“革命”而非现实的“革命”。进入解构的唯物主义女性主义时期后,其主要代表人物有罗斯玛丽·亨尼西、唐娜·兰德里和杰拉尔德·麦克林。受福柯话语理论的影响,罗斯玛丽·亨尼西坚持话语的唯物主义基础,他认为话语是一种实践,话语的存在离不开由其组织和构成的物质基础,同时话语本身也是一种物质力量。兰德里和麦克林也认为“产生于社会制度的意识形态、话语处于物质实践中,具有物质效果,甚至还会影响经济基础结构。”<sup>[1]191</sup> 并且这一时期的唯物主义女性主义抛却了自启蒙运动以来开创的本质主义、规律性、宏大的理论体系,转而崇尚多元性、不稳定性、微观、偶然的研 究视角。很显然,这一时期的唯物主义女性主义已经不是马克思主义所主张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了,但不可否认其仍然十分重视物质的决定性作用,认为一切还是得从具体的物质实际出发,尽管这其中还包含了话语、意识形态的物质作用,因而其应用的仍然是唯物主义的而非唯心主义的方法。

### (三)价值旨归:实现女性解放

女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既是一种女性主义理论,也是一种社会运动。它是由女性创立、为了实现女性解放、主要依靠女性实现、以女性为中心的理论和运动,其起点和落脚点、最终目标和价值旨归都是实现女性群体的解放。女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作为西方的女权主义运动,与中国的女权主义的发展由领袖人物推动截然不同,它的每一次理论的飞跃、每一次实践的进步,都是由无数西方女性不懈的独立抗争与奋斗的结果,目的在于消除性别歧视,改变几千年来妇女在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屈从地位,实现女性全面和彻底的解放。虽然现阶段的唯物主义女性

主义因其解构一切的后现代特征已经离开现实生产太远,已然丧失了改变女性生存状况的能力,但是我们仍不能否认其力图实现女性全面而彻底的解放的初衷。

### 三、解构的唯物主义女性主义不能正确指导资本主义社会的女性解放

(一)解构的唯物主义女性主义没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

解构的唯物主义女性主义没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从唯物主义女性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来看,早期的唯物主义女性主义还基本能够从马克思主义的框架来分析问题,而后期的唯物主义女性主义则解构、颠覆甚至全盘否定马克思主义,过分关注文化、意识形态领域而忽视、否定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实践等基本观点。客观来说,马克思主义在指导女性问题上固然存在着一些局限,但是不能因此就对其进行全盘否定。马克思主义不仅是世界观,也是方法论。在女性主义问题上,很显然,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法在当今的资本主义社会仍然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首先,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在今天依然具有强大的指导意义。资本全球化的今天,只要资本依然存在于世间,资本追求利润最大化的逻辑必然要求其对广大国内外女性工人进行沉重的剥削和压迫。一方面,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女性工人所受到的剥削和压迫最为深重,女性既受到男性父权制社会的集体压迫,还受到来自资本家的剥削。另一方面,在资本主义国家外部,随着资本全球化的发展,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压迫程度变本加厉,阶级矛盾也更加突出,这种阶级矛盾不仅包含着发达国家资本家对发展中国家工人阶级的压迫,也包含有男性资本家对女性工人的阶级压迫。另外,资本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原则还造成了人性的分裂和异化,“资本关系以抽象的理性原则渗透到人类的政治法律制度中,成为统治人类一切活动的原则。人类过上了有史以来最富足的物质生活,但人类成为物质生活的不停息的追逐者,人的感性生命不再是目的,而成为追逐物质的手段”<sup>[5]</sup>。

因而,只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依然存在并占统治地位,妇女就不可能获得物质和精神的双重解放。因而,在当今的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和外部,女性依然遭受着巨大的阶级压迫,而只要存在着阶级压迫,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及发展中国家的女性解放就必然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其次,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理论在解决今天资本主义社会的女性问题上依旧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不论是在公共领域还是在私人领域,我们都能看到经济基础对于个人地位的决定性作用。在公共领域,社会主要按照财富多寡划分社会地位,而在私人领域,妇女地位也基本上取决于妇女在家庭中的经济实力。因而唯物史观所主张的从经济因素来分析女性问题仍然是考察和分析女性受压迫和女性解放问题的根本原则。再次,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点依然是改变妇女生存状况最有力的理论指导。“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sup>[6]</sup>唯物主义女性主义过分强调意识形态的变革而忽视社会实践这一改变女性生存状况的根本性因素显然对女性主义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的发展都毫无益处。

(二)解构的唯物主义女性主义缺乏改变社会的现实力量

首先,解构的唯物主义女性主义具有明显的非政治倾向。早期的唯物主义女性主义还会从马克思主义出发思考女性问题,然而后期的解构的唯物主义女性主义由于深受后结构主义的影响,形成了后现代独特的思维方式,如批判现代性宏大的叙事方式,否认有涵盖一切的规模宏大的理论,反对中心主义、本质主义、普遍主义、二分法,强调偶然性、不确定性、差异性、多元化,它怀疑一切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总体性话语,它解构了一切宏大的话语体系,认为性别、阶级、种族的分类都过于概括,把“女人”“父权制”都看作是带有本质主义色彩的概念,反对男女二元,提倡多元的差异政治模式。它对“妇女”范畴进行了解构,提倡妇女主体的多样化,关注“话语的”性别、团体,认为一切都是话语的、偶然的、局部的,瓦解了女性主义政治赖以存在的本体论的基础,

因而不可能把不同阶层、不同种族、不同民族等具有不同背景和经历的女性力量凝聚起来改变女性受压迫的现实。

其次,解构的唯物主义女性主义具有强烈的去实践性。解构的唯物主义女性主义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以及生产与再生产的基本原理,把关注点放在文本、话语权力、意识形态、身份认同及身体的意义等问题上,力争成为话语和意识形态的主体,其理论具有强烈的经院色彩。然而,女性受压迫是实实在在的现实问题,它“不是一种叙事、一个文本或一种解释或阅读世界的方式”<sup>[7]</sup>。

(三)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发展大势将助推解构的唯物主义女性主义的消亡

在整个女性主义运动发展史上,女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紧密联系,二者发展的高潮和低潮在许多时期都相近甚至相同,社会主义运动对女性主义运动的发展和马克思主义的复归常常起着助推作用。因而对唯物主义女性主义发展前景的预测,也应将21世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趋势重点考虑进来。就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形势来看,首先,从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趋势来看,一方面,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是无法消除的,周期性经济危机的爆发就是资本主义社会本质的体现。而且,各种形式、各种规模的金融危机还在不断发生。另一方面,在资本主义国家外部,发达国家霸权主义盛行,国际冲突不断,发展中国家为维护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必然要进行反霸权斗争,改变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秩序。在全球化背景下,新社会运动的女性主义本质上是对资本主义的不满。这些矛盾都说明了资本主义制度存在着不可避免的根本缺陷,它始终只是人类社会历史长河里的一个特定的阶段,必将被社会主义制度所取代。

其次,从社会主义力量的发展来看,自苏东剧变以后,虽然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了低潮,但是当代世界历史仍处于《共产党宣言》所揭示的历程中。并且在进入21世纪以后,世界社会

主义的力量正在复苏。中国、古巴、越南、老挝、朝鲜在世界社会主义陷入低潮的情况下依然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并且取得了新发展,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另外,苏东剧变以后坚持下来的共产党,经历了危机、重组、更新和发展,致力于谋求在本国政治舞台上能占有一席之地并发挥作用。“身处21世纪这个伟大时代,我们可以坚定地认为,这个时代‘最实际的呼声’、时代的最强音和最激动人心的口号是:21世纪是社会主义振兴的世纪!”<sup>[8]</sup>

21世纪随着世界社会主义的振兴,西方左翼在文化中和实践上退守的状况会改变,马克思主

义的影响力将会大大增强,对女性主义乃至整个世界的影响力会逐渐复归甚至更甚于从前。而解构的唯物主义女性主义作为后现代主义的理论之一,是在后资本主义社会生根发芽的同时又与父权制牢牢结合在一起的后现代理论,它不仅背离甚至诋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主张,同时也与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所追求的所有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最终目标相悖。因而在当今世界社会主义力量不断崛起的大背景下,唯物主义女性主义如果坚持走对马克思主义的颠覆之路,不转变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并积极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指导,不仅不能改变女性的受压迫状况,还将导致自身的穷途末路。

[参考文献]

[1] 秦美珠. 女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M]. 重庆:重庆出版社,2008.  
 [2] ROSEMARY HENNESSY, CHRYS INGRAHAM. Materialist feminism—reader in class, difference, and women’s lives [M]. New York:Rout-ledge,1997.  
 [3] 姜辉. 欧洲发达国家共产党的变革[M]. 北京:学习出版社,2004:228.  
 [4] 詹尼特·A. 克莱尼. 女权主义哲学:问题,理论和应用[M]. 李燕,译. 北京:东方出版社,2006:577.  
 [5] 秦美珠. 困境与选择——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走向[J]. 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4):10.  
 [6]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7.  
 [7] 黄继锋. 唯物主义女权主义[J]. 国外理论动态,2004(3):25.  
 [8] 姜辉. 21世纪世界社会主义的新特点[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84.

**Ideological Course, Theoretical Definition and Prospect of Feminist Marxism**

ZHU Jin-jin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2488, China)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feminist Marxism has gone through three stages of development: Marxist feminism, socialist feminism and materialist feminism. Although each stage has different theoretical claims, its essence is the same. It is a western left wing social trend of thought which is always based on historical materialism. The deconstructionist materialist feminism, as the latest stage of feminist Marxism, has deviated from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Marxism doctrine and lacks the realistic power to change the society. Therefor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rising of world socialism in twenty-first century and the strong call for the return of Marxist doctrine, the materialist feminism will not correctly guide women’s liberation in capitalist society.

**Key words:** feminist Marxism; Marxist feminism; socialist feminism; materialist feminism

(责任编辑 鲁玉玲)

# 妇联组织培育流动妇女核心价值观研究

——以浙江奉化为例

裘曙洁<sup>1</sup>, 汪斐卿<sup>2</sup>

(1. 中共宁波市奉化区委党校, 浙江 宁波 315500; 2. 宁波市奉化区广播电视中心, 浙江 宁波 315000)

**摘要:**妇联组织在角色定位中体现出双重角色的特点,在工作开展中具有拓展领域、整合资源等优势,在培育流动妇女核心价值观践行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浙江奉化妇联注重“联网”“联姻”“联心”,创新了流动妇女核心价值观的培育方式。妇联组织培育流动妇女的核心价值观需要依托社会资源,提升流动妇女的素质能力;构建维权网络,化解流动妇女的矛盾纠纷;开展各项活动,激发流动妇女的内生动力。

**关键词:**妇联;流动妇女;核心价值观

**中图分类号:** C913.6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6838(2019)01-0019-07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现着社会主义最基本的价值理念和价值追求,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中发挥着主导作用,为凝聚当前多元状态下的思想指明了方向<sup>[1]</sup>。党的十八大以来,各地根据不同层面、不同群体,采取不同方式方法,分层培育,分类践行,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基层,深入人心。本文通过分析妇联组织的角色定位与优势,展示了基层妇联组织培育流动妇女核心价值观的实践探索,提出了培育流动妇女践行核心价值观的对策建议。

## 一、妇联组织角色定位中的优势分析

### (一) 妇联组织角色定位中的亮点

妇联组织是以女性为服务对象的群团组织,在某种程度上具有非政府组织的一些特点,在组织角色定位中体现出这种双重角色的特点。

一是政府财政稳定支持,体现了政策的倾斜优待——政府组织的优势。妇联组织具有官方背景,领导层也是由政府官员担任,其不仅借助行政力量成立,而且以行政资源为生存保障<sup>[2]</sup>。政府的行政性特征决定了政府拨款的稳定性,相对于普通的非政府组织而言,妇联组织拥有政府提供的制度性资金保障,减少了后顾之忧。另外,它可以合理利用自身的人民团体身份,更广泛地接触相关政府部门,与政府建立广泛而密切的联系,利用行政力量推动工作的开展,推动相关有利于妇女政策的制定。

二是调动组织灵活性,体现了非政府组织思维特点——NGO的优势。相对于官方体系,非政府组织比较灵活,面对突发问题时,其应变能力、活动效率相对较高。非政府组织(NGO)在某些

收稿日期:2018-11-11

基金项目:浙江省妇女研究课题“多元文化背景下流动妇女核心价值观培育研究”(项目编号:201805)

作者简介:裘曙洁,女,中共宁波市奉化区委党校高级讲师,主要从事基层党建、妇女问题、社会治理研究;汪斐卿,女,宁波市奉化区广播电视中心工程师,主要从事信息管理研究。

公共领域的事件处理中较政府更加高效、低成本,能够尽可能地满足民众的需求和利益,是最为和谐的民众—政府沟通枢纽。妇联组织的非政府组织角色定位,使其具有自身作为社会群众团体的组织优势,一方面可以在法律法规政策限定的范围内自主灵活地开展针对服务对象的特定服务活动,另一方面可以根据工作需要灵活增减工作人员的数量,例如招募志愿者,对其进行分类,依情况确定数量和分工等。

## (二)妇联组织工作领域的优势分析

一是拓展了工作领域。妇联组织具有组织延伸广泛、公众认可度高的优势。长期以来,妇女组织结构主要以“纵向层级式”为主,讲究的是“纵向到底”,工作重点在农村,工作对象主要是农村妇女。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妇联工作的领域进一步扩大,在“纵向层级式”的基础上侧重发展“横向扁平式”,即把组织的触角延伸到机关、社区和新经济领域,不断扩容妇联团体会员。通过层级式的妇联工作网络和各种女性联谊组织,发挥团结妇女、凝聚人心的作用,做到哪里有妇女,哪里就有妇女组织,使妇联组织网络实现纵向到底,横向到边,并且使妇女的人力与人才资源更加丰富。同时,运用这些妇女人力人才资源履行“维护妇女权益、促进妇女发展”的基本职责。

二是整合社会资源。因为妇联工作面广线长,仅仅依靠传统的线状组织体系,很难承接政府转移出来的部分职能。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各种民间妇女组织以及关心妇女发展的专家学者,都是妇联在参与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时可以整合的社会资源。因此,妇联组织通过加强与社会各界的互通互联,不断整合社会资源,吸引更多的人、调动更多的力量来关注和支持妇联组织维护女性权益。如利用各种有利时机,通过联合或协调民政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司法局、公检法等职能部门,实现社会资源的整合利用,承担起妇女权益保障的责任;通过联合社会各方

面力量,共同推动妇女发展和妇女权益保障。

总之,妇联是党和政府直接领导下的群众团体,与其他政府部门工作交流联系密切,因而在获得政府支持和其他部门配合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拥有制度化的参与渠道<sup>[4]</sup>。妇联在组织动员社会力量、取得妇女群众认同方面有着独特的优势,因而在参与社会治理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中,比较容易得到政府的重视、支持和妇女群众的认同。因此,妇联组织在促进流动妇女权益保障、培育流动妇女核心价值观践行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 二、妇联组织培育流动妇女核心价值观的奉化实践

浙江宁波市奉化区有流动人口18.7万,占奉化户籍人口的38.28%<sup>①</sup>。近年来,奉化妇联面对近9万流动妇女,做好、做活“联”字文章,注重以“联网”“联姻”“联心”的方式培育流动妇女的核心价值观,既拓展了妇联自身的工作空间,又创新了流动妇女核心价值观的培育方式。

### (一)注重“联网”,搭建流动妇女核心价值观培育的平台

一是组建了奉化民族妇女之家。在奉化的外来少数民族妇女有650多人,分属22个少数民族。为了联结这些民族妇女,培育她们的核心价值观,奉化妇联组建了浙江省第一个“民族妇女之家”。这一联结民族妇女的网络由“三个服务中心”“一个援助站”“四条服务热线”组成。“三个服务中心”即民族妇女创业培训中心、民族妇女儿童健康服务中心、巾帼家政服务中心;“一个援助站”即维护民族妇女权益法律援助联络站;“四条服务热线”即民族妇女就业创业咨询热线、民族妇女儿童健康咨询热线、巾帼家政服务中心咨询电话、民族妇女法律援助咨询热线。奉化的民族妇女之家每年定期举办“同根同源、情依心连”民族妇女联谊会、妇女健康保健知识系列讲座等活动,开展为民族妇女免费健康检查和为贫

① 数据来自宁波市奉化区流动人口管理办公室。

困的民族妇女捐款献爱心等,加快了少数民族妇女的奉化融入。

二是建立了宁波市首个外来妇女组织。奉化力邦社区是流动人口的一个集中地,居住着3000多名来自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的外来务工人员,其中女性近2000名,占外来人口总数的60%以上。社区里每天都有人口流动,每年人口流动率为20%左右。为有效实现对这些外来妇女的管理和服务,奉化妇联于2005年10月在力邦社区建立了联结外来妇女的妇联组织——宁波市首个外来妇女组织。奉化妇联在明确力邦社区妇联职责、提高妇联干部素质的基础上,提出了外来妇女“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管理”的模式。2007年3月,奉化妇联指导力邦社区妇联组建了宁波市首个外来务工女性维权站。维权站设“社区维权岗”“知心姐妹信箱”“法制你我她女子心声队”“女子权益维护队”。力邦社区的女子维权站构筑了以妇联、社区保安和社区调解员为主体的调解网。奉化妇联又指导力邦社区妇联设立外来妇女开展活动的场所,完善具体的工作制度,以“教育、服务、维权”为抓手,先后推出了“巾帼志愿者”队伍建设与“巾帼新市民”创业、学习、维权、展示等行动。奉化妇联引导力邦社区妇联对流动妇女实行“市民化管理、人性化维权、亲情化服务”,无疑是培育流动妇女核心价值观的典型案例。这一工作理念曾得到宁波市妇联、浙江省妇联、全国妇联领导的肯定。

三是构建流动妇女网格责任区。奉化妇联在积极推进社区妇女组织建设的基础上,因地制宜地设置了流动妇女网格管理服务责任区。如溪口各社区通过建立以行业片区经理人、流动妇女党员代表为责任人的妇女小组,做到分片包干,无缝对接。奉化妇联与溪口镇妇联干部通过定期或不定期到社区中的网格责任区进行走访,为流动妇女提供计划生育、就业指导、法律维权以及解决矛盾纠纷等多方位的服务,并组织开展丰富多彩、健康有益、形式多样的妇女组织活动,以消除流动妇女工作的盲点,培育她们的核心价

值观。奉化妇联还通过动员组织本地志愿者与流动妇女开展互帮互助的志愿服务活动,进一步推进城镇社区中本地妇女与流动妇女共同参与、共同服务、相互融合的社会组织建设。

(二)注重“联姻”,架起两岸婆媳核心价值观培育的桥梁

奉化与台湾有着特殊的历史渊源,地缘相近、人缘相亲、习俗相同、经济相融。近年来,随着两岸基层民众交流的日趋频繁,涉台婚姻不断增多。涉台婚姻家庭和谐是海峡两岸基层民众和谐的重要基础,涉台婚姻中的婆媳关系牵涉到大陆与台湾两地,正确处理好婆媳关系也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重要基础。自2011年起,奉化妇联联合奉化台办、台湾高雄市妇女会,协助奉化市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等单位成功举办八届海峡两岸“婆媳文化节”。“婆媳文化节”以评选典型婆媳关系案例、开展婆媳互动、举办婆媳论坛等形式,架起两岸婆媳核心价值观培育的桥梁。首届“婆媳文化节”的“十佳婆媳”评选活动曾吸引两岸5000多对婆媳报名参与评选。自2014年以来,连续五届“婆媳文化节”主要是组织两岸婆媳代表以“一家两岸,两岸一家亲”为主题,以“家风”切题,畅谈和谐婆媳经,探讨“小家庭里的大家风”。奉化妇联还以“家和万事兴、婆媳一家亲、写一封家书、传一份真情”为主题,向海内外婆媳开展800字以内的传统家书、300字以内的微家书有奖征集活动。这一“最美婆媳家书”活动,得到了海内外众多家庭的积极响应,共收到来自台湾、浙江、山东、湖北等地的家书1200余封。相距千里之遥的两岸家书透出一幕幕婆媳间和美生活、互敬互爱的画面。2016年7月,奉化妇联在奉化林家村——“天下第一桃园”里举办了一场别出心裁的婆媳活动,来自海峡两岸的32位获奖最美婆媳汇聚桃园,诵读家书。2018年以“一诗·一家·一生情”为主题,以反映“婆媳情”的原创诗歌征集为载体,海峡两岸100多对婆媳相聚一堂,共念和谐婆媳经、共话两岸婆媳情。两岸婆媳通过讲述双方心中凝聚的那份

亲情,诠释了婆媳关系意蕴,进一步加强了两岸基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交流。

八届“海峡两岸婆媳文化节”活动在海内外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在台湾岛内的影响更大。“婆媳文化节”使海峡两岸婆媳以及各类妇女群体感受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弘扬,以及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与践行,吸引和促进了海峡两岸基层妇女的交往和交流。

(三)注重“联心”,破解流动妇女核心价值观培育中的难题

奉化妇联通过实地走访奉化20多家非公企业,对246名在职流动人员女职工和165名下岗待岗流动女性开展有关心理问题的问卷调查,发现有50%左右的流动妇女在心理上有消极悲观、焦虑不安等不良情绪。因心情烦躁、心理困惑而引发工作失误、家庭婚变的有20%。为了缓解这些流动女性的压力,提高她们在激烈竞争中的应对能力和调节能力,预防心理障碍和心理疾病的发生,奉化妇联全面启动了“舒缓心情,做快乐女人”系列活动,破解流动妇女核心价值观培育中的难题。

一是建立女性心情舒缓中心。奉化妇联将宁波大盛时装有限公司作为试点单位,由公司腾出三间约45平方米的办公室,投入5万余元,配备了专用视听工具和专业图书,并按规范装修布置,开辟了宁波市第一个正规的心理咨询室——女性心情舒缓中心。中心内设置了“音乐角”“阅览厅”“谈心屋”“宣泄室”,致力于倾听女性的情绪宣泄,安抚女性的困惑心灵,为女职工提供一个排遣压力、放松心情的场所。

二是开通“18957853838”女工心情舒缓热线。2009年,奉化妇联开通了宁波市首条女工心情舒缓热线,向社会公开招募了7位有爱心、有责任感、有奉献精神且具备专业心理咨询证书和丰富理论实践经验的心理咨询专家担任心情舒缓师,每晚7点至9点接听心情舒缓热线,每周六下午1点至3点在心情舒缓中心值班,为有需要

的女性进行心理疏导,减轻她们工作、生活上的压力;帮助思想不稳定的女性消除不满情绪,端正她们的思想。目前已有千余位流动妇女通过热线或当面咨询得到帮助。奉化妇联通过对女性心情舒缓中心来访、来电案例的分析发现,许多流动妇女主要存在子女教育、家庭关系、情感纠纷、社会人际等方面的心理困惑,因此与宁波大学女子学院共同举办了奉化婚姻家庭咨询师培训班,以便咨询师有针对性地对奉化流动妇女开展有关家庭关系处理、亲子教育、女性自身情感管理与控制、社会文明礼仪等方面的指导。

三是设立兰馨服务中心。奉化妇联于2014年设立兰馨公益服务中心,招募不同类型的志愿者457名,面向广大妇女群体不同需求组建功能多样化的爱心公益团队,项目化推进公益活动,并以“打造24小时妇联”为目标,探索“全天候、全方位、全覆盖”地做好服务流动妇女的工作。截至目前,平台已经入住兰馨亲子阅读营、“奉城馨语”主播团、滴水公益、锋之社、巾帼创业创新联谊会、兰馨公益服务队、女法官工作室等12个志愿队伍,设立线下“奉化女性粉丝实践基地”13个;组织开展活动298次,包括流动妇女在内的受益妇女儿童10万余人。近年来,奉化妇联还通过线上宣传、线下推进,开展“兰馨关爱基金”募捐活动,累计募集资金387833元;举办“亚德客集团牵手留守儿童关爱活动”,组织心理咨询师为51位莼湖镇流动妇女家庭的留守儿童进行专项心理咨询<sup>①</sup>。

综上所述,奉化妇联拓宽工作渠道,创新工作手段,以“联网”“联姻”“联心”的方式,着力于服务流动妇女,维护流动妇女权益,破解流动妇女难题,把党和政府的关怀、妇联“娘家人”的温暖送到流动妇女心中,在培育引导流动妇女的核心价值观方面发挥了积极有效的作用,为各地的基层妇联组织提供了现实借鉴。

一是促进了流动妇女的社会融入。流动妇

<sup>①</sup> 此节数据来自宁波市奉化区妇联。

女在融入城市社会和生活的过程中大多处于极其被动的地位,如少数民族妇女的内源式发展和政治参与度存在族际差距、地域差距、城乡差距、阶层差距和性别差距的多维度差距<sup>[5]</sup>。为弥补这些差距,奉化民族妇女之家给在奉化的少数民族妇女搭建了学习、交流、沟通的平台,培育她们性别平等、社会参与、减贫发展、技能提高等价值理念,较好地促进了这些少数民族妇女自我意识、自我期待、自我效能感的提升,使她们能够更好地在职业岗位、家庭角色、社会环境等方面发挥积极有效的作用。众所周知,流动妇女真正融入异地,最重要的标志是其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的内化,进而在心理上产生认同感,在情感上找到归宿。心理学家柯尔伯格在研究中发现,由于相互理解不够和没有互相参与的意识,处于较低社会阶层的人较难与掌握道德秩序的人士协调一致。因此,奉化妇联通过建立女性心情舒缓中心、“18957853838”女工心情舒缓热线和设立兰馨服务中心等方式,充分调动绝大多数流动妇女的主观能动性,使其在思想、价值观、道德意识上努力克服自我封闭性,积极融入社会,不断提升在异地社会生活中的角色地位。

二是维护流动妇女合法权益。当前大多数流动妇女来自于经济社会较为落后的农村地区,在城镇务工中面临着职业、生活方式、社会交往关系等一系列的转变和适应。在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法治一体化的建设中,奉化妇联在力邦社区建立女子维权站,引导流动妇女参与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建设,在培育流动妇女核心价值观中依法化解她们在就业、医疗、交通、生产安全、教育卫生、社会保障等领域的矛盾纠纷;在流动妇女群体中积极宣传男女平等基本国策,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提高了流动妇女的法律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较好地维护了流动妇女的合法权益,较好地解决了流动务工人员聚居所带来的诸多问题,促进了社会的和谐稳定。

三是引导流动妇女价值选择。改革开放以

来,随着经济社会的转型发展,人们的思想观念出现多元化的转变,流动妇女身临其境地接受异地多元思想多元文化的碰撞与洗礼,价值观也呈现出复杂性与多元化,甚至出现价值目标模糊、价值认知偏差、价值信念缺失等问题<sup>[6]</sup>。同时由于市场经济趋利性的渗透,流动妇女在价值观的选择上也受到消极负面的价值观冲击。奉化妇联通过组织举办“海峡两岸(奉台)婆媳文化节”,既构建了“尊重、理解、包容”的和谐新婆媳文化,让“尊老爱幼、男女平等、夫妻和睦、勤俭持家、团结友善、民主文明”的和谐之风吹遍海峡两岸,又传承和弘扬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通过构建流动妇女网格责任区,吸收流动妇女中的骨干代表加入价值观培育团队,激发这些骨干的主体性,使其之间协助开展流动妇女群体的人生观、价值观培育,扩大主流价值观念的影响力,引导流动妇女正确面对多元态势和多元文化的挑战、经济利益的诱惑。

### 三、妇联组织培育流动妇女核心价值观的路径思考

妇联组织培育流动妇女的核心价值观,须在流动妇女的素质能力提升、矛盾纠纷化解、内生动力激发等方面多努力。

#### (一) 依托社会资源,提升流动妇女的素质能力

妇联组织自身几乎没有可支配的有形资源,但有整合社会资源的优势。奉化妇联组织正是通过依托社会资源,借助各方力量,延伸工作手臂等,来提升流动妇女的素质能力,增强妇联组织自身的感召力、辐射力、影响力和凝聚力。

一是依托“工会”组织督促企业构建教育培训体系,减少流动妇女异地就业的盲目性;要求企业公正平等地对待流动妇女,为她们提供良好的职业发展空间,使其形成长远的职业发展规划,提高敬业爱岗的职业素养,更好地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二是针对流动务工女性年龄小、文化低、法律意识淡薄等特点,依托职业技术学校、司法所、

法律援助中心等优势资源,开展关爱女工进村、进社区、进企业行动,体现真切的人文关怀,为她们提升综合素质创造条件,让她们展现出自尊、自信、自立、自强的精神面貌,并使她们更多地知晓自身所拥有的权利及保护自身权益的途径。

三是依托社区学校、业余党校等阵地,对流动妇女开展多种多样的教育课程,开设内容灵活多样,符合社会发展需要,以科学文化知识、劳动技能、生活常识为主,同时围绕核心价值观培育这一主题开展政治理论、爱国情怀、道德修养、法律法规等内容的系列讲座,从文化水平、法制观念和精神素质等方面加深流动妇女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解,为增强教育的穿透力,采取寓教于乐的方式,努力做到抽象的内容具体化、枯燥的理论生动化,便于流动妇女认同并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 (二)构建维权网络,化解流动妇女的矛盾纠纷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是人安身立命的价值归宿<sup>[7]</sup>。近年来流动人口群体出现从个人流动到家庭迁移的巨变,由此产生的流动妇女家庭矛盾纠纷增多,为流动妇女构建体现公平正义的维权网络成为迫切需要。

一是在构建调解网络中化解流动妇女家庭矛盾纠纷,促进流动妇女家庭和谐。各镇街道妇联组织建立健全以“化解邻里纠纷、调解家庭矛盾、维护妇女权益”为宗旨的村、社区妇女维权站,在促进本地妇女维权的同时方便流动妇女在最近网点找到组织,反应诉求,化解矛盾。

二是运用公益性社会组织构建流动妇女权益维护的网络。如奉化妇联充分运用“女法官工作室”“正雅律师事务所”“婚姻调解所”等公益性社会组织,为流动妇女及时解决困难,成功调解家庭纠纷。奉化妇联的做法值得借鉴,培育流动妇女的核心价值观需要这些社会组织共同参与。

三是在加强“妇女儿童之家”建设中为流动妇女提供综合维权服务。如普及法律法规政策,

引导流动妇女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经常了解流动妇女维权意愿和诉求,为她们提供心理调适、情绪疏导、法律援助等方面的咨询与服务;同时做好预防和制止流动妇女家庭暴力工作,让“妇女儿童之家”成为畅通流动妇女诉求,化解流动妇女矛盾纠纷的温馨“娘家”,在培育流动妇女核心价值观中发挥积极的作用。

## (三)开展各项活动,激发流动妇女的内生动力

在人生旅途中,曾经参加过的温情活动会让人难以忘怀。如上所述,奉化妇联正是通过开展温情的、诠释婆媳文化内涵的、能引起情感共鸣的活动,激发两岸婆媳践行核心价值观的内生动力。在培育流动妇女践行核心价值观中还须注重以下几方面活动的开展。

一是在开展荣誉评选活动中推出流动妇女模范。妇联组织引导流动妇女积极参与各级荣誉评选活动,有利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践行;流动妇女通过这类活动的参与,可提升主体地位,激发内生动力。如通过在流动妇女群体中评选“好媳妇”“好婆婆”等孝老爱亲、尊老爱幼模范,让流动妇女从榜样身上汲取精神能量,做到敬老、教子、相夫、善邻,以良好家风引领流动妇女群体的文明新风<sup>[8]</sup>。

二是在开展基层普法活动中促进流动妇女的道德养成。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内心的法律。妇联组织通过大力宣传男女平等基本国策,以及《劳动法》《妇女权益保障法》《就业促进法》里面有关男女平等就业的法律条款,一方面促使基层用人单位在招聘人才时充分体现公平公正,消除性别歧视,形成有利于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活情景和社会氛围;另一方面使流动妇女内心诚服,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三是在组织巾帼志愿服务活动中弘扬美德。志愿服务是美好的道德行为和重要的道德实践,是培育助人为乐、团结友善文明风尚的有效途径<sup>[9]</sup>。妇联组织在推进巾帼志愿服务活动中动

员流动妇女参与,让流动妇女在关爱邻里中崇尚友善,在服务社会中承担责任,努力实现核心价值理念与她们实际生活环境的无缝对接,激励流动妇女自觉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总而言之,妇联组织可通过社会资源的整合、维权网络的构建、各类活动的开展,来提高流动妇女的素质能力,化解流动妇女的矛盾和纠纷,激发流动妇女的内生动力,并最终形成培育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良性循环。

[参考文献]

- [1] 姜竹青.论推动大学生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J].山东女子学院学报,2014(5):91-93.
- [2] 董克难,等.社会组织分类与行为模式浅析[J].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2015(6):149-150.
- [3] 魏娜.官僚制的精神与转型时期我国组织模式的塑造[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2(1):87-92.
- [4] 张永英.妇联组织参与全面依法治国的路径与策略探讨[J].山东女子学院学报,2018(3):16-23.
- [5] 丁娥.少数民族妇女发展的多元特色与有效路径[N].中国妇女报,2017-12-05(B2)
- [6] 王志强.新时代农民工价值观变迁的趋向、成因及引领策略[J].宁波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5(1):49-54.
- [7] 刘国云.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女性伦理的引领[J].山东女子学院学报,2011(5):6-10.
- [8] 江措拉姆.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发挥好妇联作用的几点思考[J].中国妇运,2016(5):20-21.
- [9] 刘奇葆.在全社会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N].人民日报,2014-03-05(06).

## Research on the Women's Federation's Cultivation of the Core Values of Migrant Women: A Case Study of Fenghua, Zhejiang Province

QIU Shu-jie<sup>1</sup>, WANG Fei-qing<sup>2</sup>

(1. Party School of Ningbo Fenghua District Committee of CPC, Ningbo 315500, China;

2. Ningbo Fenghua Broadcasting and TV Center, Ningbo 315000, China)

**Abstract:** Women's Federation is highlighted for its dual roles in role positioning. It has the advantages of expanding fields and integrating resources and plays an irreplaceable role in cultivating the core values of migrant women. Zhejiang Fenghua Women's Federation focuses on "network construction", "marriage encouragement" and "heart-felt caring" and innovates the way to cultivate the core values of migrant women. Women's Federation to foster the core values of migrant women needs to rely on social resources to enhance the quality of migrant women, build a rights-protection network to resolve contradictions and disputes among migrant women, and carry out various activities to stimulate the endogenous motivation of migrant women.

**Key words:** Women's Federation; migrant women; core values

(责任编辑 鲁玉玲)

· 女性与社会发展研究 ·

# 移动互联网时代 我国女大学生新闻关注度的调查分析和应对

——以山东女子学院为例

张欣欣, 祁玉良

(山东女子学院, 山东 济南 250300)

**摘要:**包含大量有用信息的新闻,每个人都应当关注,女大学生作为未来国家的建设主体,更应该时刻关注国内外新闻动态,但是我国当代女大学生在新闻的关注度方面存在一些问题。利用问卷调查的方式对山东女子学院部分在校女大学生进行的新闻关注方面的调查结果启示我们,可以通过发挥时代优势、转变认识、激发兴趣、拓宽渠道、引导习惯养成和配合家庭教育等策略来积极应对这些问题,从而提高我国当代女大学生的新闻关注度。

**关键词:**女大学生;新闻关注度;移动互联网时代

**中图分类号:**G4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838(2019)01-0026-05

“百度百科”对新闻的解释是:指报纸、电台、电视台、互联网等媒体经常使用的记录与传播信息的一种文体,是记录社会、传播信息、反映时代的一种媒体。新闻是传播信息的非常重要的途径,大学生是未来建设国家的主力军,因此关注新闻对我国当代大学生来说具有重要意义。当代大学生尤其是女大学生新闻关注度的状况非常值得探讨和研究。

## 一、研究目的及意义

### (一)研究目的

信息创造价值,而新闻则是各类信息传播的主要途径,也是大众获取各类信息的重要渠道,对于未来国家建设者的大学生来说,关注新闻是他们了解世界的“一扇窗”<sup>[1]</sup>。那么现实生活中,

女大学生们对新闻的关注状况如何?存在哪些问题?为了更好地了解真实情况,本文设计了调查问卷,做了资料的收集、统计和分析,希望达到以下研究目的:(1)了解当代女大学生关注新闻的现状;(2)发现女大学生在关注新闻中存在的问题;(3)探索解决问题的对策。

### (二)研究意义

本文对移动互联网时代我国女大学生的新闻关注度进行了调查,分析她们在新闻关注中存在的问题,从而探索解决方案。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在大学生新闻关注方面国外有很多专家和学者进行过相关研究,并提出了一些极具价值的观点和结论。总的来说,国外对此问题的研究比

收稿日期:2018-10-27

作者简介:张欣欣,女,山东女子学院经济学院教师,主要从事产业经济学研究;祁玉良,男,山东女子学院经济学院教师,主要从事互联网金融及普惠金融研究。

国内要早很多。20世纪初,国外研究新闻学的学者已经发现了很多问题,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当前国外在此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四个层面,第一是微观—选择研究,第二是宏观—选择研究,第三是微观—建构研究,第四是宏观—建构研究,并分别在新闻把关、新闻流向、新闻内容与新闻媒介的社会建构分析、媒介帝国主义与媒介政治经济学等领域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sup>[2]</sup>。

国内的相关研究在时间上虽然迟于国外,但研究数据却也不少,并得出了很多有价值的结论。著名学者李安琪(2011)的研究显示了大学生阅读新闻的时长与他们所处年级之间呈现负相关关系,即大一学生关注新闻的时间最长,大二学生短于大一学生,大三学生又短于大二学生,大四学生阅读新闻的时间最短。刘龙启(2012)学者得出的研究结论是:大二学生阅读新闻的时间是最长的,其次是大四学生,再次是大三学生,关注新闻时间最短的是大一学生。除此之外,他还提出了大学生关注新闻的主要媒介是网络,关注新闻的内容日趋多元化等观点。

### 三、我国当代女大学生新闻关注度现状的调查和分析

为调查我国当代女大学生新闻关注度的现状,笔者于2018年6月25至6月30日选取山东女子学院的女大学生为调查对象,采用抽样问卷调查的方式进行。本研究共调查了山东女子学院235位在校女大学生,其中大一的女大学生占29%,大二的占40%,大三的占22%,大四的比例为9%。此次调查共收回有效问卷220份,有效率为93.6%<sup>[3]</sup>。经过对调查结果的收集、整理和统计,得出如下结果:

#### (一)关注新闻的频度

新闻关注的频度主要反映当代女大学生新闻关注的频率,即从时间上衡量她们对新闻的关注度。基于调查数据,本文认为我国当代女大学生的新闻关注度不高,关注新闻的频度也不高,但比较关注重大的新闻。此结论可以通过女大学生对问卷中三个问题的回答得到支持。在对“您对新闻的关心程度”问题的回答中,非常关心

的人仅占总数的13.8%,约63%的人是“一般关心”,“不太关心”新闻的占到调查人数的23%(见图1)在对“您关注新闻的频率”问题的回答中,只有15.4%的人是“每天至少看一次新闻”,大约有60%的女大学生选择了“偶尔关注重大新闻”(见图2);在对“泰国普吉岛翻船事故发生的原因”问题的回答中,95%以上的人回答的原因是“遭遇特大暴风雨”,说明她们比较关注重大国内和国际新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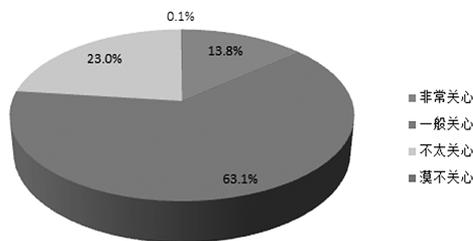


图1 当代女大学生关注新闻的程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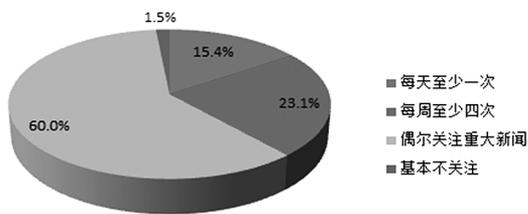


图2 当代女大学生关注新闻的频率

#### (二)关注新闻的角度

关注新闻的角度主要反映当代女大学生关注新闻的立场和视角。调查发现,女大学生主要出于个人角度去关注新闻动态。此结论可以通过对以下问题的调查获得支持:第一,对“您出于什么原因关注新闻”问题的回答,只有不到10%的人选择提升社会责任感;第二,对“关注新闻能带来什么好处”问题的回答,超过一半的人选择了“娱乐和兴趣、利于作业的完成、增加人际交往中的谈资等”;第三,对“阻碍大家关注新闻的原因”问题的回答,选择“没兴趣和与自己无关”的占到了68%的比重。由此可以看出,我国当代女大学生关注新闻的出发点主要是站在个人的立场,功利性较强。

#### (三)关注新闻的广度

新闻关注的广度可反映当代女大学生关注新闻的范围和内容。调查数据得出的统计结果显示,我国当代女大学生关注新闻的内容呈现出

多样化和广泛性的特点,其中大多数人对文化、娱乐和体育方面的新闻关注度较高<sup>[4]</sup>。这可从对“您主要关注新闻的哪些方面”问题的回答上看出:83.1%的女大学生都会关注文化、娱乐和体育方面的新闻;26.2%的会关注社会、医疗和教育方面的新闻,这说明她们也关注与民生相关的信息;20%的关注政治和军事方面的新闻,说明有五分之一的女大学生关心国家安全问题;关注财经和股市的仅有4.6%,反映了女大学生缺乏理财和投资意识<sup>[5]</sup>(见图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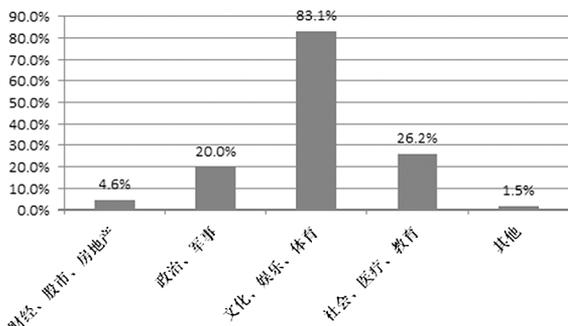


图3 当代女大学生关注的新闻热点

#### (四)关注新闻的深度

新闻关注的深度主要反映当代女大学生对新闻感兴趣的程度,以及对新闻反映的问题的思考能力。调查发现,多数女大学生对自己感兴趣的新闻会持续追踪和关注,且会有自己的思考。对“您会持续关注一个自己感兴趣的新闻吗”问题的回答,只有大约1.5%的人选择了“从不”,说明大部分女大学生会持续关注自己感兴趣的新闻(见图4);对“您是否会思考关注的新闻”问题的回答,78.5%的人会对新闻作出思考(见图5)。另外,对“您认为当代女大学生有关注新闻的必要吗”问题的回答,63.1%的人认为非常有必要,其余的认为有必要。

#### 四、发现的问题

由上述对调查结果的统计分析可以看出,目前我国当代女大学生在关注新闻方面存在一些问题:

##### (一)关注新闻较被动,缺乏积极性

一方面,仅有不到1/6的女大学生每天看一次新闻,说明她们没有积极主动地去关注新闻<sup>[6]</sup>;另一方面,约60%的女大学生会偶尔关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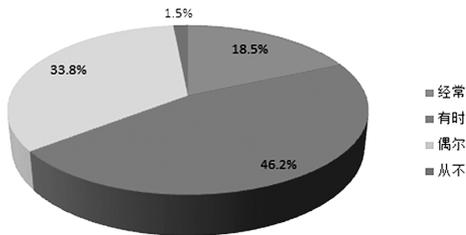


图4 当代女大学生持续关注新闻调查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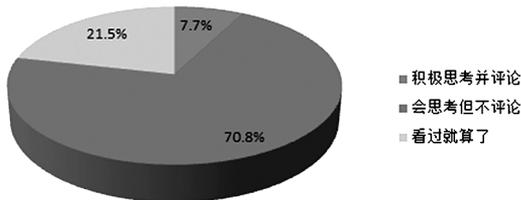


图5 当代女大学生对新闻进行思考情况图

重大新闻,这说明她们中大多数人在新闻的关注方面是被动的,要依靠外界输入。

##### (二)对新闻的关注不理性

受现实社会越来越功利化的影响,当代女大学生关注新闻往往缺乏理性,多是基于个人兴趣,因此她们关注新闻的内容随之呈现出一定的特点:感兴趣的较多关注,有点兴趣的偶有关注,不感兴趣的一点也不关注。这显示出她们在新闻关注方面感性而非理性的特点。

##### (三)行动滞后于思想,执行力差

调查发现,100%的女大学生认为关注新闻是必要的,这说明她们思想上都认同应当关注新闻,但仅有15.4%的人每天看一次新闻,这就充分说明她们的行动没有与思想同步。究其原因,笔者认为受两个方面因素的影响:一是当前这个时代是一个竞争非常激烈的时代,也是一个需要承受较大压力的时代。处于这样的时代,女大学生们大多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好好上课提升知识水平,或者通过多参加各种活动提升能力等方面,导致其时间和精力有限;二是懒惰也是行为滞后于思想的一个原因,即使思想上她们认同关注新闻是必要的,但由于惰性的存在,最终导致没有将这种关注付诸于实践和行动。

#### 五、提高我国当代女大学生新闻关注度的对策

笔者认为,可以从学校和家庭两方面入手,积极采取应对措施,形成合力,来达到提高女大

学生新闻关注度的目的。具体对策包括:

### (一)学校方面

1. 发挥移动互联网时代的优势。据 CNNIC 发布的有关报告显示,我国有超过一半的公民已经连接了互联网,其中 95% 以上的是手机网民<sup>[7-8]</sup>。笔者认为,高校应把握住这一契机,结合移动手机人人必备的有利条件,积极鼓励我国当代女大学生在移动手机客户端下载新闻 APP,这是提高她们对新闻关注度的十分有效的措施之一<sup>[9]</sup>。

2. 加强教育,转变认识。针对大学生新闻关注度不高的现状,学校需要加强教育,紧密结合当代女大学生这一群体的特点,采取适合她们的方式和方法努力转变她们的认识<sup>[10]</sup>,力求从根本上使她们认同关注新闻的益处。

3. 采取多种方式激发兴趣。调查发现,接近 70% 的女大学生认为阻碍她们关注新闻的原因是没兴趣和与自己无关,因此激发她们对新闻的兴趣就显得尤其重要,实践中可以通过多种途径来达到这一目的。在此次调查问卷中,最后一个开放性问题“您认为如何提高当代女大学生的新闻关注度?”女大学生的回答有很多可以肯定的地方,比如利用微信、微博等新媒体平台进行宣传、将新闻变得更加娱乐化、老师上课过程中尽可能多地引入与知识点相关的新闻、开设新闻相关课程等。除此之外还可以通过开展辩论赛或者组织演讲来提高她们对新闻的兴趣,也可以成立与新闻相关的社团组织,在社团内部一起探讨新闻热点<sup>[11]</sup>。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对新闻产生了兴趣,那么对新闻的关注度自然就会提高<sup>[12]</sup>。

4. 拓宽关注渠道,营造氛围。校园无疑是学生们的活动区域,因此高校应当充分利用这

个特点,为学生创造一个良好的阅读新闻的环境,努力拓宽女大学生们关注新闻的渠道,如增设 LED 电子屏幕,随时滚动式播放最新的新闻热点;及时更新校园橱窗内的新闻,帮助学生们获取更多的信息;创建“新闻之声”之类的专门收看新闻的场所,使学生们能够及时收看最新的时事新闻等。同时,辅导员老师要积极做好相关的新闻渠道的宣传工作,营造浓厚的关注新闻的氛围<sup>[13]</sup>。

5. 引导养成良好习惯。习惯的力量是很强大的。具体来说,笔者认为可以尝试的方式包括:辅导员和班主任的督促检查、班级氛围的影响、同学之间的提醒和学生自律等习惯成自然,每天关注新闻的良好习惯一旦养成,将会使每个学生受益终生。

### (二)家庭方面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即使孩子已读大学,父母对她们的影响仍然十分重要。因此,在家庭教育中,家长首先要以身作则,树立榜样。家长应积极看报、看新闻,让孩子潜移默化地受到影响;其次要帮助她们认识到关注新闻的必要性。与此同时,要加强和学校之间的联系,发挥学校和家庭配合教育的最大合力作用,提高当代女大学生的新闻素养和对新闻的关注度。

总之,我们的时代是一个全新的时代,女大学生是国家未来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新闻对当代女大学生而言,有利于她们提前了解社会,总结经验教训,锻炼思维能力,扩大视野。但调查发现,她们在关注新闻方面存在一些问题,那么学校和家庭应当结合时代特征,积极创造良好的环境,利用多种途径引导和帮助她们提高新闻素养,促进女大学生们更好地成长、成才。

### [参考文献]

- [1] 车勇成. 移动互联网时代新闻传播的变革[J]. 新媒体研究, 2015(1): 1-3.
- [2] 张婷. 理工科大学生新闻关注度挖掘分析[EB/OL]. (2016-10-11). <http://www.docin.com/p-1755376854.html>.
- [3] 邓烽, 陈正香, 陈玲玲, 田伊伊. 大学生对新闻关注度及关注方向分析报告——以福建部分地方高校为例[J]. 数字化用户, 2013(9): 120-121.
- [4] 刘竞涛. 新媒体视野下大学生新闻关注问题初探[J]. 学周刊, 2014(34): 52.
- [5] 张广磊. 新闻类型偏好与性别、专业及性格[J]. 新闻爱好者, 2011(24): 58-59.

- [6] 郭小平,黄太莹. 陕北地区在校大学生对时政新闻关注度的调查与分析[J]. 天水师范学院学报,2018(3):118-122.
- [7] 彭训文. 移动新闻迎来风口[N]. 人民日报海外版,2017-01-16.
- [8] 周小云. 移动互联网时代下大学生对于新闻关注状况的调查研究——以K市高校为例[J]. 湖南邮电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7(3):90-92.
- [9] 吴家家. 大学生移动新闻阅读调查与研究——以西南地区高校为例[J]. 太原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5(7):83-85.
- [10] 帅进,詹青青,许小凤,叶欣蕾,林丹. 新媒体背景下大学生对时政缺乏兴趣的原因分析[J]. 科教文汇:下旬刊,2016(2):4-8.
- [11] 聂旨怡,何丹,周美宏,李文杰. 当代大学生对时政的关注度现状调查与对策思考——以海南大学为个案分析[EB/OL]. (2016-10-11). <http://www.docin.com/p-1519365031.html>.
- [12] 母春兰,邹陈程,季柳,路博文,王自春,蔡丽莉. 在校大学生对时政新闻的关注情况——以川北医学院为例[J]. 科技创新导报,2014(13):166-167.
- [13] 沈佳怡,金海霞,刘文雁. 新媒体时代下大学生对时事新闻的关注度及偏好研究——以江苏大学为例[J]. 新闻研究导刊,2018(11):6-7.

## The Survey and Measures for Female College Students' Attentions to News in China in the Era of Mobile Internet

ZHANG Xin-xin, QI Yu-liang

(Shandong Women's University, Jinan 250300, China)

**Abstract:** With national missions on their shoulder, college students should be a group of people paying attention to news. And female college students are no exception. But there are some issues about contemporary female college students' attentions to news in China, which needs to be actively addressed. A survey has been done on some female college students' attentions to news in Shandong Women's University through questionnaire. Based on investigation results, measures including giving full play to the era, transforming awareness, stimulating interest, guiding habit cultivation and cooperating with family education have been proposed in this paper to deal with these issues and to further increase contemporary female college students' attentions to news in China.

**Key words:** female college students; attentions to news; mobile internet

(责任编辑 文向华)

# 新时代发挥家庭在社会建设中的独特作用

黄桂霞

(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 妇女研究所, 北京 100730)

**摘要:**从家庭的人口再生产功能出发,对家庭在社会发展、精神文明建设中的独特作用以及妇女在家庭和社会中的独特作用进行讨论和分析,并结合福利国家对家庭与社会福利的定位与重塑,提出要承认以家庭为主的人口再生产在社会发展中的独特价值,政府、市场、社会与家庭协同,为发挥家庭在社会建设中的独特作用以及家庭成员发挥独特作用提供支持。

**关键词:**新时代;家庭;社会建设;独特作用

**中图分类号:**D66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838(2019)01-0031-07

作为生产经营单位,家庭在社会发展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家庭手工业时期,家庭甚至成为社会发展的主体力量;作为社会发展的最小细胞,家庭还承担着繁衍人类、维系社会长期发展的重任。正如习近平所言,无论时代如何变化,无论经济社会如何发展,对一个社会来说,家庭的生活依托都不可替代,家庭的社会功能都不可替代,家庭的文明作用都不可替代。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工业化城市化的进展,人口老龄化、家庭核心化、离婚率上升等现象带来了家庭照顾缺乏、抚育成本增加等社会问题,影响了家庭甚至社会的稳定,在倡导发挥家庭作用的同时,政府也要给予更多的支持,使家庭成为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点,成为人们梦想启航的地方。

## 一、家庭在社会发展中的独特作用

家庭,曾经是社会和国家赖以凝结的核心。一定时期内家庭的基本功能是物质生产,但一直

以来家庭固有的独特功能是人口再生产,包括生殖抚育、家庭照顾以及家教、家风的传承与发展。“如果家庭能够影响其所在的环境,那么它将会转向提高生产力的那些方面,通过在校学习、锻炼、迁移、选举等,他们就可以‘生产’良好的教育程度、健康的体魄、怡人的气候或政治上的稳定。”<sup>[1]</sup>

### (一)家庭是人口再生产的基本单位

社会发展的动力源自于人自身,马克思主义提出,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最终目标。人才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和源泉,是国家的核心竞争力。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贝克尔曾说:“如果说科技是现代经济腾飞的发动机,人才就是这个发动机得以运转的‘燃料’。”研究显示,人才与经济发展有着高度的相关性,经济增长对人才总量增长的弹性系数为1.28,即人才总量每增长1%,推动经济增长1.28%。相比较而言,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明

收稿日期:2018-11-09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专项课题“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发展道路研究”(项目编号:18VSI105)

作者简介:黄桂霞,女,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妇女研究所妇女理论研究室副研究员,博士,主要从事妇女就业与保障、性别平等研究。

显低于人才的贡献率,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每增长1%,只能拉动经济增长0.44%<sup>[2]</sup>。

人的生产与人才的培养都依赖于家庭。家庭是人们基于婚姻关系和血缘关系组成的社会细胞,在人类社会早期主要承担了物质生产的功能。19世纪末,工业化的家庭工作其实可以算得上是一种全体性的职业,老幼妇孺齐上阵,家庭完成了大部分的社会生产任务。机器大工业以来,物质生产基本脱离家庭转向工厂、农牧场等公共场所。但是,迄今为止,人口生产都是在家庭中完成的,婚姻家庭是人口再生产的基本条件。费孝通先生曾讲到,婚姻的意义在于以社会力量来确立抚育子女的双系结构。尤其在中国,婚姻是合法生育的必要条件。生育包括生殖和抚育两个阶段,生殖是新生命的缔造,抚育是生活的供养和社会性的教育<sup>[3]</sup>。家庭作为生育行为的实施者,提供必需的生活供养,承担着重要的生殖和抚育责任。生育与女性有着天然的联系,是女性获得文化认同和体现自身价值的一种方式。依据目前的技术条件,生殖行为依赖女性来完成,主要是基于女性特殊的生理特点。而抚育责任需要家庭成员尤其是父母双亲共同承担,生殖与抚养对于人作为生物体的繁衍的影响是巨大的,但培养幼儿成长为社会劳动力资源,家庭的教育和社会性的抚育则更加重要,任务也更加艰巨。

## (二)家庭为劳动力再生产提供全面特殊的照顾

家庭,以人的依赖关系为主。以育幼等为主要任务的家庭照顾主要有三个特色:一是情感劳动的投入。父母之爱是孩子精神食粮中的精品,不可缺少且无可替代;家庭照顾/教育与社会照顾/教育的最大区别是其存在血缘关系和亲情关系,这种关系使得照顾者和被照顾者之间有着因天然的信任感和依赖感而产生的安全感。二是个性化、私人化。家庭抚养和早期教育属于私人化行为,孩子的安全感主要来源于父母的亲密接触,尤其是婴幼儿时的身体接触,父母亲力亲为,通过陪伴、关爱、照顾等时间、精力、情感、智慧等方面的投入,“因材施教”地培养孩子的品性,实

现家庭教育功能。家庭教育无法像物质产品那样工业化生产,没有标准、不可批量。三是难以市场化,具有高使用价值低交换价值特点。虽然有些照顾工作可以由市场提供,但程序化的照顾只是满足了基本生存/生理需求,被照顾者需要的亲密接触和情感交流,在标准化的照顾程序中很难获得,而且这种情感获得很大程度上来源于特定照顾者。

相比于市场,家庭照顾/抚育也有几个优势。一是低成本性。家庭内的照顾提供主要通过赡养和抚养关系实现,由于家庭成员之间的感情关系,照顾提供是自觉自愿的,不需要管理成本,因此,具有低廉的优点。二是及时高效性。家庭不仅能保障成员的衣食住行等基本生理需求,还可以满足成员之间的交往、情感及教育方面的精神需求,而且因与家人关系的紧密性,照顾者能及时快速地识别成员的具体需求并给予满足。三是不可替代性。研究表明,社会机构在传授知识和技能方面有一定的优势,但是在培养孩子的行为举止、人生观、道德观以及性格习惯方面,无法与家庭相比,即使孩子大部分非睡眠时间是在学校,但家庭对他的影响却比学校大。另外,孩子的成长不仅寄托着家庭的希望,孩子也会为了获得家庭的认同而主动愿意成为更优秀的个体:为了家庭荣誉感和归属感,为了家长的认同和情感回馈,孩子会以家人为榜样、以家庭要求为标准,不辜负家长期望,成长为对社会有用的人。

## (三)家庭教育和家风传承是社会建设的基础

家庭、家教、家风三者环环相扣,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家庭具有生殖、抚育的社会功能,是儿童社会化的重要领域。家庭教育是一切教育的起点和基础,是塑造人、培养人必不可少的一环,只有在良好的家教环境下,孩子才能健康快乐成长,成为对社会、对国家有用的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充分体现了家庭教育对于国家和社稷发展的基础作用。家庭教育涉及很多方面,但最重要的是品德教育,是如何做人、做事的教育。古今中外,卓有成就的名人在幼年时期受到的良好的家庭教育是他们日后成才的一个重

要基础。“陶母教子”的故事是一个很好的范例<sup>①</sup>,其成功的秘诀就在于陶母具有高尚的教育理念,并将廉洁奉公等高尚品德运用于廉洁教育。习近平对国家的责任感与使命感,离不开其幼年时期母亲齐心在生活中点点滴滴、潜移默化的教育,也离不开父亲习仲勋的言传身教。他在《我的文学情缘》里讲到,母亲给他买小人书并且给他讲精忠报国、岳母刺字等故事,使得他从五六岁起就将“精忠报国”四个字铭记于心,并成为他一生的追求与实践。习仲勋多次对儿女们说:“我没给你们留下什么财富,但给你们留了个好名声。”正是继承了父亲巨大的无形财富,习近平才能成长为“精忠报国”、不忘初心、爱民如子、爱国如家的国家领导人。家庭教育虽然与家庭所在阶层和社会发展阶段密不可分,但在一定程度上又可以单独发挥作用,甚至有很强的溢出效应,孟母三迁等子女教育个案甚至形成了一种教育理念和教育模式,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家庭。

家风是一个家庭的价值取向、文化传承和精神风尚,是家庭教育的直接产物。好家风对形成好的社会风气具有基础性作用,中华民族家庭美德的弘扬和良好家风的树立不仅关系到家庭和下一代健康成长,也关系到社会和谐以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践行。《礼记·大学》中说:“所谓治国必先齐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领导干部的家风,不仅关系自己的家庭,而且关系党风政风。千千万万个家庭的家风好,子女教育得好,社会风气好才有基础。

## 二、女性发挥“家庭独特作用”与社会发展主体的互动与转换

从人的自然属性来看,因为生育,女性在社会发展中是有独特作用的,但从人的社会属性来看,女性又可以与男性一样平等发挥社会主体性作用。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的劳动性别分工,导致家庭独特作用的发挥以女性为主体,而公共服务的兴起及不断完善,为妇女走向社会,参与社会生产和公共领域提供了更多的机会。

### (一)女性发挥家庭中“独特作用”的利弊

女性在家庭中发挥着独特作用,在家教、家风传承中发挥主导作用,有利于家庭稳定、社会和谐,在一定时期内有利于家庭经济效益最大化,有助于人口结构的调整,对社会发展起到稳定与促进作用。

尽管人口的生产在家庭以及社会发展中都至关重要且难以被替代,女性作为人口再生产的承载主体,为社会、民族的繁衍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是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而且这支力量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男性难以替代的,然而女性在家庭照顾、家教、家风传承中的作用并非不可替代。女人的生育主体身份不仅让她们成为人口生产——怀孕生殖的天然责任人,也让她们成为人口质量——抚养教育的自然责任人,家庭教育以女性为主,家风的传承也更多地寄希望于女性。但事实上女性的抚养教育的责任是文化和社会等外力因素赋予的,这一方面是由劳动性别分工、公私领域的分割所致,另一方面由文化对母亲身份的强化深化所致。

人口再生产基本是以女性为主,这也给女性的社会参与和社会地位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首先女性是生养的主体,在育幼中又承担了主要责任。但是,由于劳动力市场的性别分工以及公私领域的价值分割,在社会以公领域劳动为评价标准的时期,“妇女的家务劳动现在同男子谋取生活资料的劳动比起来已经失去了意义;男子的劳动就是一切,妇女的劳动是无足轻重的附属品”<sup>[4]152</sup>。女性不但没有得到相应的尊重和报酬,反而被认为是低技能、低价值的人群,在家庭中处于从属地位。其次,由于女性在家庭中承担了大量繁杂且无酬的家务劳动,基于人类精力的有限性,这导致她们只能放弃或者减少对有偿的社会劳动的付出,她们因此也就失去了分享社会福利的机会与权利。最后,女性对家庭经济的依赖,甚至造成她们独立人格的缺乏。马克思也曾给妇女解放指明了道路,那就是大量地、社会化规模地参加生产,而家务劳动只占她们极少的时间。

<sup>①</sup> 陶母是东晋名将陶侃的母亲湛氏,是中国古代一位有名的良母,与孟母、欧阳母、岳母一起被尊为中国古代“四大贤母”。

间。而这要在现代化大工业社会才能实现,到那时,社会不仅允许大量妇女劳动,还要把私人的家务劳动溶化在公共事业中<sup>[4]152</sup>。

## (二)家庭照顾与公共服务的转换

家庭照顾、家庭教育等与社会公共服务不仅目标一致,在理念和实施方式上也是相通的。将妇女对一个家庭的管理和服务作用,间接地服务于其他的家庭,将妇女在家庭中较窄的服务范围和作用扩大拓展到社会服务中来,更好地发挥其在公共服务中的主体性作用。中国在这面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能在做好物质资料生产的同时,依靠群众尤其是妇女群众搞好集体福利事业,建立服务站、邻里互助组等,更好地为生产服务,为群众服务。其作用主要有三方面:一是采取互助的方式分担其他家庭的家庭照顾负担;二是利用互助服务的支持参加社会生产活动;三是直接参加社会生产活动,尤其是积极参加大量的后勤服务活动,为其他家庭提供支持。集体主义时期,职工家属的家务劳动被视为公共劳动的一部分,家属自组织成为集体主义时期单位福利事业的一部分,妇女在家庭中的作用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和尊重。正如前妇联主席蔡畅在1957年第一次全国职工大会上的报告所讲的:“社会制度变了,家务劳动的性质和意义也跟着变了。在旧社会里,家务劳动是没有人看得起的,更谈不到光荣了,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家务劳动成了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劳动,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所必需的劳动,因此是光荣的劳动。”

家务劳动社会化可以弱化甚至消弭女性家庭独特作用与社会主体性之间的鸿沟。“随着生产资料转归社会所有,个体家庭就不再是社会的经济单位了。私人的家庭经济变为社会的劳动部门。孩子的抚养和教育成为公共的事业。”<sup>[4]130</sup>这是家务劳动社会化的最后目标,从家务劳动的私领域到社会公共服务的公领域,其实是一个逐渐过渡转换的过程,与社会制度、生产力发展以及生产方式都相关,也与对私领域劳动社会价值的认同有关。机器大工业的兴起,很多靠手工完成的家务劳动完全可以借助现代化的机器来实现,妇女可以获得进一步的解放和社会

认同,实现从持家和养育子女到养家、持家、培育子女的功能转变,家庭中独特作用的发挥不再是女性的专利,而是与家庭内男性共同分担。将家务劳动看作是社会主义劳动的一部分,还应当鼓励男性积极参与家务劳动。而在市场经济时期,个体家庭的独立性增强,这时政府可以通过向家庭成员或者被照顾者的亲戚朋友购买服务,来满足家庭照顾的需求,以新的方式体现家务劳动的社会价值。

## (三)重新定位女性的家庭独特作用与社会主体性

中国传统“男主外、女主内”的文化导致了女性成为家庭独特作用的主要承担者,并在一定程度上用女性独特作用替代家庭独特作用。在实践中,女性在家庭中的独特作用和社会主体性的界限有时是模糊的,比如在中国传统农业社会,虽然社会规范要求女性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但在日常生活中,尤其在家庭男劳力不足时,很多女性走出家门从事农田劳动,甚至去市场参与买卖,纺织本身也不再局限于家用,大量的纱布鞋子被拿到集市上卖掉,有些妇女还会承担邻居的织布活,并接受工钱,这种工作成为家庭手工业的一种,也进而成为社会劳动的一部分。其实,在很多地方比如陕西,妇女一直以来都是农业劳动者和家庭经济的贡献者。

女性在人口再生产中的独特作用,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也是女性在社会发展中发挥主体作用的一种方式。由于人类自身生产的特点以及男女两性生理构造的差异,决定了妇女是人类自身生产的主要责任者。费孝通先生曾提出,生育是一件损己利人的事情,如果要彻底为自己的利益打算,就得设法避免生殖。也就是说,生育的价值更多的是为家庭、为社会,进一步说,人类自身再生产的过程也是家庭为社会提供劳动力的过程,具有极大的社会价值。“生儿育女的妇女对国家作出的贡献决不小于用自己的生命抗击侵略成性的敌人来保卫家园的男子。”<sup>[5]</sup>李达先生认为生育是有社会价值的神圣的职业,“性和生育是社会经济基础的一部分”<sup>[6]</sup>,养育孩子是“一件极其重要又极根本的社会事业”<sup>[3]73</sup>,人

们通过生育创造新生命,为物质再生产提供劳动力资源。人类自身生产劳动力的过程具有明显的社会价值,一方面是生产的劳动力使用价值的实现,另一方面劳动力的培养本身具有社会价值。所以,人类自身再生产的基本单位虽然是家庭,但绝不是家庭的私事,而是具有明显的社会性和巨大的社会价值。罗素提出:“孩子是属于国家的利益,而不是父母的,他们的费用理应由国家支付,而不应让这沉重的担子落在父母身上。”<sup>[7]</sup>

其实,生育和养育是人类崇高的、具有极高价值的事业。生育本身的社会价值使女性在生育和养育中的独特作用具有了主流化的社会功能,在母系社会,女性特有的生育以及哺育后代的功能,因关系到种族的繁衍,使得女性受到高度尊敬。社会对生育对人类的贡献给予充分的承认,其实就是对女性在人类种族繁衍中的贡献给予社会性的承认。

### 三、家庭在发达国家的定位与重塑

尽管发达国家有较好的社会福利制度,但每个国家的家庭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与功能都不相同,各国政府对家庭的支持也各不相同。从福利提供和发挥作用的角度来看,家庭在社会中发挥作用主要有四种模式:一是“去家庭化”的国家福利模式;二是家庭为主要福利提供者的去市场化模式;三是家庭为主要福利提供者,而政府为家庭福利提供政策、财政支持的协作模式;四是以个体福利为核心,市场为主、政府为辅的模式。

#### (一)政府为个体提供全面的保障

20世纪以来,随着妇女大量进入劳动力市场、离婚率上升、家庭人口规模缩小等现象的出现,家庭领域中的争议和问题不断涌现,北欧等许多国家开始越来越多地介入私人领域。福利国家兴起后,公私二元对立的观念逐渐受到理论和实践的摒弃,发展社会福利成为解决社会问题的一种方式,也成为影响国家政局的主要因素。为了弥补家庭传统的社会保障功能的缺失,实现扶弱助贫、促进社会公平,政府通过再分配成为社会福利的主体,逐渐替代家庭的保障和福利功

能,向公民提供公共福利是政府的责任成为普遍共识。

国家和政府是福利的主要提供者,国家负责分配所有的资源,也负责提供所有的服务,福利以个体为单位,为个体提供独立于家庭之外所需要的各种资源,所以“去家庭化”是其主要特征之一,也是社会主义福利体制的主要特征。社会民主主义福利体制,主要是北欧各国社会民主主义政府执政的成果,普遍主义和平均主义是其核心价值观。中国计划经济时期,尤其是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情况与此类似,国家通过单位对家庭和个人进行全面的保障,从养老育幼到生老病死。

其实,早在100年前,瑞典就开始接替教会和私人慈善组织承担救济贫困和失业家庭、为家庭提供福祉的责任。以法国为代表的政府,将生育作为政府的主要责任,采用现金补贴、产假和儿童保育等政策措施来保障家庭的生育,减少家庭生育的障碍。

#### (二)福利危机致使部分国家重置家庭传统功能

作为福利提供的中心导致部分国家财政负担较重,政府不得不削减福利提供以减轻财政压力。中欧和东欧的前共产主义国家表现出“再家庭化”和“母性化”的倾向,公共服务私有化,比如,波兰因外债不得不进行市场化改革,更多地依赖市场解决家庭问题,促使女性从工作场所重回家庭。育儿假时间虽然长,但无薪,只有微薄的育儿津贴;妇女重新被看作主要的照料者,公立儿童托育体系消失,儿童托育市场化等现象重现。福利国家在应对危机过程中,逐渐转变政府角色,从福利直接提供者转变为支持者,比如鼓励市场组织、公民社会组织等与政府形成多种形式的伙伴关系,或者由政府通过购买公共服务的方式,向家庭照顾者提供保障或者补贴。

以德国为代表的政府肩负支持家庭的责任,意图保留传统家庭,期待传统的性别分工模式,鼓励男性养家糊口,对外出工作的母亲提供一些福利,但没有完全消除女性就业的障碍,没有给妇女提供兼顾工作-家庭的机会,政府倾向于延

长儿童保育期,以使母亲能够在工作获得保障的同时有更多时间在家庭照料幼儿。意大利、西班牙、希腊、葡萄牙等南欧国家,主要依靠包括家庭在内的家族来提供家庭照顾等福利,为脆弱和贫困的家族成员提供帮助和支持是家族的责任和义务。社会福利只面向公共部门和男性,而不是向全员提供。

### (三)政府支持家庭行使责任

在工业化和市场经济时期,西方发达国家普遍经历了急剧的人口和家庭变迁,人口出生率遭到破坏,人口老龄化严重,家庭逐渐失去传统的社会功能,越来越多的国家意识到政府在家庭方面的责任。福利危机又使得福利国家在应对危机过程中,逐渐转变政府角色,开始把支持家庭和促进家庭发展当作政府和全社会的目标,协调国家、社会、市场、家庭与个人多方合力,为承担家庭是任提供支持,比如组织市场组织、公民社会组织等与政府形成多种形式的伙伴关系,作为政府提供福利和保障的工具,或者政府通过购买公共服务的方式向家庭照顾者提供保障或补贴。

国家主要作为辅助者,支持家庭成为具有凝聚力、可以良好运行、发挥家庭保障功能的单位,家庭是福利的主要提供者,政府的支持以家庭为单位。法国在1939年出台了《家庭法》,明确指出通过支持家庭的经济生存能力来强化家庭的功能。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几乎欧洲大部分国家都出台了家庭津贴政策。

韩国、中国、日本等国家,家庭在福利提供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北欧国家,如瑞典和丹麦等采取了不同的方式,通过为工作的父母提供支持,创造条件和机会使妇女能够更容易地兼顾就业和家庭,促进父亲在儿童保育方面扮演更为积极的角色,促进男女平等。

## 四、发挥家庭独特作用面临的困境及应对策略

家庭问题不是私领域的,而是具有明显公共意义的问题。比如,对人口再生产社会价值的认同,不仅是对女性的尊重,更是关乎社会发展的大事,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准。在家庭照顾、家

庭教育成本越来越高,福利国家日渐出现危机的情况下,需要重新审视家庭在社会建设中的定位与作用,重视人口再生产尤其是家庭承担主要责任的生养抚育工作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和价值。

### (一)政府增强公共服务,提高家庭发展能力

人口再生产、家务劳动、家庭照顾尤其是育幼,不仅是家庭的责任,也是政府的责任,各国政府都采取不同的方式为家庭照顾提供公共政策、资金以及服务的支持和保障。其一方面,增强公共托育早教服务和社会化的儿童托育机构建设,增加儿童照顾和教育的公共服务供给,减少家庭尤其是女性的照顾负担。另一方面,通过为家庭照顾提供支持的方式让家庭更好地发挥传统照顾功能,比如给家庭照顾者提供基本的社会保障,或者可以采取将公共服务与非正式照顾捆绑的形式,通过向家庭成员、亲戚、朋友等购买服务替代向机构和市场购买服务,既满足了被照顾者的照顾需求和情感需求,为家庭照顾者提供较好的保障,又可以提高女性人力资本红利、增强家庭总体发展能力。

### (二)改变女性主导的家庭照顾模式

非正式照顾为家庭成员提供了方便易得的高质量照顾服务,满足了他们的情感等特殊需求,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代替了社会服务,是现阶段社会发展尤其是社会保障发展、社会服务必不可少的一项工作内容。但家庭的非正式照顾工作主要由女性承担,这不仅降低了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和参与度,也降低了家庭的经济收入和风险抵抗力。社会一方面需要打破传统“男外女内”的劳动性别分工模式,为女性提供平等就业机会,实现女性更高质量和更充分就业,提高女性劳动参与率和人力资本收益率。另一方面,政府要为男女两性在人口再生产中各负其责、各显神通创造条件。基于生理差异的生殖行为是女性在人口再生产中发挥独特性的集中表现,但是在抚养教育中,两性的权利和责任是平等的。要促进家庭家务生活中的男女平等,比如制定针对双亲的育儿假而不是仅面向妇女的产假;也可以探

索实行灵活工作方式和灵活工作时间等增加工作弹性的方式,将有酬工作与非正式照顾结合起来;让男性更加均衡地分担家庭照顾责任,减轻女性的照顾负担。

### (三)社会协同支持家庭发挥独特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原来由政府承担责任的社会服务供给逐渐转移给家庭,家庭成为照顾服务供给的基本单元和主要责任者,但家庭核心化趋势使得家庭照顾功能弱化,社会介入弥补家庭照料不足成为必然。同时,工业化、城市化发展使得

越来越多的人居住在离工作场所较远的地方,这一方面增加了往返交通的时间,导致人们用来家庭照顾的时间大幅减少;另一方面居住地与工作场所距离太远,再加上交通拥堵,导致单位的很多照顾保障功能难以实现。这种情况下,需要社区提供相应的照顾支持服务,替代家庭的部分照顾功能;用人单位也要在保证工作正常开展的情况下,创造条件为有家庭照顾需要的职工提供工作—家庭平衡支持。

### [参考文献]

- [1] 加里·S·贝克尔. 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M]. 王业宇,陈琪,译. 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150.
- [2] 胡瑞文,杜晓利. 人才是增强国家竞争力的根本[J]. 前线,2005(12):27-28.
- [3] 费孝通. 生育制度[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
- [4] 恩格斯.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M]//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妇女联合会.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妇女.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
- [5] 倍倍尔. 妇女与社会主义[M].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5:299.
- [6] 阿利森·贾格尔. 女权主义政治与人的本质[M]. 孟鑫,译.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203.
- [7] 罗素. 婚姻革命[M]. 靳建国,译. 北京:东方出版社,1988:139-140.

## Bring the Special Function of Family into Full Play in Social Development in the New Era

HUANG Gui-xia

(Women's Studies Institute of China, Beijing 100730, China)

**Abstract:** This article starts from the reproduction function of family and comes to elaborate on the essential function of family in social and cultural development, and the special function of women in family and society. Referring to the repositioning of family and social wellbeing of welfare countries, this article proposes that the exceptional value of family in population reproduction should be acknowledged, and that government, market and society should cooperate with families to render support to the full play of families and family members in the social development.

**Key words:** new era; family; social development; special function

(责任编辑 文向华)

· 家庭问题专题研究 ·

# 互动视角下婚姻暴力的发生、发展与维持

——基于对两对夫妻的访谈研究

向小平, 王晓婷

(北京理工大学, 北京 100081)

**摘要:**以互动视角为指导理论,采用目的性方便抽样方法,对两对存在情境暴力的夫妻进行深入访谈发现,情境婚姻暴力中夫妻双方都有参与,单次婚姻暴力普遍经历了从言语激化到肢体暴力的过程,在互动过程中,妻子多是言语攻击的发起者和激化者,躯体暴力则多为丈夫发起和终止;从纵向发展看,婚姻暴力中言语交流、言语攻击和肢体暴力的强度和持续时间随着婚姻暴力的发展而变化,躯体婚姻暴力经历短时间的加剧后逐渐趋向减弱,但冷暴力变得日趋频繁和强烈。

**关键词:**婚姻暴力;互动视角;发展历程

**中图分类号:**C913.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838(2019)01-0038-07

## 一、引言

家庭暴力,尤其是针对妇女的婚姻暴力,一直是全球性的社会问题。2016年我国正式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将家庭暴力界定为“家庭成员之间以殴打、捆绑、残害、限制人身自由以及经常性谩骂、恐吓等方式实施的身体、精神等侵害行为”,即家庭暴力既包括了肢体暴力,也包含了精神暴力(语言暴力、冷暴力)、性暴力等。有调查显示,全球15岁以上的女性中有30%左右的在其一生中遭遇过婚姻暴力,在住院病人中遭遇过严重家暴的比例更是高达30~60%<sup>[1]</sup>。2012年我国学者崔轶在7个省市开展的调查显示,夫妻间肢体暴力的发生率为34.8%,精神暴力发生率为55.6%<sup>[2]</sup>。

婚姻暴力作为公共健康问题,会给家庭成员带来诸多负面影响。与从未遭遇婚姻暴力的女性相比,遭遇婚姻暴力的女性患冠心病、慢性颈椎痛、腰痛等慢性疾病和慢性疼痛、羸弱的功能性健康疾病、疑难杂症、性病等躯体和身心疾病的几率更高,出现抑郁症、创伤后应激障碍、焦虑症、自残以及睡眠障碍等精神问题的可能性更大<sup>[3]</sup>。婚姻暴力同样增加了男性抑郁、自杀等严重心理症状的可能性<sup>[4]</sup>。同时,父母之间的暴力也给儿童的生理和认知发展,心理和行为健康带来短期和长期的负面影响<sup>[5]</sup>。

婚姻暴力在全球范围内的普遍性和严重影响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在研究中也形成了两种理论<sup>[6]</sup>:一是女权主义理论,认为婚姻暴

收稿日期:2018-10-17

基金项目: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青年项目“双重家庭暴力对流动儿童心理健康的影响机制研究”(项目编号:17SRC023)

作者简介:向小平,女,北京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讲师,博士,主要从事社会工作研究;王晓婷,女,北京理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社会工作和社会管理研究。

力是男性控制女性、维持自身主导地位的一种手段,其根源是父权制下的性别不平等;二是家庭冲突理论,强调家庭暴力是由日常生活中的压力所引发的,是夫妻间的冲突和分歧未通过讨论、协商、妥协等和平方式妥善解决而升级的结果。Johnson 结合前人研究,提出这两个理论的争端主要因研究对象不同而引起<sup>[7]</sup>;前者的研究集中于相关机构中的受暴妇女,她们遭受的多是男性实施的严重暴力,其目的在于强制性的完全控制受害者,Johnson 将这种暴力称为亲密恐怖主义(Intimate terrorism);而后者多来自对普通大众的调查,这些研究发现男女两性发起和参与暴力的频率相当,其暴力行为是特定情境下一方或双方的紧张情绪导致的,Johnson 称其为情境夫妇暴力(Situational couple violence)。研究指出,情境夫妇暴力是最常见的暴力形式<sup>[8]</sup>。国内学者徐安琪的调查也显示,上海丈夫打妻子的发生率为18.6%,但其中经常性动武的仅占1%~2%,绝大多数是偶尔的一时冲动下失手<sup>[9]</sup>。

在 Johnson 的基础上,Wilkinson 进一步指出,女性主义和家庭冲突理论的差异不仅在于研究对象不同,关注的视角也有差别<sup>[10-11]</sup>。整体而言,女性主义作为一种宏观理论,看重社会结构对家庭中男女两性权力对比的影响,而家庭冲突理论则更关注个人的冲突解决策略,暴力只是作为策略之一,这两种理论在一定程度上都忽略了参与暴力的双方互动的情境和过程,因而他提出了婚姻暴力的互动理论(interactional perspective, 他也称为事件理论,event perspective),认为对婚姻暴力的完整理解还需对家暴这个事件本身,即暴力发展的前因、进展及后续情况进行研究,并关注社会文化、关系和情境因素对互动过程的影响<sup>[12-15]</sup>。其中暴力的互动过程既包括单次暴力的发展过程,也包括暴力的纵向发展过程。Wilkinson 认为单次暴力主要有三个非线性的发展阶段:就冲突的内容而言,一开始双方的冲突多由具体的生活琐事引起,然后对冲突如何解决进行争吵,最后会试图结束冲突;冲突的形式也经历了从语言交流到语言攻击,到或明或暗的武力威胁直至轻微或严重的躯体暴力。从纵

向发展来看,Wilkinson 指出理论上暴力在一段关系中可能呈现出稳定、加剧或减弱三种不同的模式,在某一段时间多种发展模式可能交替,但实际上比较常见的是暴力在短期内加剧但长期逐渐减少甚至终止<sup>[10-14]</sup>。与此不同,早期的 Walker 基于对受虐妇女的研究提出的暴力循环理论指出婚姻暴力存在紧张状态建立、暴力爆发和爱的悔恨三个阶段,暴力一旦发生,就可能周而复始,循环往复,一般不会自动停止,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暴力会愈演愈烈,施暴者也将不再道歉<sup>[16]</sup>。笔者认为,Wilkinson 和 Walker 所指出的暴力阶段的差异可能跟他们研究的暴力类型不同有关,参考 Johnson 的分类可看出,Walker 的研究更多集中于亲密恐怖主义暴力,而 Wilkinson 研究的多是情境夫妇暴力,因情境夫妇暴力更普遍,Wilkinson 的理论对情境夫妇暴力可能更有指导意义。但目前针对情境夫妇暴力互动过程的实证研究还比较缺乏,这在我国尤其如此。徐安琪详细地介绍了 Johnson 对暴力的区分,郁之虹强调家庭系统与社会系统间的互动<sup>[17]</sup>,但目前尚未有从夫妻互动视角探索一般家庭暴力的实证研究。本文试图通过对两对遭遇情境夫妇暴力的夫妻的访谈,系统梳理在整个婚姻历程中婚姻暴力发生、发展和维持阶段夫妻双方的互动过程及情境性影响因素,分析导致家暴行为的互动特点,一方面补充已有研究,另一方面也为家暴的预防和干预提供新思路。

## 二、研究方法与研究对象

### (一)研究方法

笔者采用半结构式访谈,对两对夫妻双方单独进行访谈,内容主要为第一次、最严重的一次以及最近一次婚姻暴力发生的前因后果和互动过程,并以之分别代表婚姻暴力的发生、发展与维持阶段。

### (二)研究对象

考虑到代际差异、婚龄时长及社会经济地位可能对互动过程产生影响,根据目的性抽样和方便抽样相结合的原则,本研究选取两对不同年代、不同婚龄、不同受教育程度的夫妻。两对夫

妻遭遇的家庭暴力均满足情境夫妇暴力的特点:在暴力频率、强度等方面都没有展现出蓄意伤害

的致命特征,且目前仍处于婚姻关系中。访谈对象的基本信息见表1。

表1 访谈对象基本信息表

编号	性别	年龄	文化程度	职业	认识方式	婚龄(年)	子女情况	三次暴力发生的时间(婚后第几年)		
								第一次	最严重	最近
F1	女	53	高中	农民	他人介绍	31	两女	2	8	29
M1	男	56	高中	农民						
F2	女	36	本科	护士	相亲网站	6	一子	2	距第一次3个月左右	6
M2	男	37	本科	职员						

### 三、研究结果

#### (一)发生阶段。

1. 缘由:婚姻初期的适应不良。两对夫妻第一次婚姻暴力发生的时间都在婚后第二年,缘由主要是个人单方面的决定引发另一方的不满。

2. 互动过程:语言刺激激发暴力。在M2与F2的互动中,F2一开始想与丈夫交流辞职的原因和对未来的打算,语气相对平缓,但M2一直不理睬,导致F2更多的担忧和询问,引发了M2的反感。在M2的叙述中,他用“一直不停地”“逼问”来形容妻子的询问,在“不回应”无效后,直接“推开妻子”来结束冲突。这一方面证实了Wilkinson的理论,双方在经历言语交流、言语攻击后最终发生了暴力,另一方面也可看出,激化过程并不一定由话语激化,一方言语攻击而另一方冷漠回避也会进一步激化矛盾。在M1与F1的互动中,双方几乎是省略了平和的言语交流阶段,直接升级到言语攻击。M1一开始就愤怒地质问妻子为什么要烫发,指责妻子的做法违背其意愿,面对M1的不满,F1也没有退让,以“烫头发还要商量你啊,头长在我自己身上,关你什么事”来回应,这进一步激起了M1的情绪,并快速转化成了躯体暴力。

第一次家庭暴力的发生对双方而言都是一次激烈的突发事件,夫妻双方从言语交流到言语攻击,在快速上升且强度巨大的情绪裹挟下,进一步发展成肢体暴力。在暴力实施中,丈夫并非是蓄意地进行严重、持续的殴打,妻子更多感觉到的是震惊、受伤和一定程度上的不能相信或接

受,因而在行为上并未表现出太多的反抗。肢体暴力在很短的时间内结束,夫妻双方几乎不存在行为上的交互。

3. 应对:继续维持婚姻。暴力过后,F1先是回了娘家,但父母劝其回去与丈夫继续过日子,在父母的催促下,F1回到了夫家,并通过媒人调解促使M1道歉。F2在第二天主动与丈夫沟通,双方和好。

#### (二)发展阶段

1. 缘由:家庭经济的支配。最严重的家庭暴力事件中,F1与M1的核心冲突点在于赡养费。M1在其三哥的添油加醋下认为F1帮其母亲代领养老金时私自扣留了一部分,实际上F1每次还添了150元凑成1000元给婆婆。F2与M2的冲突起缘于装修师傅的工钱给付方式。M2想全部弄完再结算,F2计划一天一结,但他俩之前并无沟通且之前的工作都是F2一人在负责,当M2看到F2在师傅刚干完一天就给钱时,加之M2当时工作压力大,情绪就爆发了。

2. 互动过程:强烈的语言对抗到互殴。与家暴的严重性相对应的是,夫妻间的互动过程也更加激烈和消极,呈现出了相互对抗、互不相让的状态。F1回到家立马以“你们是不是人”这样具有强烈指责性的语言来质问M1,M1也未作任何解释和争辩,以边骂边打来回应:

F1:“当时我说你们算不算是一个人啊,怎么能这样欺负人呢,他马上就火了,就骂我,一边骂我一边用手打我,把我推倒在地上,这时候我也豁上命地去

骂他去撞他,想从地上爬起来,可他揪着我的头发,坐着我的腰,打了我好一阵。”

F2与M2的互动过程同样充满了强烈的语言和对抗:

F2:“他就突然发脾气,然后开始骂人,我当时也挺生气的,他骂我什么我就指着他还嘴,他打我我也打他,然后他就停下车把我拖出去掐着我的脖子打,推在地上打,而且非常严重,他可能就觉得,反正我已经打了,你要报警还是离婚随便你,我就要打个饱。”

互动过程实质上也是一种交换过程,一方表达出消极的言语、情感和和行为时,另一方也很难保持克制,两方互相激化,互骂、互殴便出现了。同时,与第一次家暴相比,最严重的这次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首先,两对夫妻的互动都没有了平心静气的交流阶段;其次,言语攻击和行为攻击没有了明确的界限,M1与F1的“边骂边打”就体现了这一点;最后,与第一次相比,妻子的无所适从、幻想破灭等被动情绪逐渐被主动回击所取代,单纯的被打演变成互殴。但妻子的反抗激发了丈夫的控制欲,加之男女生理上的差异,丈夫在行为上更加压制妻子,互殴很快就变成了丈夫主导的局面。

3. 应对:外在系统的保护与警示作用。两对夫妻最严重的一次暴力都在外界干预下结束,F1与M1是被邻居拉开之后打110报警,F2当时就报了警。事后F1和F2都去过医院验伤,并提出了离婚。但考虑到孩子,且在民政局的劝说调解之下,离婚未能成行。但报警和尝试离婚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保护女方和警醒丈夫的作用,两位丈夫都在外界的干预下承认了错误,此后较长一段时间内没有再发生严重的婚姻暴力事件。

### (三)维持阶段

1. 缘由:家务分工。此次家庭暴力中,F1因与M1的弟弟约好来家吃饭,其却临时失约而气愤,M1则认为F1并非心甘情愿招待弟弟,让自己失了面子,二者在理解上的差异引发了冲突。F2因M2以“需赚钱养家”为由不参加孩子的学

校活动而唠叨,引发了矛盾。

2. 互动过程:强度下降,自我克制增加。M1与F1的互动与前次相似,F1率先发问且语气强烈,M1被激惹后暴力回应:

F1:“我当时也是非常生气,就说你看我准备了一下午的饭菜,都这样了他又不过来吃,说不来吃不早告诉声嘛,可能当时我说话的口气也是很生气,我刚说完,他马上就烦了,骂我说你是不是想找事啊你(哭),又想挨打了吧,最后说着说着(哭)他就打了我(哭)。”

M2与F2的互动也呈现出与前几次类似的模式,F2试图与M2讨论,未得到积极回应后继续唠叨,M2就用暴力终止F2的唠叨:

M2:“我跟她说我工作上还有些事情,告诉她我去不了,她跟没听到似的,说什么可以让别人做,就一直问怎么能不去,让赶紧收拾下过去,她一旦说了就停不下来,一直不停地说,你耳朵根本清闲不下来,我就给了她一巴掌。”

家庭暴力进入维持阶段后,且随着年龄、婚龄的增长,两对夫妻在言语交流和言语攻击上的时间明显拉长,在表达观点和发泄情绪的过程中也出现了克制的倾向,比如M1在实施暴力前就提出了“又想挨打了吧”,这既是对F1的提醒和威胁,实际上也是一种隐藏的避免实际暴力的手段。M2也尝试对自己的行为进行解释,并且努力忍耐妻子的唠叨。此外,躯体暴力的持续时间和严重程度也在降低,F1在挨打后选择了躲开,M2也在妻子连喊带打扑过来扭打几次后停手。

3. 应对:自我反思与克制,冷暴力增加。在暴力行为给身心带来巨大伤害后,作为主要受害者的妻子逐渐学会保护自己,尤其反映在行为交互上,逐渐放弃了以命相搏的心态,“不吃眼前亏”,感觉丈夫快要失控时“不骂不打不闹”,克制自己不激怒丈夫。在平时生活中也尽量避免冲突的升级,其中F1的主要策略是忍,“没有其他办法,熬到死了就算了吧”,反映了其应对的被动,F2则希望更多矛盾在激化前通过和平沟通解决。两位丈夫在施暴后也普遍有了一定的悔意,

但并未出现 Walker 所描述的蜜月期,而是等着“时间慢慢挽回”,但在冲突进行中开始有意识地忍耐与克制。

此外,两对夫妻均开始通过冷暴力来减少身体上的伤害:

M1:“所以说就爱造成语言上的谁都不服谁,打,伤害太大了,年纪也大了,就互相冷淡不搭理,最后我们很长很长一段时间各自都不理对方,我也不搭理她,她也不搭理我,好长时间我们都不说一句话。”

M1:“没什么和好不和好吧,就是那样,一开始估计她也觉得挺委屈的,我们两个也不爱搭理,后面因为其他的事情也不得不说话,生活还得继续。”

## 五、讨论

(一)互动过程作为一种交换,推动了家庭暴力的发生、发展与维持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在两对夫妻的三次婚姻暴力中,均是夫妻双方都有参与,所以正如 Bates<sup>[18]</sup>和 Wilkinson<sup>[12]</sup>所指出的,暴力是相互的动态推进过程,一方的敌意行为引发另一方的敌意,双方互相激化,最终导致了冲突的升级和暴力的发生,孤立地从这个动态发展进程中截取一个行为,定义一方是施暴者另一方为受害者,或者如女性主义研究者认为的那样,一律把男性当作施暴者把女性看作受害者显然是把复杂而丰富的现实简单化了。

虽然婚姻暴力过程中夫妻双方语言和行为上的互动很多,可 Wilkinson 认为这些互动总体上可分为三个顺次的发展阶段<sup>[10,13]</sup>:言语沟通、言语攻击和躯体暴力,Giordano 的实证研究则指出婚姻暴力存在争议事件、言语激化和躯体暴力三个阶段<sup>[19]</sup>。本研究发现躯体暴力之前普遍都有言语攻击或言语激化这个阶段,但言语沟通并非每次都存在。此外,每个阶段的强度和持续时间也随着暴力发展的进程而变化。夫妻双方因冲突未解决所累积的敌意情绪持续存在,于是转化成了冷暴力。

最后,从暴力的纵向发展过程看,两对夫妻

从第一次到最严重一次家暴的间隔时间都相对较短,第一对夫妻相隔了 6 年,第二对夫妻相隔了 3 个月,然后躯体暴力的强度开始减弱,但同时冷暴力的强度和频率开始增加,这一方面证实了 Wilkinson 所说的随着年龄和婚龄增加夫妻双了解程度增强,以及在暴力造成伤害后夫妻双方有意识的自我调控能力增加,情境夫妇暴力逐渐减弱;但另一方面也需指出,对家暴发展阶段的研究还需重视“热暴力”向“冷暴力”的转化及其危害。

(二)家庭暴力的互动过程中性别关系、社会支持以及代际的影响

Wilkinson 认为家暴的发生、发展和维持受情境的影响<sup>[13]</sup>,其中重要的影响因素有社会文化、夫妻关系及暴力发生当时的具体情境。本研究主要讨论三个因素的影响:性别关系、社会支持和代际差异。

首先,本研究发现虽然婚姻暴力并非如女性主义者所说的是男性对女性强制性的完全控制,但权力与控制以及两性不平等在 Wilkinson 所讲的暴力行为的动机、行为和后果三个方面都存在。第一,从暴力发生的缘由和实施暴力的动机来看,两对夫妻三次冲突的起因分别涉及婚后个人自主权、财务支配以及家务分工,本质都是婚姻中控制权的争夺和义务的分担,但在这三次冲突中,基本都能看到两性权利和责任的不对等,女性处于弱势地位。比如第一次冲突 M1 因妻子私自染发不符合自己要求引起,M2 觉得妻子不该插手自己辞职的事情引发矛盾,都是认为男性有控制女性的权利,而女性则不应该对男性的自由有太多干涉。从暴力的结束看,在夫妻无法通过争吵解决冲突时,三次暴力都是丈夫用武力的方式让妻子闭嘴。第二,从暴力行为来看,虽然妻子同等程度地发起和参与语言暴力,甚至是语言攻击的主要维持者,但躯体暴力都是男性先动手。第三,妻子也是主要受害者。三次暴力中都是女性受伤,F1 也正是因为被打怕了所以开始通过躲避、忍等方式来回避暴力。所以正如 Wilkinson 所指出的,承认互动中双方参与并不代表责任上的对等,也不表示暴力研究中无需性别

敏感。

其次,两对夫妻在第一和最严重一次家暴后都寻求过外界支持,但这两次支持的效果是不同的。F1 在发生第一次暴力后先后寻求娘家及媒人的支持,F2 也曾寻求母亲的支持,但他们都劝和不劝离,因而并未促成夫妻关系的实际性改变,正如 Wilkinson 所指出的第三方以求表面和平的调解方式难以促进暴力问题的解决<sup>[12]</sup>。到了最严重的一次暴力,两位妻子都报了警,接 F2 电话的还是一位女警,在听到现场的惨叫后迅速出警,当下把 M2 带回警局询问,留下了笔录。虽然在民政局的调解下没有离婚,但 F2 借此要求 M2 写下不再打老婆的保证书,其遭受家暴的笔录也成为要求离婚时有力的证据,从与 M2 的交谈也可以看出,妻子报警和要求离婚对其有较大的警示作用,他在访谈中多次提到“那次她把事情闹得天翻地覆的,又报了警又闹到法院,事后我自己也在反省吧,以后的相处需要多注意些”。可见警方、法院等的强力介入比夫妻都认识的第三方的介入有更大的警示作用,但这种警示作用的效果是有限的,如果夫妻之间的冲突未解决,他们从政府机构得不到持续支持,又无法真正离婚,报警的效力会逐渐减弱和消失,这从 F1 最终只能选择忍、熬等方式应对家暴,而 F2 对是否离婚的纠结均可以体现。可见要促进家暴的解决,仅在出现严重暴力的情况下由警察短期介入是

不够的,后续的干预还需考虑提供夫妻咨询等支持性服务。

最后,虽然两对夫妻的家暴有很多相似之处,但还是呈现出一些明显的代际差异。F1 和 M1 作为“60 后”,年龄大婚龄长,受传统观念的影响也较大,因而 F1 在家暴后有更多的接纳和忍耐,M1 虽然在思想上认为自己需要克制,但改变的举动不多。相比之下,F2 作为受过高等教育的“80 后”,有自己的工作和职业,对家暴的容忍程度明显要低,在家暴后反应也更加主动积极,这一方面体现在发生家暴后主动要求沟通,另一方面在发生严重暴力后也通过报警、去民政局要求离婚等方式明确表示不容忍,这样强烈的态度也促使 M2 作了更多的改变。

本研究从整个婚姻历程的角度探讨了夫妻双方在家暴中的互动过程,是国内运用互动视角分析情境夫妇婚姻暴力的首次尝试,其发现有利于加深对家暴互动过程的了解。但本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首先,研究对象只有两对夫妻,资料的代表性、丰富性欠缺;第二,本研究主要关注的是家暴前后夫妻间的消极互动,忽略了积极互动,而支持性的互动往往是夫妻关系得以维持的纽带,也是促进夫妻关系改变的基础。未来的研究可以加大样本量,并从积极和消极互动两方面对家暴夫妻的互动过程进行探索,以更清晰地认识家暴的互动机制和可以改变的条件。

#### [参考文献]

- [ 1 ] HOWARD LM, TREVILLION K, KHALIFEH H, et al. Domestic violence and severe psychiatric disorders: prevalence and interventions[J]. *Psychological medicine*, 2010, 40(6): 881-893.
- [ 2 ] 崔轶, 洪炜, 苏英, 刘晓柳. 七省市家庭暴力现状调查及影响因素报告[J].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12, 3(40): 360-362.
- [ 3 ] DILLON G, HUSSAIN R, LOXTON D, et al. Mental and physical health and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against women: a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family medicine*, 2013(5): 1-15.
- [ 4 ] RANDLE AA, GRAHAM CA. A review of the evidence on the effects of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on men[J]. *Psychology of men & masculinity*, 2011, 12(2): 97-111.
- [ 5 ] PRAKESH SS, JYOTSNA S. Maternal exposure to domestic violence and pregnancy and birth outcomes: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es[J]. *Journal of women's health*, 2010, 19(11): 2017-2030.
- [ 6 ] WINSTOK Z. Toward an interactional perspective on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J]. *Aggression and violent behavior*, 2007, 12(3): 348-363.
- [ 7 ] JOHNSON MP, FERRARO KJ. Research on domestic violence in the 1990s: making distinctions[J].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2000, 62(4): 948-963.

- [ 8 ] JOHNSON M P. Typology of domestic violence: intimate, terrorism, violent resistance, and situational couple violence [ M ]. Boston, MA: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Press, 2008: 61-62.
- [ 9 ] 徐安琪. 婚姻暴力: 一般家庭的实证分析 [ J ]. 上海社会科学院季刊, 2001 ( 3 ): 156-165.
- [ 10 ] WINSTOK Z. Partner violence: a new paradigm for understanding conflict escalation [ M ]. Springer Science & Business Media, 2012.
- [ 11 ] WINSTOK Z. The paradigmatic cleavage on gender differences in partner violence perpetration and victimization [ J ]. Aggression and violent behavior, 2011, 16 ( 4 ): 303-311.
- [ 12 ] WILKINSON DL, HAMERSCHLAG SJ. Situational determinants in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 J ]. Aggression and violent behavior, 2005, 10 ( 3 ): 333-361.
- [ 13 ] WINSTOK Z. Toward an interactional perspective on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 J ]. Aggression and violent behavior, 2007, 12 ( 3 ): 348-363.
- [ 14 ] WINSTOK Z. Conflict escalation to violence and escalation of violent conflicts [ J ]. Children and youth services review, 2008, 30 ( 3 ): 297-310.
- [ 15 ] WINSTOK Z. From a static to a dynamic approach to the study of partner violence [ J ]. Sex roles, 2013, 69 ( 3 ): 193-204.
- [ 16 ] WALKER, LEA. The battered woman syndrome [ M ]. Berlin: Springer Publishing Co, Inc. 1999.
- [ 17 ] 郁之虹. 家庭系统理论视域下的家庭暴力——互动因果的矛盾循环格局 [ J ]. 社会工作, 2014 ( 6 ): 82-90.
- [ 18 ] BATES EA. Current controversies within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overlooking bidirectional violence [ J ]. Journal of family violence, 2016, 31 ( 8 ): 937-940.
- [ 19 ] GIORDANO PC, COPP JE, LONGMORE MA, et al. Anger, control, and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in young adulthood [ J ]. Journal of family violence, 2016, 31 ( 1 ): 1-13.

## The Occurrence, Development and Persistence of Marital

### Violence from an Interactional Perspective: An Interview Study Based on Two Couples

XIANG Xiao-ping, WANG Xiao-ting

( 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Beijing 100081, China )

**Abstract:** Guided by the interactional perspective, this study interviewed two couples from different ages and economic backgrounds who had suffered situational couple violence, to explore the occurrence, development and persistence of their marital violence. It was found that both parties actively involved in violence, a single episode of violence generally followed the process from verbal amplification to physical aggression, and the wife is often the initiator and promoter of verbal attacks, while the husband usually started and terminated physical violence. Looking at the successive violence from a longitudinal perspective, the study revealed that the duration of verbal communication, verbal attack and physical violence changed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marital violence, physical violence weakened after a brief time of intensification, but emotional abuse became more frequent and intense.

**Key words:** marital violence; interactional perspective; developmental process

(责任编辑 文向华)

# 冼星海与钱韵玲爱情和婚姻的历史考察

胡艺华<sup>1,2</sup>, 潘 婷<sup>1</sup>

(1. 武汉音乐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60; 2. 武汉大学, 湖北 武汉 430072)

**摘要:**在人民音乐家冼星海波澜壮阔的音乐人生中,钱韵玲作为他的妻子,是一个绕不过去的重要人物。她与冼星海富有传奇色彩的爱情和婚姻,发轫于音乐演出的舞台,成熟于红色延安的土壤,淬炼于抗日救国的战火,定格于黄河怒吼的歌声。从总体上看,冼星海与钱韵玲之间先后经历了从相识相交到相知相恋,再到相随相伴,最后内化为相念相思,每一个历史阶段都蕴含着可歌可泣、可敬可叹的精彩故事,既浸润着传统文化的血脉,又闪耀着革命理论的光芒,也映照红色初心的赤诚,更洋溢着音乐情怀的浪漫,堪称是马克思主义爱情婚姻观的生动范例,为新时代文艺工作者爱情婚姻的培育和升华提供了示范。

**关键词:**冼星海;钱韵玲;爱情;婚姻;历史考察

**中图分类号:**D44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838(2019)01-0045-07

伟大的时代孕育伟大的爱情,高尚的人格支撑高尚的婚姻,冼星海和钱韵玲之间既有伟大的爱情,也有高尚的婚姻,耐人寻味、令人敬慕、给人启示。冼星海,1905年出生于广东番禺,1945年病逝于莫斯科,是中国现代杰出的作曲家、指挥家、音乐理论家和音乐教育家。这位贫苦渔民的遗腹子,在时代浪潮的激荡之下终其一生用音乐为民族解放和人民解放而奋斗,被毛泽东称为“人民的音乐家”。钱韵玲,1914年出生于湖北咸宁,1994年于杭州去世,是中国近代知名的音乐教育家,在儿童音乐和群众歌曲的创作方面成就斐然。红色教授钱亦石的这位女公子,在抗战歌咏运动过程中与冼星海并肩同行,成为生死伴侣,与冼星海紧紧联系在一起,倾注毕生的心血支持冼星海的音乐创作,继承冼星海的遗志,传

承冼星海的精神,可以称之为“冼星海背后的女人”。作为一个以革命为己任、具有英雄气概而又性格内向的音乐家,冼星海对钱韵玲这位战火中的生死伴侣、音乐上的忠实助手、生活上的得力帮手,倾注了崇高、真挚、朴实的大爱深情。他们的结合是革命与音乐的碰撞、青春与理想的交融、爱情与命运的共振,开创了中国音乐界革命伉俪、生死伴侣的新风尚,谱写了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上感天动地的爱情婚姻之歌。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的爱情和婚姻发轫于音乐演出的舞台上,成熟于红色延安的土壤,淬炼于抗日救国的战火中,定格于黄河怒吼的歌声里。每一个历史阶段都蕴含着可歌可泣、可敬可叹的精彩故事,既浸润着传统文化的血脉,又闪耀着革命理论的光芒,也映照红色初心的赤诚,更洋溢着音乐

收稿日期:2018-09-11

基金项目:湖北省高等学校“马克思主义中青年理论家培育计划(第四批)”(项目编号:17ZD066);湖北省高等学校重点学科建设项目“致敬‘大河之魂’——人民音乐家冼星海研究”(项目编号:XK2018-24-4D04)

作者简介:胡艺华,男,武汉音乐学院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武汉大学哲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在站博士后,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政治教育、音乐文化研究;潘婷,女,武汉音乐学院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中心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思想政治教育、音乐文化研究。

情怀的浪漫,堪称是马克思主义爱情婚姻观的生动范例,为文艺工作者爱情和婚姻的培育和升华提供了示范引领。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文艺界的培育和践行,红色家风和家庭文明在文艺工作者队伍中的传承与发展,都迫切需要我们深入到历史的场景中去全面考察、科学解读冼星海和钱韵玲这一对革命夫妻、音乐伉俪在爱情和婚姻方面的精彩故事。

从历史的视角来看,冼星海和钱韵玲从初在上海时的模糊印象,到武汉时的相逢相恋,再到延安时的不离不弃,最后“两地遥隔,能不依依”<sup>[1]</sup>。他们的爱情与婚姻经过了从萌芽到发展再到成熟最后到升华的过程,对此我们可以分为四个阶段进行考察。

### 一、奠基阶段:冼星海和钱韵玲的相识相交

1935年冼星海从法国学成归来,即在上海投身于抗战歌咏运动,先后创作了《救亡进行曲》《青年进行曲》《保卫卢沟桥》等一系列救亡歌曲,抗战爆发后随“上海话剧界救亡协会战时移动演剧第二队”赴各地进行巡回演出,先后途径苏州、南京、徐州、开封、洛阳、郑州,一路上既教唱抗战歌咏,又创作救亡歌曲,于1937年10月3日到达当时的全国抗战中心武汉,随后进入到国民政府军政部第三厅文艺处音乐科工作。在郭沫若、田汉的直接领导下,冼星海与张曙等人一起组织大规模的抗日群众歌咏运动,同时创作了《游击军》《在太行山上》等一大批抗日歌曲。此时的冼星海已经33岁,漂泊的生活、动荡的时局使得他一直孤身一人,他把主要心思都花在谱写抗战歌曲上,但是作为一个具有艺术情怀的大龄青年,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同样怀有对幸福家庭的期待和对甜蜜爱情的向往。钱韵玲是中国共产党湖北党部早期创始人、我党早期著名教育家、理论家、社会活动家钱亦石的女儿,作为家中唯一的女儿、最小的孩子,深得父亲的疼爱,从小就随着钱亦石在上海读书,曾在新华艺术专科学校学习音乐,经常和母亲一起为中共地下党传送信函。“七七”事变之后,23岁的钱韵玲奉命回到武汉,在武汉第六小学担任音乐教师,同时经常参与抗

战歌咏运动。来自于不同地方、看似毫不相干的两个人,因为抗战歌咏活动联系在了一起。

其实早在上海时,两个人就有过交集,一方面,钱韵玲的父亲钱亦石是冼星海十分敬重的师长,而钱亦石是当时中共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的负责人之一,公开身份是上海暨南大学教授。他家是上海左翼文学艺术家们的一个重要聚会场所,冼星海也时常去参加聚会,但由于钱韵玲当时正在上海新华艺专上学,在钱韵玲家中二人未碰过面。另一方面,冼星海在上海为电影配曲时,时常找上海新华艺专的学生合唱,而钱韵玲就是合唱团中的一员,与冼星海有过数面之缘。但由于学生太多,二人没有机会进行单独的交往,彼此的印象都非常模糊。而抗战爆发后,在武汉,冼星海再次与钱韵玲相见。当时钱韵玲是武汉六小的音乐教师,抗日救亡歌咏活动的积极分子,工作之余钱韵玲参加了由冼星海创建的“海星歌咏会”,每周两次向他学唱救亡歌曲,然后又各自分散去创建另外的歌咏队,到街头去进行抗日宣传活动。多年以后对他们在武汉相见的场景,钱韵玲记忆犹新。钱韵玲在《忆星海》一文中写到:“一九三七年的秋天,在武汉,我在一次会议上第一次见到了星海,他朴素、诚恳、热情,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sup>[2]</sup>。”钱韵玲在此文中提到的“第一次见到星海”,实际上是指钱韵玲与冼星海第一次近距离的接触、面对面的交流。因此钱韵玲称之为与冼星海真正意义上的初次相识,但是冼星海对钱韵玲的印象并不深刻。

直至1938年1月29日钱亦石先生去世,在他的追悼会上冼星海才知道钱韵玲原来就是他所敬仰的前辈钱亦石的女儿。作为中共湖北党部的早期创始人,党内早期著名的理论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和社会文化名流,钱亦石先生在上海因病去世的消息在全国尤其是湖北引起了强烈反响,武汉市文化界人士于2月27日为他举办了隆重的追悼会,毛泽东、朱德发来唁电,周恩来、董必武亲自主持追悼会并致悼词,郭沫若敬送挽联,邹韬奋、沈钧儒在会上发表激情演说。在追悼会之前,著名词作家施宜专门撰写了“钱亦石先生挽歌”,心怀敬意而又悲痛万分的冼星

海受命谱曲并亲自指挥钱韵玲所在的“海星歌咏会”进行演唱。当时“海星歌咏会”派来取歌谱的恰恰是满面凄容、双眼红肿的钱韵玲,通过追问和交谈,洗星海才得知他敬仰的前辈钱亦石先生原来就是钱韵玲的父亲。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到:“他的女儿韵玲在我歌咏班里学习,直至今天我才知道她是亦石的女公子。今早她把我作的挽歌送上来,我偶然问亦石先生是她何人,她便含着泪来答我‘是我父亲’。她悲伤到不能成声!这个印象给我非常深刻!”<sup>[3]211</sup>至此,洗星海才知道钱韵玲的真实身份。这也许是钱亦石先生在冥冥之中为他们牵起的缘分的红线,使他们有了单独交往和深入交流的可能。

从此以后,钱韵玲才开始真正走进了洗星海的关注视线和精神世界里,洗星海的书信和日记里面也逐渐出现了钱韵玲的身影。他多次提到与钱韵玲的交往过程,他用“海星歌咏会”的训练来激励宽慰钱韵玲失去父亲的悲伤,不时约钱韵玲喝咖啡、看电影、参加音乐会,并且鼓励和激励她学习音乐、合作歌曲。而在此期间钱韵玲也开始慢慢了解洗星海、走近洗星海,成为他歌咏会的坚定支持者和积极参与者,也成为他失意时的忠诚陪伴者和耐心倾听者。这些都使身在异地他乡的洗星海十分感动,他在5月10号的日记中提道:“我在很烦闷的时刻就用电话约韵玲出外……我觉得她是很纯洁的,我很尊敬她!”<sup>[3]214</sup>进而在5月12日给钱韵玲的信中写到:“你很慷慨、很爽直地去帮助别人的困难!我非常感动,你这种善良的心,使我永远记着。”<sup>[3]324</sup>这些从相识相见到相交的过程使他们逐渐由远而近,并为进一步的交往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 二、发展阶段:洗星海和钱韵玲的相知相恋

1937年12月,南京沦陷后,武汉成了全面抗战的大本营,轰轰烈烈的全国抗战歌咏运动在武汉兴起,洗星海和钱韵玲都参加了这一运动,并开始有了密切的交往与合作。最初两人的交往,自音乐而起,也仅限于音乐,可以说是非常单纯的同事和朋友关系。洗星海是大名鼎鼎的音乐家,是钱韵玲眼里的导师、兄长。钱韵玲是音乐爱好者,又是洗星海室友钱远铎的亲妹妹,所以

在洗星海眼里,钱韵玲只是个可爱的邻家小妹妹。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洗星海在当时的演剧二队里也有一个心仪的姑娘。由于种种原因,洗星海对她的暗恋刚刚萌芽就夭折了,为此洗星海“非常失望”“非常痛苦”。正是在洗星海心情处于低谷的特殊时期,钱韵玲的天真可爱、温柔娴静、活泼聪慧、知书达礼,深深地嵌入了他的脑海,打动了他的心灵。而对于刚刚失去父亲的钱韵玲来说,善良正直、成熟稳重、才华横溢、质朴热情的洗星海就如同一棵大树,让她的内心产生了依恋感和安全感。虽然两人年龄上有较大差距,生活的境遇以及成长的环境也大不相同,但这丝毫没有影响他们的交往,反而因为他们在个性上的互补,使他们相互吸引。

1938年3月至4月,洗星海和钱韵玲共同参与电影《最后一滴血》的拍摄,在此期间有了更直接、更频繁、更深入的交往,他们多次相约游览东湖,在湖畔畅谈革命理想,交流音乐之道,在朝夕相处、合作共事的过程中加深了对彼此的了解和理解。钱韵玲非常仰慕洗星海的音乐才华和奋斗精神,而洗星海也极为喜爱钱韵玲的天真活泼和善解人意。后来因导演金山与国民政府的中国电影制片厂发生冲突,这部电影中途流产,洗星海为电影配乐所谱写的曲子《江南三月》最后没能播出,但是他并没有为此感到愤懑和遗憾,而是满怀激动和欣喜,将这首充满着优美亲切、纯朴清新的民间乐调,与旨在抒发抗战妇女爱国深情的合唱曲,当作两人东湖之游的纪念赠送给了钱韵玲。以曲表意,以乐传情,正所谓“一切尽在不言中,一切尽在此曲中”,这也许是人民音乐家洗星海表达爱意的一种特殊方式,也是最贴切、最有效的一种方式,对此,同为音乐人的钱韵玲对其中蕴含的深意了然于心并欣然接受。

钱韵玲与洗星海相爱的种子从此萌发,二者的感情急剧升温并发生了质的飞跃,进入到美好恋情的实际性阶段。1938年5月14日洗星海在日记中提到:“韵玲拿热水给我洗脚,拿靴子给我换!我觉得她心地太好。她又天真可爱,外表美又能处处表现出来,内心美更切实。我不禁很感

动,甚至我要爱恋她起来!”<sup>[3]216</sup>如果说这还只是洗星海对钱韵玲单方面的爱慕和思念,那么5月30日洗星海和钱韵玲达到了真正意义上的情投意合、牵手连心,怀着浓浓的爱意度过了愉快的一天,在“维多利”看《袖里乾坤》,一起吃冰,一块谈笑,相依相伴。他在5月31日给钱韵玲的信中写到:“昨天晚上你给我很大的快慰,无形中使我忘却一天的劳苦,不知怎样我总觉得同你一块儿是有乐趣的”;“总之我觉得你的忧愁就是我的忧愁,你的快乐也即是我的快乐。我们虽然没有很久的交谊,我却明了你,除了尊敬你以外,我还想爱护你”;“韵玲,我很尊敬你,很爱你,我不想你有一点难过或痛苦存在心里”<sup>[3]326</sup>。这表明二人的关系实现了从友情到爱情的升华。

两人的相恋给洗星海带来极大的心理慰藉和精神快乐。他多次在日记中写道:“不知怎样,我这一月来都有韵玲的印象,而且是很深刻地印在我脑袋里!我喜欢她的沉静,又喜欢她的嬉笑,她的幽默,她圆圆的大眼睛和修长的黑发——但可怜我始终是一个炭头,还是一个不大理解爱的傻瓜”<sup>[4]134</sup>;“我委实很爱伴着她!……她可以令我向上,可以减少我许多痛苦”<sup>[3]218</sup>。由此人民音乐家的简单直率而又真挚的情感跃然纸上,为此他写了《野睡》《温静的绿情》《妹妹你是水》这三首歌预备赠与钱韵玲,而且与钱韵玲畅谈恋爱问题,讨论二人的将来和事业的发展。在钱韵玲的陪同下,洗星海上门拜访了她的母亲王德训及其他亲属,以自己的诚恳、率真、正直、上进,赢得了钱韵玲家人的一致认同,同时,洗星海通过写信向远在上海的母亲黄苏英介绍了钱韵玲的基本情况,得到了母亲的首肯和祝福。就像许多水到渠成的中国式爱情一样,相知相恋的两个人从爱情的原野走向了婚姻的殿堂。

1938年7月20日,33岁的洗星海和24岁的钱韵玲选择在当时武汉文化人聚会较多的普海春酒楼,举行了简单而又隆重的订婚仪式,出席订婚仪式的有洗星海的好友和同事,以及钱韵玲的亲属和好友,如国民党元老陈铭枢将军,《义勇军进行曲》的词作者、时任“军政部第三厅”文艺处处长的田汉及其夫人——著名剧作家、作词

家、女诗人安娥,从事抗战宣传的知名画家吴恒勤,钱韵玲的兄长钱远铎及其女友黄冰,还有钱韵玲的老师张慈云、王有佳等。在这个订婚仪式上,安娥担任司仪,陈铭枢和田汉分别发表演讲,对洗星海和钱韵玲的婚姻爱情给予了高度评价和美好祝福。在两人的婚庆典礼上,郭沫若还欣喜地说:“这对歌坛伴侣,他们的歌声,是抗战的歌声,是中华民族解放的歌声”。对这个甜蜜而浪漫的历史片段,2005年,正值洗星海诞辰100周年之际,洗星海和钱韵玲的共同挚友、92岁高龄的“历史见证人”黄冰女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详细、清晰地描绘了其中的细节,向人们再现了洗星海和钱韵玲从相知到相恋的欢乐与浪漫。

### 三、成熟阶段:洗星海和钱韵玲的相随相伴

早在1937年10月,洗星海到武汉后就经常见到“抗大”“陕公”招生的广告,又见到一些延安来的青年,他们的刻苦、朝气和热情引起了洗星海的注意。在1938年3月他就读过《抗战中的陕北》,并在日记中写到:“中国现在是成了两个世界,一个是向着堕落处下沉,而另一个就是向着光明的有希望的上进。延安就是新中国的发扬地”,“假如我还觉悟的话,我应该想到自己的现时责任和将来的前途”<sup>[3]211</sup>。1938年6月18日,日本下达了实施对汉作战的命令,战事紧迫,每个人都必须决定自己的去留。加之国民党政府内部出于党派之争,消极抗战,人为地限制“第三厅”的活动,尤其是对洗星海主持的抗战歌咏运动进行了排挤、压制和阻挠,这引起了洗星海的强烈不满,他期待可以有一个安心写歌曲的地方。

1938年9月,洗星海收到了一封来自延安的“鲁迅艺术学院”(简称“鲁艺”)全体师生的邀请电报和院长沙可夫的亲笔聘书。“鲁艺”由毛泽东同志发起创办,其教育方针是:团结与培养文学艺术的专门人才,致力于新民主主义的文学艺术事业。这给正处于纠结苦恼和忧郁徘徊中的洗星海打开了一扇窗,让他看到了光明和希望。洗星海毅然决然地决定奔赴这个“追求真理的青年所热烈向往的地方”<sup>[2]</sup>。随后洗星海邀约钱韵玲外出讨论去陕北的问题,他满怀深情地对钱韵

玲说:“你也该在这时代里去开辟你自己的路……我们到陕北去吧!那里可以给我们更多的勇气,那里可以使我们更了解真正的爱,再去创立我们的事业和将来。”“我想到不久要到陕北的时候,那边给我们多么伟大的前途和希望!我也希望你一样地不和我分离,同在艰苦中奋斗,同在炮火中生长,使我们能够增强抗战力量,能够充实自己的生活 and 学识”<sup>[3]328</sup>,对此,钱韵玲表示强烈地支持,欣然同意与他一起奔赴延安。钱韵玲对洗星海的支持与信赖是对他爱的最好回应,她在《忆星海》中写道:“党在召唤,延安在召唤,这给星海多么巨大的支持和鼓舞啊!”<sup>[2]</sup>。钱韵玲的体贴给了洗星海奋勇前行的力量,于是1938年10月1日,他们奔向了去延安的红色之路。在周恩来的安排下,他们以旅行结婚的名义离开武汉,辗转千里,在途中结成了伴侣,于11月3日顺利到达延安。洗星海在“鲁艺”音乐系担任教授,不久后出任系主任,同时在中国女子大学兼任音乐教员,钱韵玲则进入鲁艺音乐系高级研究班学习。由此,他们的婚姻和爱情翻开了新的篇章。

延安生活对他们来说既是革命理想的践行和崇高事业的拓新,同时也是巨大的挑战和严峻的考验。在武汉,他们生活吃穿不愁,还可以看电影、吃冰淇淋、游东湖。而延安地处大西北,自然条件恶劣,物质极为匮乏,尽管党中央为洗星海提供了当时全延安地区最高的薪水待遇,其月薪高达15元,相当于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月薪的三倍之多,但很显然延安的生活条件和生活水平与繁华的大都市武汉不可同日而语。加之饮食习惯的差异、语言交流的不畅和亲情的隔离、战事的紧迫等,给他们的新生活带来了诸多的困难。洗星海在1938年11月20日的日记中写到:“他们在那轰炸之下,好像失了秩序一样,我们气也气不耐烦,就在山上的旧窑洞睡了!玲有点难过,但我还是沉默。因为在战时的生活是不免有点难过的,但我也以沉默对付环境,使我们练成有经验、有魄力的青年!”<sup>[3]238</sup>11月22日:“‘鲁艺’给我们住的是一个旧窑洞,每天我们都要跑上跑下,尤其早晚相当的麻烦”<sup>[3]238</sup>。但是这些困难并没有使他们抱怨或离开,在各级组织

的关怀和甜蜜爱情的滋养下,他们在简单贫乏甚至清贫的家庭生活中体会到了浓浓的家庭温情和极大的生活乐趣。洗星海用日记记录了他们生活的点滴,1938年11月28日:“今天玲有点不舒服,因左边大牙发肿了!她在太阳底下晒着打绒衣”<sup>[3]240</sup>;1938年12月18日:“与玲往城内买了一点猪肉和咸菜、酒来烧东西食”<sup>[3]245</sup>;12月24日:“玲在早上替我洗了好几件衣服,她有点疲倦。我在写歌剧,她替我做许多事,的确帮助我很多”<sup>[3]247</sup>;1939年2月12日:“她确实是个家(庭)主妇,在事务方面特别帮忙,这样我才安心写我的新作”<sup>[3]256</sup>;1939年2月16日:“玲还是洗被单、洗衣服,手已弄破了!我做面包给她食,弄鸡蛋给她慰劳”<sup>[3]257</sup>;1939年3月9日:“玲又替我抄写《中国锣鼓击法》”<sup>[3]261</sup>。从这些日记中我们不难想象到他们简单而甜美、幸福而惬意的生活状态。钱韵玲不仅在生活上与洗星海相随相伴,而且在音乐上与洗星海夫唱妇随,更是在思想上与洗星海同心同行。1939年8月他们唯一的女儿洗妮娜出生,从此人民音乐家舐犊情深、爱家顾家的一面更加体现了出来,他们相濡以沫、相互支持、相随相伴,一时在延安传为佳话。

#### 四、升华阶段:洗星海和钱韵玲的相念相思

1940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发动的“百团大战”取得了抗战以来的极大胜利,恰逢此时,为了向全国乃至全世界人们展现延安与抗日根据地生机勃勃的面貌和八路军的战斗生活,宣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居民坚持抗战的英勇事迹,鼓舞全国抗日居民的士气,著名导演袁牧之、八路军电影团团团长、著名摄影家吴印咸等人历经两年合作拍摄了一部大型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这是延安的第一部纪录片,毛泽东对其十分重视,在电影配乐方面,袁牧之指名让当时在延安谱出《黄河大合唱》这一经典歌曲的洗星海为其配乐。鉴于当时苏联的设备先进,为了取得更好的影片效果,中央委派袁牧之与洗星海共同前往苏联完成配乐。洗星海怀着一腔为人民而音乐,为抗战而传唱的热情欣然接受任务。当时洗星海与钱韵玲唯一的女儿洗妮娜刚出生不到一年,正是牙牙学语之时,初为人母的

钱韵玲正处在需要呵护与关怀的阶段。他们没有父母亲人在身边,也没有请保姆,完全靠自己打理衣食住行等家庭日常生活。为了支持冼星海的革命工作和音乐事业,钱韵玲毅然选择留在延安,一边参加学习一边照顾女儿,独自承担起“齐家”的责任。但是她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竟然是与挚爱之人的生死别离。由于冼星海是被秘密派往苏联,于是便与妻子钱韵玲约好用黄训这个化名,黄是冼星海母亲的姓氏,训是钱韵玲母亲的名讳,这种独特的结合,蕴含着他们之间的深情厚意。冼星海去苏联并不顺利,他们辗转西安、兰州以防反动派的破坏,并寻机赴苏联。在漫长忐忑的路途中,对钱韵玲与女儿妮娜的思念使他的心灵得以慰藉,这在给钱韵玲的多封来往信件中明确表达过,1940年5月16日:“我常想念着你和妮娜,为着爱我们更应该加倍努力,我们要贡献一切所有,为民族解放、为实现我们的最高的理想。望你珍重,小心爱护妮娜。让我吻着你和她。”<sup>[3]329</sup>5月28日:“你近来读了多少书?身体好吗?我常想念你和妮娜!”<sup>[4]167</sup>9月5日:“妮娜周岁的时候西安下雨,我闷闷地想念她,又想起你和我过去的恋爱过程,使我勇气加增。”<sup>[3]350</sup>

虽然古人说“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但实际上天各一方的相思之苦是一种巨大的精神折磨,当然也是对于爱情婚姻的重大考验。冼星海到达苏联后不久,苏德战争爆发,冼星海在苏联的预期工作学习计划被迫中断。由于新疆军阀盛世才反共,以及国民党对边境的封锁,冼星海的回国之路由此阻断。从此在苏联、哈萨克斯坦、蒙古等多地开始了长达五年的漂泊。在战争的特殊环境下,加之身份的特殊性,冼星海常常处于失业、无援、贫病交加的状态。在异国他乡,他常常思念远在延安的妻子和女儿。直到1941年9月,他才有机会托人给钱韵玲带回一封信,他在信中写道:“匆匆别后不觉已届两度寒暑,两地遥隔,能不依依?时为秋凉,尤望加紧珍重。”“妮娜在你殷勤爱护之下,必定很幸福地过她的生活,亦必比以前更天真活泼了。她这一副小面孔,我时常都怀念着她”,“我想再不久,我们可以

见面团聚彼此交换一些过去的经验和意见,又是何等愉快的事呢。现在你更要安心工作,我回来时必定带给你许多安慰和愉快。”<sup>[1]</sup>这是冼星海在苏联期间写给钱韵玲的唯一的一封信,寒冷的气候、生活的困顿击垮了他的身体,但丝毫没有改变他对妻子和女儿的思念,他常常在工作之余,抱着小提琴,紧闭双眼,面对旁人的不解和疑问,他说:“我想中国,想妻子和女儿……”<sup>[5]29</sup>他甚至“把小提琴称之为女儿”,把房东家的孩子当作自己的孩子一样呵护有加。1945年10月积劳成疾的冼星海在莫斯科的克里姆林宫医院溘然长逝,而钱韵玲对冼星海的思念在洗妮娜的身上得到体现,洗妮娜在《我的父亲冼星海》这篇文章中写到:“我在妈妈对爸爸的思念中渐渐长大。我从延安鲁艺师生的谈话中,知道父亲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是一个意志坚强、工作勤奋的人,是一个爱国爱家的人,是一个非常乐观的人,是一个真正把音乐作为终身追求,以至献身的人。我多么希望见到爸爸。”“我和妈妈天天都在盼望中度过那些望眼欲穿的日子。可是爸爸没有回来。当我看到鲁艺的师生们召开隆重的追悼会,很多人失声痛哭,我知道爸爸不会回来了,我再也听不到他唱歌了。”<sup>[6]25</sup>一个对亲生父亲没有记忆的孩子对父亲的崇拜与思念,定然来自母亲的潜移默化,来自于母亲对父亲的点滴思念。1975年,在冼星海逝世30年后,钱韵玲还专门致信毛泽东主席,并促成首都音乐界举办了一次盛况空前、激动人心的纪念人民音乐家聂耳、冼星海的音乐会,在乐坛传为美谈。

## 五、结语

哲学家黑格尔曾说:“爱情是男女青年共同培育的一朵鲜花,倘若把它囿于‘个人私生活’的狭小天地,就要枯萎凋零,只有使它植根于‘为人类幸福而努力奋斗’的无限沃壤中才会盛开不衰。”冼星海与钱韵玲的爱情与婚姻是革命与音乐的结合,既有红色的印记,又有时代的特点。革命是贯穿其爱情与婚姻的主题,他们都崇尚革命、认同革命、投身革命,在革命的洪流中,树立了共同的革命信仰,培育了共同的革命情怀,最终成为了志同道合、情投意合的革命伴侣。而音

乐又是贯通其爱情与婚姻的红线,他们拥有各自的音乐情节、秉持共同的音乐立场、追逐共同的音乐理想,在抗战音乐活动的浪潮中,彼此欣赏、互生情愫,从而结成琴瑟相谐、相濡以沫的艺术伉俪。从他们结合的过程来看,他们的爱情与婚姻经历了逐步演进、不断升华的过程,从相识相交的懵懂、相知相恋的憧憬、相随相伴的成熟,到相念相思的升华。他们的爱情与婚姻洗尽铅华、不畏艰难、休戚与共,走出了一条通往幸福的康庄大道。真正的爱情是共同成长、相互成就的,钱韵玲为冼星海洗衣、烧饭、画谱、抄曲,使冼星海没有生活的后顾之忧、潜心创作,成为“人民的音乐家”。冼星海在注重自我成长的同时,也不断为钱韵玲探寻成长之路,让她学习政治理论,

教她谱曲创作,不断为她注入精神动力,使得钱韵玲成为了“音乐教育家”。冼星海与钱韵玲在生活上、音乐中、革命里,切实做到了志同道合、情投意合、互相关怀,为当代文艺工作者的爱情与婚姻提供了典型案例和示范引领。他们的爱情与婚姻启示着当代文艺工作者在爱情与婚姻的道路上应该秉承和恪守初心,在纷繁复杂的世界和各种各样的诱惑中牢牢把握爱情的本质和婚姻的真谛,自觉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马克思主义爱情观、婚姻观引领和规约自己的情感世界,始终保持坦诚相待、信守承诺、担当责任、相互包容,为当代文艺发展、艺术精进、社会和谐不断助力,谱写当代文艺工作者爱情与婚姻的新篇章。

## [参考文献]

- [1] 黄训. 两地遥隔,能不依依——星海写给妻子钱韵玲的信[J]. 思想政治工作研究,2013(3):33.
- [2] 钱韵玲. 忆星海[J]. 人民音乐,1977(6):4-10.
- [3] 《冼星海全集》编辑委员会. 冼星海全集:第一卷[M]. 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89.
- [4] 刘迪生. 大河之魂——冼星海和他的非常岁月[M]. 广州:花城出版社,2015.
- [5] 左贞观. 星海在苏联[J]. 人民音乐,1989(5):26-31.
- [6] 冼妮娜. 我的父亲冼星海[J]. 人民音乐,2005(8):24-25.

## On the History of the Relationship and Marriage of Xinghai Xian and Yunling Qian

HU Yi-hua<sup>1,2</sup>, PAN Ting<sup>1</sup>

(1. Wuhan Conservatory of Music, Wuhan 430060, China; 2.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China)

**Abstract:** In the vicissitude of musician Xinghai Xian's life, Yunling Qian, his wife, is of irreplaceable importance. Their almost legendary relationship started on the musical stages and matured in revolutionary environment in Yan'An. It was tested in the Second World War against Japan and finally settled in the roaring song of Yellow River. Seen as a whole, their relationship progressed from an initial meeting to getting to know each other, then to falling in love, then to becoming more devoted to each other and finally to becoming one, with each stage of their relationship intertwined with the revolutionary contemporary history, making their story all the more dramatic and remarkable at the same time. Their relationship exemplifies the grea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nd illustrates the magnificence of revolutionary ideology, but more importantly it is an epitome of the view point of love and marriage with Marxist ideas, making it an archetype of what artists in the new age should aspire their love and relationship to be.

**Key words:** Xinghai Xian; Yunling Qian; love; marriage; history

(责任编辑 文向华)

· 妇女史研究 ·

# 延安时期革命女性的道德观

刘永青

(陕西省委党校,陕西西安 710061)

**摘要:**革命女性是延安时期最具有代表性的女性群体,她们身上所体现出的优良道德在我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也成为延安精神的一个重要体现。首先,延安时期的革命女性在革命实践中形成并进一步坚定了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坚持集体主义的革命道德原则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革命道德核心,体现出对共产主义新道德的追求。其次,延安时期的革命女性积极参与社会实践,在争取政治权、经济权和教育权的进程中展开了对女性道德平等权的追求。再次,延安时期的革命女性在婚姻家庭方面追求建立在爱情基础上的婚姻生活,追求自由平等的家庭关系模式,倡导家国一体的家庭道德新理念,在共产主义思想指导下构建出新型的家庭美德。

**关键词:**延安时期;革命女性;道德观

**中图分类号:**D44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838(2019)01-0052-06

道德是人们生活及其行为的准则和规范,它通过社会一定阶段的舆论对社会生活起导向和约束作用。在各个历史时期,社会对女性的道德要求以及女性自身的道德观都是不同的,并体现出不同的时代特征。延安时期,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妇女解放运动蓬勃发展。特别是根据地建立后,妇女们一改千年的传统习俗,参军、拥军、参与劳动生产,革命热情空前高涨。这个时期在广大革命女性身上所表现出的英勇顽强、不怕牺牲、团结奋斗、舍己为人等崇高品格是中国历史上任何时代的女性所无法比拟的,这些转变也必然带来女性道德观的新变化。

## 一、延安时期革命女性对共产主义新道德的追求

道德是人们经济生活与其他社会生活要求的反映,“由于阶级地位、阶级利益的不同,道德

的观点,各有不同。”<sup>[1]</sup>延安时期,共产主义者们在进行民主革命和推进党的自身建设的过程中形成了新的道德观。这种共产主义新道德“建筑在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的基础上,建筑在最后解放全人类、拯救世界脱离资本主义灾难、建设幸福美丽的共产主义世界的利益的基础上,建筑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共产主义的理论基础上”<sup>[2]</sup>,是“中国历史上最高尚最完美的道德”<sup>[1]</sup>。延安时期的广大革命女性积极投身于抗战救亡的革命行列,接受无产阶级革命思想的洗礼,她们的身上也体现出对共产主义新道德的追求。

首先,延安时期的广大革命女性形成并进一步坚定了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理想信念问题,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根本性的问题。建立在科学认识基础上的理想信念是人们战胜一切艰难困

收稿日期:2018-10-21

基金项目: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男女平等理论与实践研究”(项目编号:2016A008)

作者简介:刘永青,女,陕西省委党校哲学部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中国传统伦理思想、性别与文化等研究。

苦的强大精神力量。党中央在延安扎根十三年,且中国革命之所以由弱变强,转败为胜,不断走向辉煌和胜利,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在延安,广大革命女性克服了比男性更多的来自于生理、心理以及外在环境的困难,投身于救国救亡的洪流之中,在革命实践中不断坚定着自己的政治信仰。尤其是整风运动和延安所倡导的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为革命女性实践科学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平台:整风运动提出了要克服局限、转变思想,改变非科学的世界观;大生产运动则要求广大的党员和非党员与根据地的劳动人民一样参加生产劳动,在生产劳动中实现自己新的人生价值。同时,在延安,很多革命女性尤其是女性知识分子参加了中国女子大学、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中国抗日军政大学等学校的学习或工作。这些学校都非常重视对学员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比如当时的中国女子大学就明确规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革命基本问题作为必修科目,其设立的政治课程也主要是让学员们了解正确的路线方针及思想理论方略。此外,在平常的工作中,这些学校还会不定期组织思想理论学习,中央领导也常常到各个学校和工作地进行宣讲,学习和宣讲的主要内容包括中国共产党各项方针政策以及当时的形势等问题。可以说,在当时的延安,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宣讲基本上成为革命女性日常生活的必修课。通过不断的思想理论的学习,再加之劳动实践的切实感受,这些革命女性更加坚定地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确立了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

其次,延安时期的广大革命女性重视并自觉坚持集体主义道德原则。集体主义是相对于“个人主义”而提出的中国革命的道德基本原则,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毛泽东同志曾经对集体主义进行过强调和阐发。他说:“一致的行动,一致的意见,集体主义,就是党性。我们要使许多自觉的个性集中起来,对一定的问题、一定的事情采取一致的行动、一致的意见,有统一的意志,这是我们的党性所要求的。”<sup>[3]</sup>延安时期的革命女性,无论是从全国各地

来到革命圣地的进步女青年,还是边区建立起来之后从陕北各地选拔出来的女干部,她们身上都极具革命的热情,痛恨旧的封建伦理道德对女性的压抑和破坏。这些女性大多受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启蒙思想的影响,极力追求个性的解放和个体的自由。刚刚参加革命的时候,她们中的很多人思想中或多或少都带有一些个人主义或者自由主义的因素。她们到达延安之后,延安军事化的集体生活既给予了其强健的体魄,也重新塑造了她们无私、团结的个性,她们的纪律性大大增强,并进而建立了一种“一切相信组织,一切依靠组织”的集体主义思维模式。在这一过程中,她们的自我得到了升华,她们不再单纯为个人而活,不再把个人的得失利益、情绪思维、生存发展看作是生活的全部,她们要为革命而斗争。延安整风之后,丁玲有一段话最能表现革命女性的这一转变。她说:“过去走的那一条路是达到两个目标的:一个是革命,是社会主义,还有另外一个,是个人主义,这个个人主义穿上革命的衣裳,同时也穿上颇不庸俗的英雄思想,时隐时现。但到陕北来了以后,就不能走两条路了,只能走一条路,而且只有一个目标,即使是英雄主义,也只是集体的英雄主义,也只是打倒了个人英雄主义以后的英雄主义。”<sup>[4]</sup>在这些革命女性的身上,集体的荣誉已经与个人的基本利益结合在一起,同志式的阶级感情让她们体会到革命大家庭的温暖,也让她们认识到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是根本冲突的,并进而在思想和实践上都实现了由“个人”向“集体”的转变,开始自觉坚守集体主义的道德原则。

再次,延安时期的广大革命女性自觉树立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道德意识。中国革命道德的核心,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延安时期很多革命女性早期受小资产阶级或者小农意识的影响,还没有冲破狭隘的阶级观念局限,思想上也还没有意识到服务于大众才是真正的工作重心。在轰轰烈烈的整风运动和大生产运动中,她们很多人到了延安最边远的山区,与当地农民一起参加生产劳动,同吃同住,这些让她们真正了解了中国农村最基层的民众生活,认识到了什

么是真正的人民大众,认识到了人民大众在革命中的重要作用,由此她们开始站在革命和人民的立场上审视自己的思想和行为。比如丁玲在1942年3月9日于《解放日报》副刊上发表的《“三八”有感》中就进行了深入的自我反省:“我在那篇文章中,安置了我多年的痛苦和寄予了热切的希望……但我只站在一部分人身上说话而没有站在党的立场上说话。”从丁玲的身上,可以看到延安时期很多女性知识分子思想上的变化。作为革命女性,她们已经看到了个人主义和狭隘的女性意识所带来的思想上的局限性,开始从思想根基上树立了融入群众,依靠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革命道德意识。反映到行为实践中,她们逐渐抛弃了脱离群众的错误观念,与工农群众密切结合,融入到工农群众的生产生活实践之中,在为人民服务的革命实践中追求着自身的价值。

## 二、延安时期革命女性对女性道德平等权的追求

传统的中国社会是一个男权社会,以“男尊女卑”等级观念为核心的男权道德是社会道德的主导。这种男权文化使得男性成为道德评价标准的制定者和评价者,他们从维护自身性别利益的角度出发,要求女性遵守“三从四德”,宣扬以“贞顺”“尚柔”“卑弱”等为核心内容的“妇德”,以此来束缚妇女,剥夺妇女自我发展的权利,使广大女性在道德问题上失去了话语权和主体地位。延安时期,在革命理念的影响下,成千上万的女性冲破旧家庭、旧观念的束缚,反对传统社会对她们的身份定位,积极参与到民族解放和革命斗争的洪流中,在实现妇女解放的进程中也展开了对女性道德平等权的追求。

首先,革命女性积极参与社会事务,争取政治权力,为实现女性道德平等构筑了坚实的政治基础。在延安,女性的社会地位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其具体表现就是革命女性参政的广泛性。不仅仅是那些参与建党或在党成立之初就参加革命的女性领导者,也不仅仅是那些经过长征考验的有老资历的女革命者们,还包括那些出身社会底层、深受旧的统治者盘剥和压榨而选择投身革

命的女工、女农及那些从四面八方投奔光明而来的知识女青年们,她们也都积极参与到社会事务中来,成为女性参政的主体。有资料统计,到1938年底陕甘宁边区建立之后,从陕北当地选拔出来的各级妇联干部,县级以上的已经接近三百人,而至1949年从全国各地奔赴延安的在边区一级机关工作的女知识青年的人数也大概有三百多人。女性拥有参政权是男女平等的重要体现,也是延安时期实现女性道德平等权的主要内容。陈东原说:“欲求社会之平等,必先求男女之平权;欲求男女之平权,非先予女子以参政权不可。”<sup>[5]</sup>延安时期,在陕甘宁边区,广大女性开始有了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这极大地增强了她们的主体意识和参与政治生活的积极性。1937年7月,在陕甘宁边区举行的第一次参议会选举中,边区妇女开始行使自己的权利,19位女性当选为女参议员。之后,到第二届参议会选举的时候,参与选举的妇女占到了全边区妇女人数的30%,当选的女参议员人数也大大增加,其中乡级女参议员2005人,县级167人,边区一级17人,还涌现了很多女乡长、女区长。同时,在延安,中国共产党还制定了一系列关于妇女的政策和措施,鼓励和保障妇女的参政权利。如1939年边区第一届参议会通过的《提高妇女政治经济文化地位案》中就有一条规定:“各级参议会应有百分之二十五的女参议员,各机关应大量吸收妇女工作。”<sup>[6]</sup>中国共产党的一系列正确的妇女政策、妇女思想,为广大根据地的革命女性创立了良好的政治氛围,使得女性的解放由原来局限在家庭领域上升到了政治领域,为革命女性追求道德平等和实现最大价值提供了政治基础。

其次,革命女性积极参与边区的经济建设,确立自身的经济地位,为实现女性道德平等构筑了坚实的经济根基。马克思曾经讲过:“社会的进步可以用女性的社会地位来精准地衡量。”<sup>[7]</sup>也就是说,女性解放的根本标准就是获得与之相应的社会地位、经济地位,这也是实现女性道德平等权的前提。在延安,逐渐解放出来的广大革命女性,获得了与男子平等的经济权利和参加劳动的机会,她们参与到生产劳动中,工作在各个

岗位上,为前线战斗和边区革命的物质保障作出了巨大贡献,同时也增强了自身的经济自立能力。据统计,在边区,1938年到1945年间,有20万妇女参加纺织工作,纺纱600多万斤,织布约46万大匹<sup>[8]</sup>。边区广大妇女自动组织缝衣队、洗衣队、救护队支援前线,以多种方式参与到边区革命之中。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妻子——海伦·福斯特·斯诺在参观延安的工厂时对那些女工有深刻的印象。她写道:“工厂的女工均身穿红军制服,头戴红星帽,短发齐额。……她们健康、善谈、欢快、焕发着青春活力——这与中国女工常见的那种暗淡无望、凄凉悲苦的情形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她指出,在这些女工身上,“有一种自由、尊严和当家作主的感觉”<sup>[9]</sup>。随着革命女性们在边区经济建设中作用的发挥,她们的社会、经济地位也不断得到提升,这严重动摇了充斥于旧社会的“男尊女卑”的传统道德观,而以男女平等为核心的新型道德平等观逐渐在边区树立起来。

再次,革命女性打破传统教育中的性别隔离,争取女性受教育权,为实现女性道德平等构筑了坚实的文化根基。在传统的中国封建宗法社会中,教育和受教育权被男性所垄断,很多的边区革命女性都没有读书受教育的机会。而很多奔赴到延安的女知识青年,尽管曾经读过书,但由于出身环境等的影响,她们很多人身上还或多或少地留存有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这直接影响着她们的政治觉悟和工作能力。如何让这些革命女性受到更好的培养教育,不仅关乎革命女性的自我成长,也关乎边区的建设和革命的发展。因而,在延安,中央政府和边区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对革命女性的教育培养。一是组织发动知识妇女和青年女学生,加强她们的政治理论修养,培养她们成为德才兼备的妇运干部,让她们深入到农妇、女工和家庭妇女之中去开展工作和进行教育培训;二是在党的训练班中多吸收女性党员参加,选派在职女干部根据自身情况到各种政治文化学校学习,开办专门的妇女干部培训班,同时注重在女工、农妇中发展培养党员干部;三是在边区开展大规模的扫盲活动,通过识

字班、夜校、技能培训班等多种形式开展妇女教育,提升她们的劳动技能和政治觉悟,开拓她们的视野,提升她们的综合素质,让更多的边区妇女加入到革命者的行列,融入到民族解放的革命洪流中,并进而成长为既有革命理论又掌握革命工作方法和职业技能的新女性,这为女性道德平等的实现奠定了文化根基。

### 三、延安时期革命女性对新型家庭美德的追求

家庭道德是指在婚恋和家庭领域内的道德规范。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父权制让广大女性在婚姻家庭里丧失了自主权和选择权,“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成为千百年来中国传统社会亘古不变的婚姻准则,而在家庭关系中“男尊女卑”“夫为妻纲”等封建道德规范更是置广大妇女于受压制、受禁锢的地位。为了摆脱这种传统的婚姻家庭伦理对女性的束缚,延安时期的革命女性打破根深蒂固的传统家庭性别秩序,追求婚姻自主。她们反对包办和买卖婚姻,认为婚姻应当建立在志同道合的爱情基础上,并且以自主自愿为前提。她们倡导婚姻生活中的男女平等,倡导家庭与事业并重,追求家国一体的家庭道德新理念,在共产主义的思想原则指导下构建出新型的家庭美德。

在对爱情婚姻的态度上,延安时期的革命女性极力反对旧式封建包办婚姻,追求建立在志趣相投基础上的婚姻生活。1942年3月2日,邓颖超在青年妇女座谈会上谈到男女青年的择偶和婚姻生活时指出:“对待恋爱和婚姻的态度,我们主张要慎予选择,出于自愿,情投意合,须有高尚的情感、共同的志趣、共同的事业,在这些基础上,还得加上男女双方不断的努力,才能使爱情巩固和发展,生活幸福。”彭雪枫也曾建议说:“我觉得夫妇之间,那种庸俗的低级的趣味主义的态度和习性,并不能维持夫妇关系良好友爱于长久,而应互相采取一种严师益友爱侣的态度和习惯,方能保持永恒。”<sup>[10]</sup>正是出于对爱情婚姻的这种认识,延安时期的很多革命女性特别注重爱情生活中的两情相悦。在写给黄克功的一封信中,刘茜就表达了这样的观点:“我希望我的爱人

变成精神上的爱我者。我希望你站在朋友或爱人底地位来指导你的小妹妹,能吧!?!……爱情不是建立在物质上的,而是意志、认识的相同,你不应该把物质来供我,这是我拒绝你送我钱和用品的原因,就是夫妻在合理的社会制度中,互相的经济也是各不依靠,而是帮助,你认清点!! 我们都有恋爱的自由,谁都不能干涉对方交友。”<sup>[11]</sup>从信中可以看出,延安时期的革命女性们更渴望的是精神交融的情感生活。她们藐视旧的婚姻陈规,在她们看来,自由的恋爱与婚姻才是人性的真正自由释放。

在家庭地位方面,延安时期的革命女性追求自由平等的家庭关系新模式。从社会历史的发展来看,随着私有制的产生,以使用为目的的劳动生产逐渐衰落,代之而起的是以交换为目的的劳动生产的大量涌现,这种交换性的生产活动改变了妇女家务劳动的性质,引起了家庭结构的变化,使得妇女在家庭和社会中的地位下降,并逐渐沦为男性的附庸。延安时期的革命女性从这种旧式的家庭当中解脱出来,改变了作为旧式女性在家庭中无地位、无独立人格,只能作为生育工具而存在的身份,从小家庭进入到大社会,参与社会的各项事务,表达自己的愿望和要求。正是因为对社会生活的广泛参与和经济地位的获得,延安时期的革命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得到很大的提升。“安塞县有一个媳妇,过去常常挨打受气,自从学会了纺织,挣了钱,家里人对她另眼相看了,就连平常最凶的老公公,在她夜晚织布时也主动举着麻秆火把为她照明。”<sup>[12]</sup>从这段描述中可以看到,广大的边区女性不再只围着锅台,只看孩子而不关心时事,尤其是随着男性大量参军,女性成为后方生产的主力,成为参与民族解放的重要力量,女性社会价值的体现也有了一个新的衡量标准。

在处理家庭与工作的关系上,延安时期的革命女性推崇家国一体的家庭道德新理念。“贤妻良母”是中国封建时代对女性的最高要求。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国民党提出“新贤妻良母主义”,号召职业妇女回家,引发了各界对“妇女回家”问题的大论战。延安时期的革命女性们也

这一问题作出了自己的回答。1943年2月12日《解放日报》发表《新女性的典型——前驻苏邵大使谈》一文,文中认为苏联女性把家庭与事业、家庭与社会的关系处理得很好,她们既有浓厚的家庭观念,同时自己的事业也干得非常出色。她们不仅仅关心自己的小家,而且关心国家、社会,“她们有责任心,把自己当作国家的一人,社会的一人”。这些苏联女性可以作为“新女性的典型”,值得学习。以此为榜样,延安时期的革命女性一方面自觉担负起与男性同样的对国家、社会的责任,另一方面也深深意识到作为女性、作为母亲,她们身上还担负着家庭的责任,担负着养育教导子女的责任。因此,《救救母亲》一文就曾指出:新女性不仅仅是个“好母亲”,而且是“各种学问和事业的创造者”。周恩来在他的《论贤妻良母与母职》中也专门谈到过这一问题,他批评了国民党提出的“新贤妻良母主义”,认为让职业妇女回家是社会的倒退,但他同时也强调“母职”仍然是广大女性最重要的社会角色,不过新女性应当超越这一角色,兼顾好家庭和社会角色。从这样的观点出发,所谓的“母职”便不再仅仅是指对自己的孩子,而是一种革命女性的普遍的母爱。正如邓颖超所说:“在由共产主义的含义和共产党人的立场说,我们应当无条件地爱护任何一个孩子。不问孩子的父母出身、社会政治地位、思想信仰怎样,亦不论识与不识,更不分男孩和女孩、自己的或者别人的、或是私生子,甚至敌人之子女,我们都应该大公无私地一视同仁,把他们都看成是将来国家社会的一个成员、一个新的主人翁。”<sup>[13]</sup>在战火连绵的年代,许多革命女性为了革命事业不得不舍弃自己的亲生骨肉,但她们却在战争的洗礼中成长为坚强勇敢、具有博大爱心的“革命母亲”,为家庭美德注入了新的时代内容。

总之,延安时期的革命女性在道德观上的变化,彻底动摇了封建时代“女子无才便是德”“三从四德”等旧的男尊女卑的社会观念,使得“男女平等”“婚姻自由”“妇女参政、受教育”成为新的社会观念的主题,充实了党的妇女政策,有力地

推动了根据地妇女运动的发展。同时,由这些革命女性所带动的根据地妇女运动以及由此展现的根据地的民主的生活状态,在更大的范围内引

起了广大进步女性对延安“红色之都”的精神向往,进一步扩大了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为党在延安的壮大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

[参考文献]

- [ 1 ] 黎平. 中国共产党与道德[J]. 解放,1939(71):21.
- [ 2 ] 刘少奇. 刘少奇选集:上[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133-134.
- [ 3 ] 毛泽东. 毛泽东文集: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417.
- [ 4 ] 丁玲. 丁玲全集:第9卷[M]. 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4:134.
- [ 5 ] 陈东原. 中国妇女生活史[M].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4:360.
- [ 6 ] 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 陕甘宁边区参议会文献汇辑[C]. 北京:科学出版社,1958:47.
- [ 7 ]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56.
- [ 8 ] 西北五省区编纂领导小组,中央档案馆. 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回忆录卷[M]. 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457.
- [ 9 ] 海伦·福斯特·斯诺. 中国新女性[M]. 北京:中国新闻出版社,1985:181-182.
- [ 10 ] 彭雪枫. 彭雪枫家书[M]. 北京:文物出版社,1995:104.
- [ 11 ] 陕西省档案馆. 刘茜致黄克功信[A]. 西安:陕西省档案馆.
- [ 12 ] 张秀丽,李梅. 试论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妇女思想观念的解放[J]. 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3):58-61.
- [ 13 ]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邓颖超文集[C].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8.

## Ethics of the Revolutionary Women during the Yan'an Era

LIU Yong-qing

(Party school of shanxi Provincial Committee of C. P. C. ,Xi'an 710061, China)

**Abstract:** Revolutionary women were the most representative during Yan'an period. Their high moral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revolution of new Democratic Revolution in China, and it was an important embodiment of the Yan'an spirit. Firstly, the revolutionary women during Yan'an period formed and firmed communist ideals and beliefs in revolutionary practice. They adhered to the principles of revolutionary morality of collectivism and the revolutionary moral core of serving the people wholeheartedly, thus embodied the pursuit of communist new morality. Secondly, the revolutionary women during Yan'an period participated in social practice actively. Their striving showed the pursuit of women's moral equality in the process of striving for political rights, economic rights and education rights. Thirdly, the revolutionary women pursued marriage based on love in terms of marriage and family, and pursued freedom and equality in family relations. They advocated a new concept of integration of family and country. Under the guidance of communist ideology, new family virtues were been constructed.

**Key era:** Yan'an era; revolutionary women; Ethics

(责任编辑 文向华)

· 妇女史研究 ·

# 明清方志文献书写的母教模式研究

杜云南

(肇庆学院, 广东 肇庆 526061)

**摘要:**明清时期,在国家编纂一统志的要求下,地方志的编纂也逐渐规范化和制度化。列女传是方志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列女传呈现了诸多母亲谆谆教子的言行举止,反映了编者期待的贤母之职在于教子成立、兴旺家族,也凸显了母亲的儒家正统形象。但方志书写这些生活于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不同阶层的母亲教子言行却呈现了几种模式化现象,揭示了编者通过树立母亲教子言行的典范,以此向社会推广儒家正统的母教观念的意图。

**关键词:**明清时期;方志;母教

**中图分类号:**G7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838(2019)01-0058-08

根据中国儒家“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原则,女性的生活场域囿于家庭之内,其扮演的家庭伦理角色主要有女、妻、媳、母、姑等,而其中的母亲角色对古代女性别具意义,母亲与儿子的互动关系及情感又是影响古代女性处境与命运的关键因素。如今性别史学方法被运用于妇女史研究,女性作为母亲在家庭中的伦理角色日渐受到关注,其中台湾学者郑雅如<sup>[1]</sup>、熊秉真<sup>[2]78-93</sup>注意到不同时期的母亲角色与亲子关系,衣若兰则以《清史稿·列女传》为例,分析了有清以来正史书写、旌表制度以及方志列女传皆较凸显母亲角色<sup>[3]</sup>。这些研究虽然都注重爬梳不同史料,强调父系文化制度对母子关系的构筑,但忽略了不同地域、不同性质文献书写女性生活的差异。作为正史史料来源的地方志,如何书写地方女性,至今尚未引起学术界的应有关注。明清时期,官方组织的地方志编纂逐渐规范化和制度化。这些代表王朝价值观的地方志记录下了地方历史

的发展进程,也在一定范围内留下了当地女性的言行举止。其记载的女性多为贞孝节烈的列女,形象大同小异,具有明显的模式化倾向。但仔细阅读这些女性贞孝节烈事宜,我们从中亦可以发现,实际上方志文献也为读者呈现了诸多理想的母亲形象,及其编者积极认同的贤母之教。本文拟通过梳理明清广东方志书写的有关母子互动关系的列女传记,试图探讨方志文献如何书写母亲课子,以及编者期待的理想的母亲形象。

## 一、训子忠义

我们现能见到的最早的岭南母亲教子的历史人物应是冼夫人,冼夫人是梁陈隋三代高凉地区的土酋首领,其生活的梁陈之际也是中国历史的大变革时期。最早书写冼夫人传记的是唐魏征的《隋书·谯国夫人传》,该书叙述:

谯国夫人者,高凉冼氏之女也。世为南越首领,跨据山洞,部落十余万家。夫人幼贤明,多筹略,在父母家,抚循部

收稿日期:2018-11-01

作者简介:杜云南,女,肇庆学院旅游与历史文化学院讲师,博士,主要从事明清史、岭南女性文化研究。

众,能行军用师,压服诸越。每劝亲族为善,由是信义结于本乡。越人之俗,好相攻击,夫人兄南梁州刺史挺,恃其富强,侵掠傍郡,岭表苦之。夫人多所规谏,由是怨隙止息,海南、儋耳归附者千余洞。梁大同初,罗州刺史冯融闻夫人有志行,为其子高凉太守宝娉以为妻……

魏征将冼夫人描述为自幼贤明聪慧,能率部众的首领形象,更重要的是冼夫人自小就有向善、劝善的美德。冼夫人嫁与冯宝之后,不仅能够辅助丈夫统领岭南地方豪酋,而且能够带领土酋归附中原王朝。丈夫冯宝死后:

……及宝卒,岭表大乱,夫人怀集百越,数州晏然。至陈永定二年,其子仆年九岁,遗帅诸首领朝于丹阳,起家拜阳春郡守。后广州刺史欧阳纥谋反,召仆至高安,诱与为乱。遣使归告夫人,夫人曰:“我为忠贞,经今两代,不能惜汝,辄负国家。”遂发兵拒境,帅百越酋长迎章昭达。内外逼之,纥徒溃散。仆以夫人之功,封信都侯,加平越中郎将,转石龙太守。诏使持节册夫人为中郎将、石龙太夫人,赉绣纛油络驷马安车一乘,给鼓吹一部,并麾幢旌节,其鹵簿一如刺史之仪。至德中,仆卒。后遇陈国亡,岭南未有所附,数郡共奉夫人,号为圣母,保境安民……

冼夫人在欧阳纥企图诱惑儿子冯仆一起反叛之际,告诫儿子,我家两代忠贞,我不允许你做出有负于国家的事。并亲自发兵坚守,欧阳纥的军队顿时溃散。所以,魏征笔下的冼夫人,不仅辅助丈夫,还会教导儿子,书写的是一个积极归附中央政权的形象。隋立国初,番禺人王仲宣叛,冼夫人初派遣孙冯暄出兵平叛,然而冯暄与叛军陈佛智“素相友善,故迟留不进”,冼夫人知之后大怒,将冯暄系于州狱,又遣孙盎出兵平乱,斩首叛军陈佛智。隋皇帝因此降敕书曰:

朕抚育苍生,情均父母,欲使率土

清静,兆庶安乐。而王仲宣等辄相聚结,扰乱彼民,所以遣往诛翦,为百姓除害。夫人情在奉国,深识正理,遂令孙盎斩获佛智,竟破群贼,甚有大功。今赐夫人物五千段。暄不进愆,诚合罪责,以夫人立此诚效,故特原免。夫人宜训导子孙,敦崇礼教,遵奉朝化,以副朕心。

可见,冼夫人的归附与忠诚之心,也得到中央王朝的褒封与认可。在每年大会的仪式上,冼夫人都将王朝封赐物品陈于堂,“以示子孙,曰‘汝等宜尽赤心向天子。我事三代主,唯用一好心。今赐物具存,此忠孝至报也,愿汝皆思念之。’”冼夫人在表达自己对朝廷的归附之情的同时,还不忘谆谆告诫子孙应赤心向天子,行忠孝之道。

然魏征于武德五年(622年)开始着手编撰《隋书》,距冼夫人逝世的602年已有20多年时间,他并没有亲历亲见冼夫人的事迹,更遑论冼夫人所发出的各种言辞,如果编者是根据前人的记录而成文的,那成文的过程中也一定暗含了书写者需要表达什么样的人物的形象而选取什么样的素材的意图。贺喜通过分析《隋书·谯国夫人传》中冼夫人的形象及其文本诞生的时代背景,认为魏征塑造冼夫人归顺陈隋二朝、尽心事主的事迹与家风显然可以作为冯氏家族忠诚唐王朝的最好宣传,和当时皇帝与土酋间的政治与外交亦相配合<sup>[4]</sup>。那么在这种书写意图下,作为一个母亲角色的冼夫人,在教导子孙的言行上,必然也是显示其致力于维护岭南与中央政权一致的面。可见母教对于国家的统一、社会的安定及政治的清明起到了一定作用。

至少在宋代以后,冼夫人就成了表达地方与中央王朝关系的符号,她既是地方的领袖,又是归附的象征,也是方志收录最早的一位训子忠义的母亲形象。现能见到最早的方志中的冼夫人形象是正德十六年(1521年)刻本《琼台志》<sup>①</sup>卷33《名宦·冯冼氏》中记载的冼夫人,此文仅用202字书写冼夫人在海南地方上的军事行政事

① 本文引用的地方志均为2007年岭南美术出版社影印的《广东历代方志集成》。

迹,其在海南之外的事迹全被省略,贤妻与贤母的形象也不见踪影。而在嘉靖十四年(1535年)刻本《广东通志初稿》卷14《将略》中的《隋冼氏夫人传》中,该书的编纂者戴璟认为,冼夫人因明春秋大义、保境安民而载入史册,在《将略》中排在南北朝的覃元先之后,因而文字亦注重叙述冼夫人的军事谋略,其作为母亲形象的文字全无,也没有刻意突显冼夫人的忠诚之心,通篇记载冼夫人重大战事,全文也只350字,不及《隋书》本传1421字的四分之一。到嘉靖四十年(1561年)广东名儒黄佐编纂的《广东通志》,其在挖掘地方历史人物上不遗余力。黄佐于正德年间编纂《广州人物列传》,力图显示岭南在人才将略、忠孝义烈的历史人物在在有之,并不亚于中原王朝。在通志中他根据《隋书》《北史》参修了冼夫人传,用了1500多字书写了《谯国夫人传》。与此前方志不同,他将冼夫人传记置于卷36《列传二十》中的《列女》一栏,其内容基本沿袭《隋书》,冼夫人训子忠义的母亲形象在方志中得以凸显。以后万历、康熙期间编纂的《广东通志》,多从黄佐版本。

此后方志中训子忠义的母亲亦不乏其人。黄佐的《广州人物列传》收录了一位宋代陈烈妇:陈烈妇,东莞士人李颐妻子,其侍奉公婆孝顺严谨。生子李佳后,夫亡故,“守志教子,俾知向学”。时值宋元易代之际,宋帝昺自闽入粤,驻留于崖山冈川。陈母让儿子“应勤王之诏”,临别时,与子诀别说:“汝宜竭忠,勿以老身为念也”。其意是嘱咐儿子应一心事宋主,不要对她有所牵挂。待李佳出行后,陈母为了断绝儿子的后顾之忧,亦趋广州的黄木湾,毅然赴水而死,而李佳不知情。后李佳至崖山,得到宋皇帝封赐潮郡教授,归家拜母不见,“哀陨莫及”,筑“望母堂”,“以寓终天无涯之悲,闻者两伤之”。黄氏在传文之后附录了时人陈珪为陈氏所作的《精卫词》,并标注传文根据《广州志》和《琴轩集》参修。大德八年《南海志》和天顺八年(1464年)刻本《东莞县志》因是残本无迹可考,成化九年《广州志》并

无此传,崇祯十二年(1639年)刻本《东莞县志》卷5《人物志·节烈传》中的陈烈母传是现能见到的最早方志记录,编者因感叹陈母“勉子勤王而死,以绝其内顾”之烈而将其列于本县节烈女性记载之首,内容与黄佐所记基本一致,只是编者将人物言论中的“老身”改为“我”。此后的方志基本沿袭此文。

类似上述陈烈妇教子尽忠,并以身殉国的母亲形象,在明清换代之际亦有出现。同治十一年(1872年)刻本《南海县志》卷22《列传十·列女》记载明末抗清将领陈子壮<sup>①</sup>母亲朱氏训子事迹:朱氏,陈熙昌<sup>②</sup>妻,“生而婉孌,明诗习礼,而性情贞正”,幼读春秋,读到宋伯姬死时曾感叹:“为女子当如此矣”,后归家陈熙昌生子子壮,“严督养”,子壮以文章显。时值清军攻陷江南之际,明庄烈帝朱由检殉国,弘光帝朱由崧(1607~1646年)在南京继位,后南京陷落,子壮得太后指令:“星驰还粤集旅勤王”,得间隙抵家拜母,朱氏对儿子说:“南京破,吾以汝为死矣,今福王何在,汝何缘独归?”朱氏言下之意责问儿子为何不以死烈护主,而独存归家。子壮泣诉“君臣散失”缘故,朱氏却劝勉说:“尽忠即以尽孝,汝毋以我故藉口养亲,若徒知事我以生,反速我以死也。”朱氏诫子以忠义为先,舍私情取大义,不仅在言语上训勉督促,更在行动上积极支持。1646年,闽粤两地陷落,1647年6月子壮受命与舅子朱实莲起兵抵抗清军,朱氏亦“尽斥金钗犒士”。在攻打广州的过程中失败,子壮被执殉节,朱氏闻讯后说:“儿获死所矣,吾家世受国恩,非是无以报国。”说完则从容入室,投缳而死。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崇祀于节孝祠。方志编者以一千多文字形象地传达了朱氏幼时知书习礼,为母则深明大义,教子尽忠护主的情操。此前康熙三十年(1691年)的《南海县志》和乾隆六年(1741年)的《南海县志》均无朱氏传,但列传“节义”栏目中则有其夫其子传文。后光绪五年(1879年)广州粤秀书院刻本《广州府志》卷142《列女一》则据

① 陈子壮(1596~1647),明末抗清将领,与陈邦彦、张家玉合称“岭南三忠”;字集生,号秋涛,谥文忠;万历四十七年进士。其著有《云淙集》《练要堂稿》《南官集》。

② 陈熙昌,生卒年不详,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进士。

《南海县志》收录朱氏传文,但文字有所删减,全文仅200多字,朱氏读书言论被删去,勉子言论亦被简略为“尽忠即以尽孝,汝无以我故藉口也”,可见,编者篡改了朱氏的教子言论,而此后的方志基本沿袭此文。

经以上案例分析我们发现,岭南由于地处边陲海隅,在宋以前属于未开化之地,由中原土人所记载的洗夫人是一个积极拥护中央政权,又训导子孙行忠义的母亲形象符号,她所行忠义的对象是中央王权,而这种王权并无朝代之分。宋以后,王室南迁,岭南经济崛起,逐渐形成了一批士大夫集团,他们开始记述母亲形象;又由于广东地处边陲,在更朝换代之际,是前朝皇帝流离避难或者蓄力以待东山再起之地,因而他们书写的母亲训子忠义均是易代之际如何教导儿子忠贞前主,并以死殉国的烈母形象。但是不同方志编者在书写同一人物时,或多或少地篡改了母亲教子言论。

## 二、课子成立

明清方志多属当时人记当时事,对历史久远的女性事迹的挖掘毕竟是少数,编者书写的多为宋以后的女性事宜,又集中于夫亡守节的女性生活。女性遭遇夫亡厄运,其活下来的理由是抚孤育子,延续夫家血脉,她们把自己的希望和命运寄托在儿子身上。岭南方志编者亦聚焦于守节女性,书写她们抚育孤子,重点是书写她们如何负起教育孩子的责任,尤其是对男孩的教育,这种教育包括亲授儒学,或者激劝亲子学儒,培养儿子走上仕途。

嘉靖以后,广东方志记载的由母亲教授儒家经典,并培养出岭南学士名儒的案例不胜枚举。万历间刻本《琼州府志》卷10《人物志·列女》记载了琼山县海瑞(1514~1587年)母亲谢氏:海大恭人谢氏,庠生海翰妻子,年28岁守寡,子海瑞4岁,“家计萧条”,谢氏矢志鞠育儿子成立,“日夜勤女红”,并“口授瑞以《孝经》《学庸》诸书”。海瑞少时“有戏谑必严词正色海之”。谢氏在夫亡

子幼家境贫寒的情况下,母代父职,亲自传授海瑞以儒家经典学问。后海瑞官至右都御使,其母功不可没。谢氏因此于天顺年间获得官方旌表。

由母亲来传授学问,这反映了明清女性本身具备良好的学识教养,给予嗣的知识教育带来极大的帮助。美国学者高彦颐注意到明清妇女在教育、读书、出版和交流等方面机会的不断增加,为其行使母亲责任提供了最强有力的条件;而且寡母督管儿子教育,被突出地描绘在传记中,以至于它几乎成了一种文学惯例<sup>[5]</sup>。又如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英德县志》卷3《贞烈志》记载刘氏,“通大义,过目吟”,年21寡,守志抚孤,育子有成,后又以《孝经》《四书》口授幼孙。像前述谢氏一样,刘氏在夫亡后,也亲自传授、督管子孙学习儒家经典。

同样,嫡母教授庶子也是编者书写的内容。光绪五年(1871年),广州粤秀书院刻本《广州府志》卷142《列女一》记载香山县何氏,生员杨兆公妻,侍奉公婆“动止有仪,吐辞以则”,姊妹都以她为师,何氏婚后无子,悉出嫁妆为兆公买妾生子,后兆公病卒,妾生子晋,何氏亲自鞠育,口授以《小学》经传,后晋学有所成,“捧檄色喜”,何氏说:“汝欲效毛义<sup>①</sup>耶?与子偕隐足矣。”毛义有孝行且不贪禄,为世人称道,何氏引经据典鞭策庶子淡然处世。从这则案例,也可见编者意欲凸显的嫡母与庶子之间应有的亲密关系。后来何氏守节三十九年,县令上其事请旌。像谢氏、刘氏和何氏这样亲授诗书的案例,方志中屡见不鲜。英国学者白馥兰曾将明清书写妇女教育孩子现象的增多,归于宋以后劳动经济的专业化和商业化,妇女在纺织劳动上的价值降低,使其职责迁移到生育和教养孩子上来<sup>[6]</sup>。但是在方志书写的千篇一律的寡妇家庭中,明清女性不仅仍要像远古家庭女性一样,从事纺织、侍奉公婆的职责,还承担了训子读书的任务,编者总是乐意记载这些毫无怨言地担负起没有男性家长的家庭事务

① 毛义,字少节,东汉末庐江人。自幼丧父,母子相依为命。家境贫寒,年少便以为他人放牧为生,箪食瓢饮,奉养其母。母病伺候汤药,曾割股疗疾。遂以孝行称著乡里,举为贤良。朝廷得知,送檄文赏封他为安阳县令,为了安慰母亲,毛义迎至“临仙桥”喜接檄文。然时隔不久母亲病逝,朝廷派人前来看望,岂知毛义却跪拜于“临仙桥”上,将原赏封安阳县令的檄文双手捧还,“躬履逊让”,不愿为官。葬母后隐居山野。见《后汉书·刘平传序》。

又能教子有成的女性事迹。这似乎说明了明清女性在家庭、社会中所承担的职责范围越来越广泛,其主体地位也在逐渐提升。

如果说上述有教育背景的女性亲授儒学是母教职责的话,对于大众家庭来说,即使母亲所受教育没有达到可以亲自教子的程度,她也能够认识到教育的重要性,鼓励儿子向学。嘉靖四十年,《广东通志》卷63《列传二十·列女》记载肇庆府四会县欧阳氏:

欧阳孺人,四会林相妻,年十五归相,惠柔孝敬,相省父于故城,返于途卒,欧阳闻之即欲以死从,每哀恸欲绝而复苏。一子世远。所亲讽以他适,欧阳曰:“吾忍舍儿女,不忍负吾夫。”言者愧沮。成化甲午,舅补官上高,召世远往就学,人有以孤幼勿远游言者,欧阳曰:“吾妇人不知书,亟往,万一有成,庶不泯渠父也。”世远既登第,令莆田芜湖,迎母就养,每戒毋用严刑。以子贵赠孺人。弘治二年,知县立详具奏旌表其门,缙绅作《贞则录》以美之,少傅姑苏王鏊为之传。

此传文后标示“据肇庆志修”,嘉靖以前的肇庆志现不存,无法查对。不过,该传形象地描述了欧阳氏励苦守节教子的言行,欧阳氏虽“不知书”,但认识到读书的重要性,积极督促儿子学习,后儿子学有所成,又诫子为好官。她也因此荣获官方旌表,美名远播,姑苏大学士王鏊(1450~1524年)为之作传。后万历十六年(1588年)刻本《肇庆府志》卷20《列女传》亦收录欧阳氏传文,与前述传文有所区别:

欧阳氏,四会人林相妻,相省父于故城,归至湖口卒,欧阳闻之哀恸几绝,誓无他志。一子世远,教有义。方舅补官上高,召世远往就学,有以孤幼言者,欧阳曰:“是宜亟往,他日有成,庶不泯其父也。”世远登进士,令莆田芜湖,迎母就养,每以严刑为戒。后赠孺人,诏旌其门,少傅王鏊为之传。

与前面的传文比较,该传文仅一百多字,删

略了亲人劝其改嫁的情节和言论,是据王鏊所作的《林节妇传》以及旧志通志所修。王鏊,江苏吴县人,成化十一年进士,官至少傅兼太子太傅、武英殿大学士。其所作《林节妇传》长达500多字,叙述了林相远的母亲欧阳孺人,幼时就有贤明孝敬的本性,夫死后又矢志守节,勤俭操劳,帮助家庭度过经济危机,并精心调护多病的幼子,对其学习更是“少懈则苛责不贷”,督子往公公处求学的言论为:“吾舅命也,吾意正在此耳”。很显然,编者虽与王鏊所写传文表达意思一致,但对文字进行了修改。此后的县志、府志和通志基本沿袭万历府志。从这则案例我们可以看出,不同的方志编者根据自己编修的需要对欧阳氏的传文以及言论进行了修改。

母亲感化儿子向善亦是方志编者书写母教的重要内容。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刻本《新会县志》卷15《列女志·节孝》记载甘氏,16岁嫁给刘承业,25岁夫卒,甘氏欲以死相殉,亲族劝以抚孤儿以安舅姑心,乃不死,后子鸣世“少任侠弗羁”,甘氏训诫说:“儿若此,先人其弗嗣矣。”放声哭,鸣世惧,“跪白请改求师于叔杰”,杰说:“无如黄先生乎者”。后鸣世跟随黄孚折节读书,“尽捐夙习揆义于矩”,甘氏则能宽心纺绩事舅姑。……甘氏用谆谆之言语,加上眼泪的攻势,终于感化世鸣奋发求学。光绪二年重刊本《肇庆府志》卷19《人物二·列女一》记载生员温召妻李氏,温愿的母亲,年25岁而寡,“家贫勤纺绩,训子严正”,其子“偶佻挞,必不恕”,常常流涕对子说:“我寡家贫,只生汝,苟堕家声,不若与汝俱死”。其子受其感化,“慎守其训”而成立。该方志还记载一例阳春县黄守玠妻教子济贫行善的言行:吴氏年19夫故,儿子仅生两月,上有孀居的婆婆,时逢乡寇劫掠,吴奉姑与子播迁经营,孝养勤俭致裕,尝教子说:“贫而能约,富而能济,古之道也”。后子纯武游庠,“善体母志”,捐金赈饥,代穷乏者偿夫役之费,邑令朱以惠及桑梓表其间。纯武之善举可谓得益于母教。

总之,寡母不仅要承担家庭的物质生活责任,还要担负起教育年幼儿子的责任。其教育涵盖启蒙授书、立身处世、改过迁善、救世济物等,

通过道德价值观念的灌输,使孩子成为一个符合儒家标准的有用之人。在教子过程中,母亲性格往往是“严正”,行为举止动则以礼,其作为教导者,具备不可违抗的权威性,儿子作为受教育者,对母亲恭谦顺从。熊秉真认为,母亲与儿子一起忍受人生种种苦难并教育儿子成人立世的经历,加深了母子之间的情感,这种经历不仅加深了儿子对母亲的依恋,母亲的痛苦和对儿子的无私奉献也在儿子心灵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儿子怀着一辈子的内疚感<sup>[2]255-280</sup>。所以我们看到的贤母传记,一般是儿子在晚年时回忆而书写的,带着这样的情感因素的书写者,必然会将母亲的苦难和自己的成就联系在一起,并将其归功于母亲的无私奉献。因此,从方志描述母亲如何教子有成,如何塑造母子之间的慈爱和敬重的关系,似乎可以看出母子之间的关系已悄然逾越了男尊女卑的藩篱。

### 三、助子为官

在母亲严苛的教育下,儿子往往奋发求学,长大后学有所成,并晋升于官场。对于做官的儿子,方志一方面会书写儿子如何责无旁贷地禄养母亲,一方面又会叙述作为官员的母亲,如何训诫儿子尽忠国家,扬名立业。嘉靖十七年(1538年)刻本《增城县志》卷7《人物志五·列女传·贤母类》以专栏记载岭南大儒湛若水母亲陈氏:“生而孝敬”,至及笄年龄,嫁与湛公瑛,在湛家,陈氏恭逊诚恳侍奉公婆,和妯娌之间也能和睦相处,众妯娌或言笑喧嚣,陈则“步履有节,出入必以扇自蔽,虽卑幼未尝见其面。每晨兴以五鼓为节,昏必二鼓乃寝,有事则三鼓乃就寝,丝麻针缕必谨……”后夫早亡,陈孀居寄寓母家教子向学,她虽“菲衣粝食”,却命其子若水求学于外,后若水领乡荐,因无人侍养寡母,“不赴礼闱十三年”,陈氏又遣子从岭南大儒陈白沙先生游学,并告诫若水说:“汝受国家教养,可以我故不仕乎?可不及我未老见汝行志乎?”训示儿子应尽忠服务国家,避免因私累公。后若水赴礼部,举乙丑进士,为翰林院庶吉士,授编修,若水受官后,迎陈母至京供养,陈氏也因子秩满推恩封孺人。陈氏可谓教子有成而荣显之明例。

传文又记载若水奉命封安南国子,便道奉陈归乡时,陈氏说:“我居京师甚适,我还朝当与之俱”。其意应是陪伴儿子在京为官,免除儿子挂念之虑。传文还描述陈氏待客甚厚、行善义举:其子若水喜与名士游,前来拜访者无虚日,陈则“率家人治具以燕乐之东”。……后陈氏以风疾卒于京邸,卒时遗命“糶□□百石为建义仓千坟所以贖”……又命子“出其家粟市田若干亩,岁入穀二百斛,立小宗义田,其法,凡小宗之亲昏嫁丧葬则给助之,有差。又置宗子田若干亩,岁入粟二十斛为祭服,具俾世守之不替。”陈氏的义举获得了乡人的敬重,她可谓集儒家提倡的美德于一身的典范。

传文以六百多字记载了贤惠母亲与孝顺儿子之间的互动。母亲勤俭节约助子求学,儿子学有所成后,又劝以报效国家为先,孝义为后。湛若水的成功可谓得益于母亲的自我牺牲和鞭策,子以母教而立功扬名。传统士大夫所期望的女性在家内扮演的角色大抵如此:牺牲自己,成就男性,因为男性才有光耀门楣的希望和机会,而女性也以教养杰出的儿子来获得肯定与尊敬。后康熙十二年《增城县志》卷9《人物后志·列女》将陈氏并列于本地节妇列女之中,陈氏传文被简略为二百多字,母子之间的互动关系被模糊,陈氏言论均被取消,编者仅只是客观地叙述了陈氏行谊,重点似乎在凸显陈氏的捐赠义举。此后的方志也基本沿袭此文。

前文提及嘉靖四十年《广东通志》卷63《列传二十·列女》记载了肇庆府四会县欧阳氏教子成立走上仕途之后,其子迎母就养,仍教子“每以严刑为戒”,而王鏊的《林节妇传》则描述了欧阳氏诫子为官:“每举‘清、慎、勤’三事为训,犹戒毋用严刑,意独恳恳,侯迄今遵之不敢违”。在其他府县也有类似于欧阳氏训子为官的母亲。康熙二十六年(1687)刻本《韶州府志》卷九《人物志二·列女》记载韶州府英德县刘氏:诸生谢造妻,善事舅姑,茂年夫逝,厉节育孤,长子因科举补官,刘氏令次子寄书信告知:“而须为好官,以承先志,否则虽禄养,吾将吐之”。刘氏言论体现了她期望儿子做一个好官。

从上述案例可见,方志编者期望的母亲形象也表现在维护社会公义这一方面。年长的儿子对母亲怀抱深厚的感激之情,孝顺母亲,而母亲又能以社会公义为先,以言语训诫儿子将这种私情转化为公义,以母亲的权力与母子之间的情感促使儿子为国家社会服务。有的母亲甚至通过帮助儿子,或者直接参与到儿子的社会活动中,将女性的影响力从家庭延伸到了社会和国家。道光十五年(1835年)刻本、同治八年(1869年)重刻本《南海县志》卷41《列传十》记载谭氏:佛山义士洗灏通妻,黄萧养寇乱,灏通父子积极捍御,当时有吴萧者,“怀金二千,自大良来,众疑为贼,将执杀之”,谭对儿子靖说:“彼若贼安携多金,可白而免之。”吴获免后,要求寄金,谭令其自理,贼平,吴掘地取出“封识宛然”,吴喜欲以半相赠,谭氏谢却不受,当时贼寇泛滥之时,有当地妇女来奔避者,谭将之“罄资给之”,存活下来的人为数不少。该传文后标注“据陈佛山志修”,但此志现不存无法查对,后光绪五年(1871年)广州粤秀书院刻本《广州府志》卷142《列女一》系复制此文。谭氏在战乱之际,凭着自己的智能,洞察时事,使吴萧免一死,并善用吴萧钱财帮助乡村妇女渡过了困难时期。女性通过向公共领域行善施德,使自己的行为超越了内外之别的界限。而惠州府的何氏在危难紧急的情况下,甚至直接参与了儿子的官职政事:

何氏,颜容穆妻,希琛母也,性慈惠明大义,初,希琛任山东粮道,何就养德州官署,忽大雨七昼夜,山水骤涨,居民争登城避水,哭声殷天,时希琛因事留省,何命速发仓穀赈饥,署内外皆坚持不可,曰:“此须详明奏准,否则擅动仓穀,处分甚严为祸甚钜,愿垂三思。”何曰:“此何时,犹拘文法乎?德州距省远,俟其详奏,数十万灾黎尽成饿殍,君等无恐,速发以救倒县,吾子功名不必计较,即查封备抵罄吾家所有尚足以偿。”于是尽出簪珥易钱,运米城上,发给其有缘树登屋不能为炊者,聊筏载磨饼施之州民,赖以全活,山东巡抚某果以擅发劾参,□□高宗曰:“有如此贤

母,好官实心实力不加保荐乃转列之弹章,何以示激劝?”立赏何三品封衔,……封至一品太夫人<sup>[7]</sup>。

何氏“性慈惠明大义”,在山洪骤涨、城民危在旦夕的紧要关头,能不拘文法,亦不顾自身得失,慷慨解囊,救民于危难之际。她的言行,让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深明大义、行事果断,置大义于私情之上的聪明有识的妇人。而从官署内外之人与何氏的互动对话中,可以看出母亲对儿子似乎具有相当大的权威。而高宗能明辨良莠,特别予以旌封,以示激劝,亦可见何氏在特殊情形之下不拘明律、救民救灾,委实难能可贵。

方志书写的母亲训子为官,不一定只存在于寡母对儿子的训示,亦有父亲在时母亲也参与训导儿子的案例。光绪五年(1871年)广州粤秀书院刻本《广州府志》卷155《列女十四》记载广州府番禺陈氏:东井先生政女,“幼端重寡言笑”,七岁丧父,受《孝经》《论语》于诸姊,17岁嫁给编修黄畿配,奉事舅姑非常严谨,舅姑“性严或有谴责受之而不怨”;后夫游学邻邑,陈氏为夫罄财以资其求学,夫友屡有需索者,至陈氏必慷慨解囊,“脱簪珥以应之”;其子由翰林贬为广西按察僉事,陈氏则训诫道:“此汝外祖之旧职也,其无以外补为歉,惟求无愧于师道足矣。”及至儿子因病弃官归养,后又复召任用,陈氏又告诫儿子:“此殊恩也,不可辞,吾当就汝养耳,乃趣之行”,鼓励儿子出仕服务国家。

这些案例均表明,儿子走上仕途之后,其在工作、政治或者军事领域里,仍可能受到母亲的影响。虽然传统女性的性别角色在礼法上是“正位于内”,但方志对母亲助子为政,甚至参与儿子政事的记载,却显示了女性的影响力通过儿子由家内延伸到了家外,跨越了性别权力的界限。

#### 四、结语

综上所述,明清广东方志所书写的母亲多为明清时期的守寡女性,这与嘉靖以后岭南士大夫的崛起是同步的,有知识的男性书写母亲事宜日渐增多,而士人专注于守寡母亲事宜,与明代以后贞节观念强化的趋势不无关系<sup>[8]</sup>。爬梳这些母亲传文,不见母亲关爱儿子衣食住行的慈育描写,几乎均为寡母辛勤操劳和训子之言行,其训

导的方式不一而足:或亲授儒学,或劝子早日成立、改过迁善,或助子为官、行善亲民,或训以忠义,等等。母亲以教导者的形象受方志编者称扬,反映了编者对母子关系的描述以及对贤母之职的期望。而从性别角色的角度分析,母亲教导的对象聚焦于男性子嗣,一方面说明了传统社会里,人们往往期望男性能有优秀的表现,承担起兴旺家庭的责任,达到母以子贵的荣显;另一方面也可看出,古代女性虽不能借由社会活动建立个人成就,但她可以通过生育教养杰出的儿子,获得社会的肯定与尊敬。

同时,我们在分析具体传文时也发现,不同地区不同时期的母亲课子的许多言行举止常常有高度的相似性;同时,不同版本的方志,对同一母亲的书写或不断的复制,或又进行不同程度的改写。但是对于这种贤母教子的书写,多受明清方志文献青睐,不仅具有模式化特征,也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我们与其将之视为当时生活中的真实案例,不如将之当作是文献编者对母亲职能的期望的传达,他们以此树立儒家正统的母亲形象,鼓励女性培养优秀的男性,为家族、国家和社会服务。

### [参考文献]

- [1] 郑雅如. 情感与制度:魏晋时代的母子关系[M]. 台北:国立台湾大学出版委员会,2002:221-256.
- [2] 熊秉真. 建构的感情——明清家庭的母子关系[M]//卢建荣. 性别、政治与集体心态——中国新文化史. 岳心怡,译. 台北:麦田出版社,2001.
- [3] 衣若兰. 旌表制度、传记体例与女性史传——论《清史稿·列女传》贤母传记之复兴[J]. 台大历史学报,2018(41):165-202.
- [4] 贺喜. 亦神亦祖:粤西南信仰构建的社会史[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38.
- [5] 高彦颐. 闺塾师: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M]. 李志生,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168-170.
- [6] 白馥兰. 技术与性别:晚期帝制中国的权力经纬[M]. 江湄,邓京力,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205-212.
- [7] 刘涪年,邓掄斌.《惠州府志》卷41《人物十三》[Z]. 刻本. 光绪七年(1881):774.
- [8] 费丝言. 由规范到典范——从明代贞节烈女的辨识与流变看贞节观念的严格化[M]. 台北:台湾大学出版社,1996:172.

## The Mother-Taught Mode in Local Chronicles of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DU Yun-nan

(Zhaoqing University, Zhaoqing 526061, China)

**Abstract:**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under the popularization and infiltration of Confucianism, local Chronicles gradually standardized and institutionalized. Biographies of Exemplary Women made up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local chronicles. Such biographies presented many mothers earnestly teaching demeanors, reflecting the editors' expectation of saintly mothers to guide sons, thrive family and maintain the Confucian orthodox. Despite such writings written in different periods and different regions, about different classes of mother-taught words and deeds, they demonstrate several patterned phenomena, revealing the editors purpose to set up models of mother-taught words and deeds, and to promote the orthodox Confucian concept of ideal mothering.

**Key words:**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local chronicles; mother-taught

(责任编辑 鲁玉玲)

· 女性文化研究 ·

# 女博士身份在媒体报道中的话语建构

——以女博士被骗85万的相关报道为例

朱 蕾, 邢志杰

(天津商业大学, 天津 300134)

**摘要:**一直以来女博士的身份都备受关注。在社会的认知中,她们虽然学历高却往往被贴上一些带有偏见的标签,比如“第三类人”“灭绝师太”等。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已逐渐改变把女博士看成是第三种性别的认识,但性别偏见依然存在。以广州医科大学女博士饶源被骗这一案件为例,运用 Martin 的评价理论和 Fairclough 话语分析框架,通过分析相关新闻报道的标题、正文及网友评论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媒体话语不仅单方面反映了公众对女博士的刻板印象,也会对女博士形象起到积极或消极的建构作用,这就是话语和社会现实之间互为因果的辩证关系。

**关键词:**女博士;身份建构;媒体话语;批评性话语分析

**中图分类号:**G1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838(2019)01-0066-09

## 一、引言

人们在生活中常存在各种偏见,主观上对一个人或群体产生不正确、不完整的认识。美国传播学者沃尔特·李普曼在他的著作《舆论学》一书中,提出了“刻板印象”这一关键概念。“刻板印象”是指按照性别、种族、年龄或职业等进行社会分类形成的关于某类人的固定印象,是关于特定群体的特征、属性和行为的一组观念或者说是与一个社会群体及其成员相联系的特征或属性的认知表征<sup>[1]</sup>。近年来,女博士一直备受社会关注。一提到这一群体,人们在脑海里就会浮现出“女强人”“学术造诣高”“独立自主”等积极的评价词语。作为高学历的女性群体,她们努力追求知识并不断提高自身素质,力图获得与男性同

等的社会地位。但是也会有人用“第三性”“灭绝师太”“高分低能”等带有消极意义的词汇来评价这一群体。

这些刻板印象的形成离不开媒体报道的渲染。关于女博士的媒体报道按内容可以归为正面、负面以及中性报道三个方面。其中正面报道主要呈现女博士的积极形象,例如:在学术能力方面,女博士专注于科研事业并且有对学术、社会现象的独到的看法和理解;在个性、生活方面表现为多才多艺、爱好广泛。这些报道建构的是与人们传统印象中女博士应有的睿智、独立、自信等特征相一致的形象。但这些报道往往篇幅短小,只对事件中的时间、人物、地点、事件作简要的概述。负面报道呈现的则是女博士消极的

收稿日期:2018-10-18

作者简介:朱蕾,女,天津商业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语言学、话语分析、翻译研究;邢志杰,女,天津商业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批评话语分析。

方面,例如:婚姻失败、无知被骗、犯罪、性格孤僻、学术抄袭等。随着她们私生活领域的不断被放大,久而久之,女博士就在媒体及社会的“过度阐释”下被贴上了“高智商低情商”“灭绝师太”“第三性”等标签,并且被赋予较低的社会评价。这种“污名化”的现象给女博士的形象建构带来了许多负面影响。中性报道则不掺杂任何感情色彩,就事论事。这些不同类型的报道塑造了女博士完全不同的形象。可见媒体话语对于女博士的身份建构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费尔克劳认为,话语是一种社会实践和行为方式,话语与社会结构的关系是辩证的。一方面,话语在不同的层面受社会结构的制约;另一方面,话语对社会结构具有构建作用<sup>[2]</sup>。因此话语具有构建社会身份、社会关系以及知识和意义体系的作用。媒体话语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并且影响着新闻报道或评论中的意义生产和理解,社会建构性是媒体话语的重要特征<sup>[3]</sup>。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一方面,博士处在学历教育的顶端,备受尊敬,再加上性别因素的影响,人们对女博士往往另眼相看;另一方面,在当时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中,正面新闻居于绝对的“统治地位”,所以女博士的强势形象也便逐渐形成。进入21世纪以来,网络媒体迅速发展,媒体之间存在着激烈竞争。女博士这一群体在商业化利益的驱使下被迫沦为媒体经济增长的“重要贡献者”之一。一些媒体通过不断爆料女博士的相关负面新闻吸引公众的眼球,不断颠覆女博士之前的“强势群体”形象,逐渐将这一群体报道为弱势群体<sup>[4]</sup>。媒体话语在某种程度上会强化人们对女博士的刻板印象,同时这些媒体话语经过广泛传播,也会对女博士的形象建构产生巨大影响。

## 二、文献综述

通过在中国知网以“女博士”为关键词进行搜索,笔者发现,关于女博士的研究涉及婚恋、就业、媒介形象等,并大多都是从社会学、传播学、心理学等学科角度进行分析。

在社会学领域中,张国平从社会学的角度研究了女博士婚恋问题产生的原因。他认为,一方面是因为婚配双方不易同时具备各自期望的资源;另一方面是女博士的资源优势会威胁到男性的社会支配地位而造成了女博士婚恋难的现状<sup>[5]</sup>。张光试图讨论的是社会性别意识下的女博士的发展遭遇社会排斥的问题及其原因,通过从社会学的视角来对这一现象进行解读,将自然性别与社会性别进行区分,从社会性别的产生机制来探讨“第三性”的形成,以期唤醒大众意识,从而为知识女性的解放和发展提供支持<sup>[6]</sup>。罗毅、任路江通过分析人口结构和242位在校女博士生的婚恋价值观调查数据发现,当前我国各年龄组的女性基本处于短缺状态,随之而来的结构性婚姻挤压主要集中于男性群体,而女博士群体面临的个别“婚恋难”问题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为文化性婚姻挤压<sup>[7]</sup>。

传播学领域对于女博士媒介形象的分析较多。刘志婷分析了新媒体环境下女博士的媒介形象,并以新浪、豆瓣等媒介平台为例,研究女博士群体凭借新媒体重构自身媒介形象的动态过程<sup>[8]</sup>。屈哲分析了传播媒介在女博士婚恋、职业能力、职业选择方面是如何塑造女博士刻板印象的,最后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措施,认为应有舆论导向功能的新闻媒体给予女博士更加客观、公正的形象构建<sup>[9]</sup>。杨英运用内容分析法,对近三年新闻报道中的女博士形象进行系统解读发现,大众媒介有半数新闻对女博士是正面报道,关注的主要是女博士的婚恋和职业,负面媒介形象则主要有择偶难、婚恋难、受骗、自杀与犯罪;她还进一步从文凭危机、择偶观、社会角色冲突、媒介与大众的认知偏见四个方面揭示出女博士被标签化的社会原因<sup>[10]</sup>。李璐瑶从网络媒体对女博士媒介形象构建的特点出发,分析了网络媒体对女博士媒介形象扭曲的原因和影响,探究了现阶段重构女博士网络媒介形象的重要性和相关策略<sup>[11]</sup>。

在心理学研究领域中,王小栋运用访谈法、

实物收集法和观察法,搜集女博士的资料。通过归纳、整理、分析信息发现,女博士生 S 的学术压力来源于科研、论文、毕业、出国、经济、个人六个方面<sup>[12]</sup>。丁岚认为,社会对于女博士婚恋难方面的认识存在“污名化”现象,她主要从心理学角度对这种污名所引起的心理效应及其对女博士婚恋难的影响进行分析<sup>[13]</sup>。杨娟采用 SCL-90 量表、精神支持问卷的方法探讨不同精神支持来源、内容对女博士群体心理健康水平的影响<sup>[14]</sup>。花昭红、李小伟指出,许多女博士研究生普遍有着较为强烈的焦虑情绪、较大的心理压力,甚至伴随有失眠、头痛等生理表现。基于上述现象,他们分析了女博士产生心理问题的原因,并提出了相关建议<sup>[15]</sup>。

### 三、理论基础

通过总结以上学者对女博士在不同领域的研究,笔者发现从话语角度研究女博士身份建构的并不多,所以本文将从批评话语分析的角度研究女博士身份的形象建构。话语分析是手段,其目的是揭示话语背后隐含着的意识形态和权力关系<sup>[16]</sup>。因此本文将采用 Fairclough 的话语分析框架以及 Martin 的评价理论剖析话语与社会现实之间的辩证关系。话语被认为是社会实践的一种形式<sup>[17]</sup>,它虽然不易被察觉,但却具有强大的力量。Fairclough 提出话语通过一系列的陈述和言说,系统地建构它所言说的对象,塑造我们对相关事物(包括人)以及自我的认知,影响甚至决定我们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因此,笔者运用 Fairclough 的话语分析框架对有关女博士被骗的新闻报道进行语言分析,这不仅能充实女博士研究角度的多样性;还可以通过对话语的文本分析呈现出女博士与社会结构间的关系,引起人们对这一群体的关注。笔者期望本研究能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人们对女博士的刻板印象。Fairclough 的三维分析框架从辩证、建构的语言观出发,吸收了 Foucault 关于“话语的权力本质”的思想,并进一步发展,对话语有自己独特的理解,他认为话语或任何一个话语实践都是一个由文本、

话语实践和社会实践组成的三维统一体。在这个三维统一体中,文本是话语实践的产物,话语实践的过程即为文本的生产、传播和接受过程,而前两者都是由特定的社会实践决定的。因此,任何话语分析都应该包括三个向度:文本分析、话语实践分析和社会实践分析。其中,文本分析主要是对词汇、语法结构、人际成分、文本结构等因素的分析。话语实践作为连接文本分析与社会现实分析的桥梁主要对文本的生产、分配和消费进行研究。社会实践分析主要探讨的是话语背后隐藏着的权力及意识形态。

此外,基于韩礼德系统功能语法的人际功能理论,Martin 与其他学者又共同提出了评价理论。该理论对评价性词汇进行了丰富的研究,并且弥补了原有模式的不足。Thompson 称评价是所有语篇意义的核心问题,是说话者对事物(如人、事件、行为、观点等)的看法,通常有好坏之分,也有强弱之别<sup>[18]</sup>。Martin 将评价理论分为态度系统、介入系统以及级差系统。其中以态度系统为研究核心,以介入系统和级差系统为辅,对语篇进行话语分析。评价语言不仅能传递信息,并且也是建构身份的一种策略。笔者通过分析新闻报道中的评价语言,进一步揭示出媒体是如何建构女博士身份的。

### 四、语料及其来源

2018 年 1 月 6 日,广州医科大学的女博士饶源在 1 月初遭遇电信诈骗,骗子假冒“公检法”的工作人员称她在北京开的一张银行卡涉嫌洗钱,这些假冒的“公检法人员”要求饶源筹集 128 万元,打入所谓的“国家账户”。饶源信以为真,连续 5 天向诈骗方账号汇款 85 万元。她说,自己 10 年来都泡在实验室,生活圈子有限,对新闻八卦没有兴趣,所以微信朋友圈功能是关闭的。当记者问饶源是否了解 2016 年发生的“徐玉玉案”时,她摇了摇头。这一事件引发了社会媒体及大众的广泛关注。

诈骗事件屡见不鲜,为什么这一案件却备受关注呢?笔者认为主要是由于受害人“女博士”

的身份所致。其实现实生活中不仅只有女博士被骗,其他的人也会被骗。许多媒体将女博士被骗的个别事件泛化,也会导致这一群体的真实形象与媒体建构的形象相去甚远。另外,网友们对于这一案件的评论也各不相同,有些人认为饶源只知道死读书,学傻了,社会阅历少;有些网友表示可以理解饶源,并且认为她专注于科研的精神值得赞扬。这也引了起笔者对于这一话题的研究兴趣。

笔者在新浪网搜索栏中输入关键词“女博士被骗85万”,共出现22篇相关报道。对于同一案件的新闻报道难免会有重复的地方,因此,笔者根据媒体对于事件评价态度的不同以及内容的重复程度从中共筛选出9篇适用的地方媒体报道进行分析。其中4篇新闻报道的标题直接表明了作者对于该事件的看法及态度,两篇报道中涉及网友评论,另外几篇则在正文中渗透了作者的态度。本文首先从评价理论入手对新闻进行分析,然后应用话语分析框架理论解释新闻话语同女博士身份建构间的辩证关系。

## 五、研究结果

### (一) 文本分析

关于广州女博士被骗这一事件,媒体和网民都持有不同的观点和看法。有些媒体对受害者表示同情和关怀;有些媒体通过表述骗子低级的骗术来反衬女博士的无知;有些媒体则从比较客观的角度来描述此事件。同样,微博上网民们对此次事件的评价也褒贬不一。基于此,笔者运用评价理论分别从新闻标题、新闻内容以及网友评论这三方面来剖析这些媒体及网民反映并建构了什么样的女博士形象。

1. 标题。态度系统是指心理受到影响后对人类行为、文本/过程及现象作出的判断和鉴赏<sup>[19]</sup>。它强调的是如何在文本中映射情感。态度系统又分为三个子系统:情感、判断和鉴赏。态度也可以按程度分级,它根据选用词汇、语法的低值、中值和高值来建构身份形象。新闻报道以及网络评论反映了媒体和网民的评价立场。

新闻标题往往能够最先反映作者对于某一事件的态度。

(1)《石家庄日报》标题为《女博士被诈骗不只是太单纯》;(2)《广州日报》标题为《博士被骗85万元因为她活得太傻吗?》;(3)《中国青年报》标题为《学霸被骗85万后遭嘲讽:高分低能!网友评论亮了》;(4)“人民网”标题为《女博士被骗85万 勿嘲讽也别护短》。

首先,新闻标题往往会采用一些吸引眼球的字词引起读者的注意。新闻标题(1)中,作者在“博士”前加了一个“女”字为的就是引起读者的注意。媒体刻意强调当事人的性别,其中也渗透了作者的性别立场。此外,这个题目采用了被动句的形式将主语“骗子”省略。这样做的目的无非就是引起更多的读者关注,以吸引眼球。另一方面“被骗”一词将女博士置于被动的地位,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强调了女博士较弱的识别能力。其中“单纯”一词看似是积极的肯定,其实是在讽刺女博士生活阅历少。另外,为了加强身份建构的典型性和确切性,作者往往运用一些修饰语。这个新闻标题采用“不只是”修饰语加强否定评价的程度。新闻标题(2)采用疑问的语气提出观点,作者并没有给出明确的评价,这似乎是在引起读者的注意和讨论。其题目中虽用“傻”字评价女博士,但由于疑问语气而不具备直接否定的意义。标题(3)中作者没有使用“女博士”的称谓,而是“学霸”。“学霸”一词是近几年流行的网络词汇,意思是指那些擅长学习、分数很高的学生,是赞美、肯定的评价。“学霸”这一词的使用完全与标题后半部分“被骗85万元”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也在某种程度上塑造了话题对象“高分低能”的形象。因此“学霸”这一名词在此标题中作为隐形的态度塑造了女博士的负面形象。评价理论指出,判断者根据一定的社会规范,对人们的行为、性格进行肯定或否定的评价。它主要由社会评判和社会约束两个子系统构成<sup>[18]</sup>。新闻标题(4)则采取了中立的态度。对于女博士被骗的事件,作者呼吁社会群体应从客观、全面

的角度分析、评价该事件,既不能盲目地认为女博士过于愚笨、无知,也不能过度夸大女博士的科研精神。通过对以上几个新闻标题的分析笔者发现,不同类型媒体对女博士身份的建构采用了不同的话语策略,但大部分标题的表述似乎都在对女博士被骗这一事件表示震惊。

2. 新闻正文。对于女博士被骗这一事件,有些媒体过于强调骗子低级的骗术,并用其突出女博士的无知与愚昧。笔者将相关新闻中对于骗子骗术的描述进行了整理分析。

(1) 饶源遭遇的骗局,实在是“熟悉的配方,熟悉的味道”(《工人日报》)。

(2) 假冒公检人员的诈骗,早为众人所知,然而如此拙劣的伎俩,居然还能得逞,上当受骗的还是位女博士。显然,又是一个典型的个案,所承载的反思只怕比对骗子的痛恨更有现实意义(《法制日报》)。

(3) 通过报道可知,该博士遭遇的不过是已经老掉牙的骗局,即骗子冒充民警声称受害人的银行账户涉嫌洗钱,要求其将钱转入所谓的“国家账户”(“澎湃新闻”网)。

(4) 在QQ 通话记录上,记者看到,饶源还不断感谢这些骗子,称“感谢公检法工作人员,为人民的清白晚上加班加点”(《广州日报》)。

(5) 她收到的“刑事拘留令”到底是什么鬼?看到其中的问题了吗?简直漏洞百出!发文单位与盖章单位名称不一致,落款盖章为“北京市最高人民检察院”,这是一个根本就不存在的机构!真正由司法机关发出的文书上,也不会出现所谓的“调查局科长”,发文日期更是让人哭笑不得!搜索一下“刑事拘留令”才发现受骗的人真不少。检察机关没有“刑事拘留令”,也不存在这样的法律文书。玩的都是老套路了,怎么

还总有人上当呢?!(《深圳商报》)

以上的描述无非是在强调骗子的骗术是有多么低级,女博士是有多么“愚昧和无知”。例(1)中,作者将骗局评价为“熟悉的配方,熟悉的味道”。这句话出自于加多宝的广告语,如今已被人们套用到各个不同的场合和场景,并且带有调侃的意思。一方面,作者将这种骗局借用广告语来描述可以使读者更容易理解和接受骗局的低级程度,另一方面也从侧面建构了女博士连这种骗人的常识都不知道的负面形象。同样,例(2)、例(3)、例(4)中也采用了带有消极负面意义的形容词修饰骗术,如:“拙劣的”“老掉牙的”“典型的”。另外文中还运用级差系统中的修饰词对骗术进行评价。如“居然”“还”“显然”“又”“不断”等副词表明面对如此低级的骗术,女博士竟然上当受骗。例(5)中作者运用了疑问句与许多感叹句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态度。疑问句的使用为的是引起读者的注意,并希望能与读者产生互动,引起读者的共鸣。文中感叹句的使用则表达了作者无奈、惊讶的情感。其中具有显性态度的词语“漏洞百出”“哭笑不得”“老套路”表明了骗术很容易被察觉和发现,再次从侧面反映了女博士没有生活经验和低智商的负面形象。总之,通过对骗子骗术的描述,作者完全将焦点集中于女博士的身上而忽视了骗子的罪行以及监管部门的责任。当然有些新闻报道也将原因归结于教育的缺陷或是监管部门的失职。但大多数文章将问题中心都集中在女博士个人身上,并且作者也想从读者那里获得认同感,从而建构女博士的负面形象。

3. 网友评论。新闻已不再是传达信息、表达媒体态度及意识形态的唯一途径。随着自媒体的发展,人们逐渐利用各种渠道在网络上发表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很多人甚至认为评论比新闻本身更好看,可见其地位。网友们对于此事件分别持有不同的评价。一方持否定评价,认为该事件中的女博士是“死读书”“高分低能”的人。

(1) 网友 1:我能说这是所谓的高分

低能么?

(2)网友2:就像大学生放假回家生活不能自理,衣服裤子带回家让爸妈洗一样。

(3)网友3:估计是都学傻了。

(4)网友4:这种事情,第一时间找当地的派出所来解决,而不是傻傻地把钱打过去的。

(5)网友5:人还是多和社会交流好。

(6)网友6:“读书越多反而笨”说的就是这种人。

(7)网友7:单纯,甚至有点蠢,人活着,不可能隔离社会的,你不理八卦,八卦便会“理”你!另:骗子该死!我也是整天闷在实验室工作,也曾经接到这种电话,当时心确实很慌,但还是多留了一个心眼,去百度了一下,瞬间清醒,一模一样的骗术,都不带改的。

以上这些网友的评论都在嘲笑女博士的智商,这也反映了人们对于女博士的身份一直以来都存在着刻板印象。试想如果一个男博士同样被骗会引起这么多媒体的关注和网友的嘲讽吗?女性无论在什么时候都会作为人们评论的焦点而活跃于媒体新闻中。网友(2)将女博士比喻成生活不能自理的大学生,贬低、嘲讽女博士只知道作科研却没有基本的生活常识。这些网友使用过于夸张的词汇完全否定女博士而忽视了骗子骗钱的罪恶行为。因此,这些词的使用塑造了一个与博士高学历完全相反的身份形象。

但是,也有不少网友对女博士关闭微信朋友圈的做法表示感动和欣慰。他们很敬佩女博士的敬业和专注。这些评论也像是一种新兴的力量在与谴责女博士的评论相抗衡,并且这种评论也在试图改变人们对女博士的刻板印象。

(8)网友8:说明什么?这社会,好人、老实人吃亏,逼得人人必须了解社会而变得头脑复杂、警惕性高、时刻

怀疑!

(9)网友9:我反而是觉得有点感动:为了科研把整个人搭进去了,从另一个角度说还不是为了国家在忘我工作牺牲自己吗?

(10)网友10:没必要嘲笑或者质疑人家吧,人家只是不想关心自己觉得不重要的,有这样能一心在实验室里钻研的学者真的是难得。我倒是觉得她应该很单纯。

(11)网友11:说博士、博士后死读书、书呆子的你不想想,如果社会没有这种术业专攻的人科技进步会快吗?人家付出了时间,科研成果是要回馈社会的,你们在这里放嘴炮对社会有任何帮助吗?

(12)网友12:我想说,我们应该向这样的科研人员脱帽致敬。正是因为他们的付出甚至牺牲,国家和社会才得以踏实地进步。

上述这些网友的评论从女博士作科研的角度出发肯定她的价值与做法,与嘲讽女博士的一些网友们进行争论。这些网友采用一些积极的词汇将女博士评价为“老实人”“好人”,为了科研工作敢于“牺牲自己”,“忘我”地投入到工作中,在推动国家和社会的进步。他们通过使用显性评价的赞美语言建构了女博士积极的身份形象,并与持相反观点嘲讽女博士的语言形成对抗。他们试图通过话语改变人们一直以来对女博士的刻板印象。

## (二) 话语实践分析

Fairclough 对语篇实践的分析主要包括结构分析和互动分析两方面。本文主要采用结构分析来研究女博士身份的话语建构。结构分析主要是通过话语秩序和语体链来分析社会主题中的不对等关系。话语秩序是指一整套有序的话语生成实践,以及它们之间的界限和关系。它是话语层面表现的社会秩序,是社会文化实践在话

语上的历史印记<sup>[20]</sup>。

女博士身份话语的产生,使得媒体、公众以及女博士群体自身凭借着不同的语体参与到建构女博士形象的社会实践当中去。媒体的新闻报道采用正式的语体,社会影响力较大。公众话语如网络评论是相对随意的语体,影响力相对较小。在这一实践过程中媒体作为新闻话语的实际操纵者要比公众及女博士群体拥有更大的话语权,有的媒体对于同一个事件会有重复报道以及后续的跟进报道。这说明媒体对新闻事件的报道通过不断重复以及后续跟进而强化其观点,读者也不断被灌输媒体所想要表达的思想。所以女博士这一群体在人们心中的形象被一遍又一遍“记忆”与“复习”,最终得以被“确立”。在此次事件中有些媒体一直在向读者灌输女博士“高分低能”以及社会阅历少的形象。这种形象通过重复报道在读者心中不断加强。女博士作为受害者在整个事件中几乎很少有为自己解释的话语权。这也就体现出女博士身份建构话语中的不同社会参与者之间的不平等关系。

在众多的媒体报道中,其主要内容都直接来自媒体的观点及评论,很少有媒体去采访及谈到女博士当时的内心感受。其中《广州日报》在持续跟进的报道中谈到女博士被骗后的心情:

“我是做点科研成果的,牺牲和我老公团聚的时间,整天泡在实验室,平常的活动就在租的房子和单位方圆两公里的地方。”饶源,自己拿过两个国家奖学金,平常生活节省,3年存了十几万元,如今所有钱都被骗走了。“我哥知道后,当天责骂我,说我读到博士,怎么那么蠢。我内心都已经崩溃了。”饶源说,自己和丈夫都是农村的孩子,都是靠刻苦读书,才走到今天的。饶源说,自己一心都扑到工作上,微信号也只关注“百度学术”,因为觉得看朋友圈浪费时间,就关闭了这项功能。“我承认自己是书呆子,太天真,特别天真,工作做

得好,社会经验太少,犯那么低级的错误。”

女博士作为受害者的无奈与无助几乎在媒体的新闻报道中看不到。而以上这些通过使用直接引语与间接引语相结合的采访内容,也客观反映了女博士被骗后真实的内心想法,有自责也有后悔。关于女博士不看朋友圈这一说法,许多媒体只是在文中提到女博士不看朋友圈而没有解释她因为怕浪费做学术的时间才不去看朋友圈。对于她在学术中获得的成就有些媒体也是只字未提。这反而会促使读者加深对女博士消极的刻板印象。其实,被骗事件不仅仅发生于女博士的身上,其他的人同样也会遇到。这是社会普遍存在的问题,只不过因为其女博士的性别身份而被媒体不断夸大和渲染。

此外,媒体的新闻报道会影响人们对某些事件的价值判断。从女博士被骗事件的网友评论中可以看出批评、嘲讽女博士愚蠢的要多于肯定、赞扬女博士在科研上的付出的。有些网友甚至认为这种个别案例在女博士这一群体中会经常发生。这种以偏概全的观念深受媒体报道的影响。总之,网友的评论以及女博士的话语在媒体话语中处于较弱的位置。

另一个重要的概念语体链指的是不同的语体在发布时间顺序上形成一个链条<sup>[21]</sup>。在本文涉及的新闻报道以及网友评论中,先有媒体将该事件报道出来,例如《广州日报》最先将报道发出来,随后各媒体相继发表自己的观点和看法,然后才有了网友们对这些新闻报道进行的评价。这样新闻语体与口语语体相互关联、相互作用就形成了语体链。综上,媒体与公众分别以不同的语体共同参与到女博士身份建构的话语实践中。

### (三) 社会实践分析

社会实践分析位于三维分析框架中的最外层,主要是对文本制造者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历史文化进行研究。不难看出,媒体对女博士身份的建构在总体上呈现的是其消极的、负面的形象。当然,这种局面的形成与中国的传统历史文化有

着紧密的联系。在古代,“女博士”一词是指有才学的女子,是对女子的尊称。在现代,“女博士”一词代表着一个人的学历,其背后承载的是学历与知识。“女”字最初仅仅是对性别的界定,但后来逐渐带上了一种依附价值。媒体将这些具体鲜活的人物抽象为空洞的符号,不断把个人的缺点放大,同时污名化这一群体。所以现在人们对女博士的印象基本如下:她们一开口就在谈论相关的学术问题,社会阅历少,性格古怪,年龄大等等。

另外,在传统父权社会体制长期的控制下,“女子无才便是德”“男主外、女主内”“三从四德”等思想限制了女性自身的发展。直到现在这种传统的思想也在或多或少地影响着社会对女性的看法。如果一旦有女性为争取自己的利益而挑战到男性的主导地位,媒体就会用一些过于夸张的词语或负面的报道来压制她们。因此,女博士在媒体报道中的形象是以男权思想和价值观建构的产物,男权社会对女性高学历产生本能的排斥是女博士形象被扭曲及污名化的重要原因。另外,传统的男尊女卑观念具有很强的稳定性和强大的同化力,在现代社会中仍表现出很强的反作用力和惯性。这种惯性一直在制约着女性的主体行为,同时也制约着社会对女性的评价和角色期待。因此,女博士被骗这一事件的报道是部分媒体想要向受众传达高学历所带来的这种反差的效果,强化了女博士在人们心中的负面形象。

## 六、结论

本文从批评话语分析的角度,运用 Martin 的评价理论以及 Fairclough 的结构分析研究方法对女博士被骗这一事件在媒体报道中的形象进行分析研究。研究发现,以男性为主导地位的历史文化直到现在还在影响着这个社会。在很多男权者眼中,女博士这一群体的出现会威胁男性在社会中的主导地位。因为对于某些问题女博士都会有独立的看法和主张,她们大多独立自主不会依赖男性生活,并且在各方面力求获得与男性同等的地位和权利。这就会使部分男性群体备感压力,排斥女博士这一群体,因此就会通过对她们污名的方式来维持自己在社会中的主导地位。所以在社会上一提到女博士这个词,人们往往将其与一些负面的词汇联系到一起。这也加剧了公众对女博士的负面的刻板印象。网友对于女博士的积极评价远不如媒体话语的影响力大,他们虽然力图改变公众对于女博士的刻板印象,但是力量弱小,这也体现了话语中权力的不平等。

尽管有些媒体话语力求用客观的语言表述事件,但也难免会受社会文化环境的影响,而公众在不知不觉中也会因为媒体一些负面报道强化了对女博士的刻板印象。要想改变对女博士的刻板印象,媒体应丰富报道的相关内容,加强对女博士积极形象的宣传报道并逐渐减少对其的消极印象,从而使公众能够更加全面地了解这一群体。

## [参考文献]

- [1] 杨赛. 试论媒介环境对于女性形象强加的刻板印象——以女博士的“第三性别”化为例[J]. 新闻研究导刊, 2014(15): 70-71.
- [2] FAIRCLOUGH, N. Discourse and social change[M].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2: 3.
- [3] 杨娜. 新闻话语研究的概念、视角和议题[J]. 现代外语, 2016(5): 714-723.
- [4] 韩宁. 强势群体“被弱势化”进行时——女博士群体网络形象建构[J]. 东南传播, 2010(9): 59-61.
- [5] 张国平. 我国女博士婚恋问题的社会学分析[J]. 现代交际, 2010(10): 5-6.
- [6] 张光. 女博士“第三性”现象的社会学解读[J]. 劳动保障世界理论版, 2013(5): 103-104.
- [7] 罗毅, 任路江. 女博士婚恋危机的社会建构与解构——基于新社会性别视角的个案研究[J]. 青年探索, 2011(6): 68-74.

- [ 8 ] 刘志婷. 新媒体时代下女博士媒介形象的重构[J]. 新闻研究导刊, 2016(11):48-49.
- [ 9 ] 屈哲. 女博士网络媒介形象构建的研究——基于对人民网女博士报道的内容分析[J]. 新闻研究导刊, 2015(12):284.
- [ 10 ] 杨英. 女博士的社会媒介印象研究[J]. 中国青年研究, 2011(5):65-70.
- [ 11 ] 李璐瑶. 女博士的网络媒介形象分析[J]. 新闻世界, 2011(8):228-229.
- [ 12 ] 王小栋. 象牙塔中的高压线——K 研究所女博士研究生 S 学术压力个案研究[J]. 高等教育评论, 2016(1):214-228.
- [ 13 ] 丁岚. 女博士婚恋“难”的心理分析研究[D]. 南京: 南京师范大学, 2012:1-48.
- [ 14 ] 杨娟. 浅论不同精神支持对女博士研究生群体精神健康的影响[J]. 教育教学论坛, 2015(46):82-84.
- [ 15 ] 花昭红, 李晓伟. 高校贫困生工作存在的问题与对策[J]. 工会论坛(山东省工会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07(4):98-99.
- [ 16 ] 田海龙. 批评话语分析: 阐释、思考、应用[M]. 天津: 南开大学出版社, 2014.
- [ 17 ] FAIRCLOUGH, N. Language and power[M]. London and New York: Longman, 1989:23.
- [ 18 ] THOMPSON, G. Introducing functional grammar: 2nd edition [M]. London: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8:75-77.
- [ 19 ] MARTIN, J. R. Beyond exchange: appraisal systems in english in houston[M]//S & THOMPSON, G. Evaluation in text: authorial stanc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discours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5.
- [ 20 ] FAIRCLOUGH, N.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M]. London: Longman, 1995:10.
- [ 21 ] FAIRCLOUGH, N. Analyzing discourse: textual analysis for social research[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3:31.

## The Discursive Construction of Females with PhD in Media Reports: On the News Report about a Women with PhD Being Defrauded 850,000

ZHU Lei, XING Zhi-jie

(Tianjin University of Commerce, Tianjin 300134, China)

**Abstract:** The identity of females with PhD has got a lot of attention. In the cognition of society, although they have high academic qualifications, they are often labeled with certain prejudice, such as “the third type of person” and “nun the killer”.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society, people gradually change their attitudes towards females with PhD as the third gender, but it is undeniable that there is still some prejudice among the society. This thesis takes the case of Rao Yuan from Guangzhou Medical University who was defrauded as an example, using Martin’s appraisal theory and Fairclough’s discourse analyzing framework to explore the title and content of news reports and netizen comments, and finally drew some conclusions. Media discourse can not only reflect the public’s stereotype of those learned females, but more importantly, it can also shape a positive or negative rol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ir images by means of the widely disseminated media discourse. This is exactly the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discourse and social reality.

**Key words:** females with PhD; identity construction; media reports;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责任编辑 赵莉萍)

## 《论语·子罕》“吾未见”章 注疏中的性别歧视及其辨正

温航亮

(湖南科技大学, 湖南 湘潭 411201)

**摘要:**由于对“好色”的价值评判不同,历代注疏对《论语·子罕》“吾未见”章的疏解可分为取贬义、取褒义两种主张,但二者都将“色”直接误解为“女色”,因而表现出经典诠释中的性别歧视,这在朱熹以后的儒者中表现得更为突出。只要回到“色”字的本义及第一层引申义就可发现,“吾未见”章其实是孔子在言辞上采取的通俗化策略,就是要借助普通人对脱离“德”的纯粹外在的“色”的喜好来讲明“好德”的义涵和特征。

**关键词:**《论语》;好德;好色;性别歧视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838(2019)01-0075-06

作为我国传统时代的儒家经典,《论语》虽非“六经”之一,却因为其详载了孔子之言行而成为探究“圣人之道”的关键,汉儒赵岐称之为“《五经》之鎡鑿,《六艺》之喉衿也”<sup>[1]</sup>,因此历代有关《论语》的注释、考证、训解类著作层出不穷。这些著作作为男权话语的代表,在注解《论语》时势必予之以男权的解说,因而体现出对于女性的性别歧视。《论语·子罕》“吾未见”章在这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历代注疏出于对女性的歧视而在字义、章旨方面存在着错误的解释。

### 一、历代注疏对“吾未见”章诠释的前后变化

《论语·子罕》“吾未见”章云:“子曰:‘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相对而言,本章经文是比较简单的,就是孔子说的一句话,而且其字义似乎十分明确,因而其义理似乎也很简单,任何人阅读至此都能对之有一定的认识。但本章在《论语》诠释史上却并不那么简单,由于对“好色”二

字的理解不同,本章的诠释也相应地可分为两种主张:

其一,对“好色”取贬义,这基本上是“四书”兴起之前的通解。魏何晏《论语集解》云:“疾时人薄于德而厚于色,故以发此言也。”北宋初邢昺《论语注疏》同<sup>[2]</sup>。东晋李充曰:“使好德如好色,则弃邪而反正矣。”<sup>[3]</sup>南朝梁皇侃《论语义疏》云:“时人多好色而无好德,孔子患之,故云未见以厉之也。□□云:责其心也。”<sup>[4]</sup>诸家或以为“疾时人”,或以为“厉之”,或以为“弃邪而反正”,语言虽然不同,但将“好德”与“好色”对立却是其共同特征,也都要求弃去“好色”而归于“好德”。

其二,将之与《大学》“如好好色”相联系,对“好色”取褒义,这是宋代道学诸家的通解。《论语精义》所列范祖禹、谢良佐、杨时、尹焞诸家,或以“如好好色”为“诚”,或以“好德”“恶不善”与《大学》好好色、恶恶臭相对应,或以为“以好色为

好德之心,则可以入于圣人矣”,都是以《大学》“如恶恶臭,如好好色”一段为理论基础来进行诠释<sup>[5]</sup>。朱熹《论语集注》引证谢良佐之说,这说明朱熹也取此说。

相比较而言,前说较注重经文中的“未见”二字,强调“好德如好色”在现实中的困境,因而偏重于阐述孔子对现实的批判意识;后说由于强调《大学》在儒学中的指导意义,更偏重对“好德”与“好色”之关系的形而上思辨,因而诠释的重心在“如”字。两说都以本章为依据,都能从经文中获得理论根据,因而不能简单地对之进行谁对谁错、孰优孰劣的判断。

引人深思的是朱熹在《论语集注》中的措辞。朱熹“对《语》《孟》‘自三十岁便下工夫’,六十七八岁还‘改犹未了’,前后经过‘四十余年理会’”(《四书章句集注·点校说明》)<sup>[6]1</sup>,因此一般认为《四书章句集注》为其定论。但《论语集注》于本章既引谢良佐之说,又兼载《史记·孔子世家》“(卫)灵公与夫人同车”之事<sup>[6]114</sup>,前后有隐藏的矛盾<sup>①</sup>,因而有学生以为卫灵公事“与此意不相应”而发问,朱熹对此的解释是:“《大学》之说,自是《大学》之意;《论语》之说,自是《论语》之意。《论语》只是说过去,尾重而首轻,这一头低,那一头昂。《大学》只将两句平头说去,说得尤力。如何要合两处意来做一说得。”<sup>[7]</sup>可见,朱熹的主张是,不应该将本章与《大学》“如好好色”牵合在一起理解,因为二者的思想有很大的差异。

考察朱熹的思想理路,其《论语集注》中体现的这一矛盾,应该是受了胡氏的影响。“胡氏曰:好德而好色,是好德而未能深也。不好色而不好德焉,则其不好色亦何所就也。是故色者,人之所好,好而难疏;德亦人所同好,好而难亲。知其病而痛药之,不使稂莠得害嘉谷,则志气清明而独立乎万物之表矣。”<sup>[8]</sup>从言语来看,胡氏实际上取“好色”为贬义,并将之与“好德”对立,虽然没有明言,但要求“不好色而好德”是很明白的。

因此,《论语集注》之说并不能算是定论,最

多也只能算是存在矛盾的“定论”。如此重视《四书章句集注》的朱熹,于本章“好色”却兼存取褒义和取贬义之两义,这如何理解呢?从“圣人当初只是恁地叹未见好德如那好色者,自家当虚心去看,又要反求思量,自己如何便是好德,如何便是好色,方有益”<sup>[7]</sup>来看,朱熹应该是故意没有给出结论,而是希望读者自己去思量。而从其“天理人欲之辨”来看,其意应该是很明白的:天理与人欲既统一又对立,因而好德与好色也是既对立又统一的。《论语集注》前半段引谢良佐之说,说的就是二者的统一;后半段兼载《孔子世家》之事,说的就是二者的对立。朱熹这样做,无非是想启发读者自己去思考;而只要读者稍微细心一点儿,就能发现《论语集注》中的矛盾,进而摸索到对好德与好色关系的思考。

在这方面,王夫之可谓得其深意。其《四书训义》也将“今之人”分为“下焉者知好色而不好德”“其情之有余者”“其情之不深者”和“不失其性而德为己有”四类<sup>[9]</sup>,思路与胡氏如出一辙,但理论思维明显高出一筹。胡氏虽然区分“好德而好色”“不好色而不好德”“不好色而好德”,但并没有从理论上指明这一区分的理论根据;王夫之则是根据“性体情用”的理论,认为“人之有德,性也。其动而为情,则好色之念生焉。”也即以好德为性、以好色为情,以好德为体、以好色为用。从“性体情用”的角度来看,“情者,人所必有之情,如其情而安之为性,故好色,诚好之也。”如果“情”是由“性”而发,则“情”为“人所必有”,这种情况下的好色是“诚好之”;另一方面,“忘其性而不用其情,斯好德者不能诚矣”,好德成立的基础又在“不忘其性而用其情”,因此“好色”与“好德”是统一的。但一为体、一为用,二者又明显是不同的,故“好德”与“好色”又有一定的差距,这是上述四类人得以存在的理论根据。因此,从好德与好色不同的角度来看,我们当然有必要对二者进行区分;但从好德与好色统一的角度来看,

① 《史记》原文为:“(卫)灵公与夫人同车,宦者雍渠参乘,出,使孔子为次乘,招摇市过之。孔子曰:‘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于是丑之,去卫,过曹。”从其记载来看,司马迁认为本章是孔子在讥讽卫灵公,表明他以“好色”为贬义。因此,《论语集注》把取褒义的谢良佐之说和取贬义的司马迁之说放在一起,确实是有问题的。

“以好色之心移而好德,则善矣”是自然的结论<sup>①</sup>。说解至此,好德与好色的关系在体用思想中已完全展露,再加上学术风气的转变,故清代学者都只强调本章是孔子“有为而言”,而不再详说其义理。黄式三从维护孔子地位的角度,指责《孔子世家》的记载“有诬圣辱圣”之嫌,因此只是指出“此言必有为而言,旧说指卫灵,或有所传”,言语甚是平和<sup>[10]</sup>。刘宝楠则只是据《孔子世家》的记载而确定本章发生于鲁定公十四年,等于承认本章是为了讥讽卫灵公<sup>[11]</sup>。简朝亮则重复“激厉之辞”“时人薄于德而厚于色”的古义,以为朱熹引《孔子世家》是“以卫灵实之”,也是认为本章是孔子针对卫灵公说的<sup>[12]</sup>。

## 二、对“色”字的误解和隐含其中的性别歧视

清儒不再说解义理,只是相对于其所处时代的学术范式而言,这并不能说明在本章的诠释方面就已无话可说了。实际上,这里面还是有值得探讨的地方。诚如朱熹指出的,牵合《大学》“如好好色”来理解本章有不足之处,但这种牵合理解本身就说明,《大学》“如恶恶臭,如好好色”与本章应该有某种继承关系。《大学》以“毋自欺”解释“诚意”,又以“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来解释“毋自欺”<sup>[6]7</sup>,从这个逻辑来看,在《大学》作者的思想中,“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是不需要再解释的理论起点。这可能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恶恶臭”“好好色”是平常每个人都知行俱足的自然本性,也就不需要再进行论证;另一方面,“恶恶臭”“好好色”有成为理论起点的思想基础。从后一方面来看,这个思想基础可能就在本章,也即孔子于本章对“好色”的论述引发了后继儒者的进一步思考,进而才有《大学》相关思想的形成。我们要追索的问题是,孔子何以要用可能存在问题的“好色”<sup>②</sup>来形容“好德”呢?或者说,正是由于孔子将这二者牵扯在一起,才有了《大学》以“好好色”“恶恶臭”来表述“诚意”的思想基础,而孔子这样做的理由是什么呢?

其实这一问题的出现,原因在于我们认为“德”与“色”是完全对立的,并进而将这种对立转移到了“好德”与“好色”上。“德”是内在本性,“色”则是一种外在表现,一内一外,在儒家强调“内”的思想特质中,我们很自然地偏向于肯定“德”而否定“色”。再加上我们一看到“色”,马上想到的是女色、淫欲等男权统治下的负面概念,因而“好色”也自然成了要不得的行为。这应该是何、李、皇、邢诸家释义对“好色”取贬义的思想起点,也是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于卫灵公“与夫人同车”事引载本章的原因。

《说文》云:“色,颜气也。”段玉裁《注》曰:“颜者,两眉之间也。心达于气,气达于眉间,是之谓色。颜气与心若合符卪<sup>③</sup>,故其字从人、卪。……引伸之为凡有形可见之称。”<sup>[13]</sup>可见“色”字无论本义还是引申义来看,都没有我们通常理解的女色的意思。《论语》中多用“色”字,如《学而》“巧言令色”“贤贤易色”、《为政》“色难”、《泰伯》“正颜色”、《乡党》“色勃如也”、《季氏》“色思温”等,但用的都是“色”之本义,按照“以经证经”的原则,何以独独本章“色”字不用本义呢?所以,本章“色”字也应该按本义解,指的是容貌、容颜,即使按引申义,所指也应该是体形、体态、身材等中性概念,也并非贬义。

本章注疏从一开始便陷入了误解“色”字之义的误区,这在对“好色”取贬义的前期是如此,即使是在取褒义的后期也没有摆脱这一误解的迹象,各家都没有讨论“色”字之义,这表明他们都认为这是无须讨论、众所周知的概念。朱熹、王夫之通过从体用论的角度对“德”与“色”的关系的形而上讨论,似乎探到了这个问题的边缘,但从其语言来看,他们也没有关注“色”字之义。即使号称以考据见长的清儒,也往往漠视此一问题,尽管他们于《论语》中首次出现“色”字的《学而》“巧言令色”章都能明辨“色”字之本义,但他们在本章却并不坚持这个训诂,而普遍倾向于承

① 王夫之的训解其实出于朱熹一路,但有意思的是,其《读四书大全说》却对《集注》兼载《孔子世家》事颇有批评,以为“朱子存史迁之说,尚为失裁”,“当削之为正”。二著的矛盾应该体现了王夫之思想的发展变化。

② 从王夫之及其他注家的意思来看,“好色”并不纯粹是坏的,它存在善、恶两方面的可能性。

③ “卪”即“节”字。

认本章所指“好色”即卫灵公之于南子。

考察先秦文献,对“色”字的这一理解在先秦时便已存在。《论语》《大学》已如前言,“色”字都作本义解;《中庸》第二十章“去谗远色”、第三十三章“声色之于以化民”两处使用“色”字,也应作本义解。但到了《孟子》却发生了变化,《孟子》一书中所使用的“色”字,既有作本义解的,如“民有饥色”(《梁惠王上》),“夫子若有不豫色然”(《公孙丑下》),“观其色赧赧然”(《滕文公下》),“王勃然变乎色”(《万章下》);也有作引申义解的,如“目不视恶色”(《万章下》),“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告子上》);还有作“女色”解的,如“昔者大王好色,爱厥妃”(《梁惠王下》),“知好色,则慕少艾”(《万章上》),“食、色,性也”(《告子上》),“色与礼孰重”(《告子下》)。《荀子》也一样,如《富国》篇三处使用“色”字:“而天下无菜色者”“若夫重色而衣之”“而有争色之祸矣”,分别用的是本义、引申义、“女色”义。可见,“色”字在战国时代便已经在原有引申义的基础上,进一步引申出“女色”的含义了。

但后世“色”有没有“女色”这一引申义是一回事,对本章“色”字的理解又是另一回事,毕竟《论语》的发生在《大学》《中庸》之前,在“女色”这一引申义形成之前,在经文诠释上当然不能用后起的含义来规范先前的文献。本章注疏从一开始便陷于对“色”字的误解,这固然是受了先秦“色”字涵义变迁的直接影响,但显然与注疏者内在的性别歧视是分不开的。严格地讲,朱熹以前对“好色”的诠释都不能简单地将之放在性别歧视的角度来讨论,毕竟今天所见诸家的注解都没有直接解释“色”字,从其语言也很难断定其仅将之理解为“女色”。换句话说,其所使用的“色”字应该是较抽象、较宽泛的概念,“女色”应该是其义涵之一方面。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批判其有性别歧视的问题。

至于朱熹以后的诠释,其性别歧视的意味便已显性化了。从隐到显的关键,在于朱熹挖出了《孔子世家》“灵公与夫人同车”的有关记载,从而将本章所谓“好色”完全锁定在于卫灵公喜好南子这一史料上。在这里,朱熹的性别歧视是很明

显和严重的,《孔子世家》的原文是:“灵公与夫人同车,宦者雍渠参乘,出,使孔子为次乘,招摇市过之。”<sup>[3]</sup>灵公的车上除了南子,还有宦者雍渠陪乘,孔子只能乘第二辆车,其“丑之”除了南子之外,当然还包括雍渠;但在《论语集注》的引文中,“宦者雍渠参乘”一节被有意省略了,此后各家也往往只谈南子,而不及雍渠。注释家这一选择性的遮蔽,从根本上当然是由于将“色”直接理解为“女色”,与雍渠自然就扯不上关系了。朱熹及其后儒家学者对史料的选择性使用和存在的性别歧视,可能与唐代女性意识的觉醒<sup>[14]</sup>有很大的关系,代表的是宋代以后封建专制要求加强对女性统治的要求。

不过,从司马迁于《孔子世家》“灵公与夫人同车”一事引述本章来看,将本章与“灵公与夫人同车”的史料关联在一起并不肇始于朱熹,而可往前推至司马迁。但诚如前文讨论过的,汉儒并不将“色”仅仅诠释为“女色”,还包括其他的含义。因此,南子固然是以“色”事灵公,雍渠之得以“参乘”恐怕也是以“色”事灵公的缘故,所谓“巧言令色”也。这也从反面凸显出朱熹以后注释家的性别歧视问题。

清儒虽然对讲说义理没什么兴趣,甚至很多地方故意与宋儒立异,但其在本章的诠释方面却不自觉地强化了“好色”与卫灵公喜好南子的关联。又由于清儒的考据作风,其诠释往往引证唐以前文献,于是又反过来强化了其所引证文献与卫灵公喜好南子一事的关联,使读者误以为前代注疏都是如此理解的,进而将这一带有性别歧视倾向的诠释确立为孔子的本意,而本章的真实义旨却隐而不显了。

### 三、“吾未见”章义旨辨正

我们既然知道了“色”字诠释的性别歧视问题,那么,在正确理解本章义旨时自然应当避免这种误解,而从本义、最多从第一层引申义的角度理解“色”字。但由于孔子只是笼统地说“未见好德如好色者”,所以“德”与“色”到底是指主体的还是指客体的,这在经文中并不明确。为了分析的需要,我们姑且将之理解为主体与客体的两面,也即:所好之“德”既指主体自身的,也指他者

的;所好之“色”也一样。

“德”是主体在参与社会文化的过程中所获得的对于自身(内)的认识,是人的内在本性。主体好自身内在之“德”,即是主体对于人生社会有了一定的觉解,不再被外在的东西所困惑。主体好他者之“德”,要么是由对内在之“德”的觉解而推扩至他人,如“德不孤,必有邻”(《论语·里仁》),又如“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论语·公冶长》);要么是由对内在之“德”的希冀而外化于他人,如众弟子对于孔子的尊崇。

“色”则是主体在参与社会文化的过程中所展示的形象状态(外),是人的外在表现。从“德”体“色”用的角度来看,内在之“德”必须表现为外在之“色”,《中庸》所谓“礼仪三百,威仪三千”是也,此时外在之“色”的内在根由即“德”,或者说色缘德生、德由色显,二者是统一的。在这个意义上,主体“好色”既可指好自身之“色”,因为它是自身之“德”的外显,色之不庄、德亦无有,因此主体要时刻注意规范自己的行为举止,《论语·乡党》篇所记载的孔子行为即属此类;也可指好他者之“色”,这是由好他者之“德”而自然引出来的,一方面是由主、客双方共有之德而生发的对有德之他者体态仪容的欣赏,另一方面则是出于对有德者的敬慕而生发的对其容仪的希冀。无论是哪种情况,由于此中的“色”是由“德”而生的,而接受主体对此“德”已有所觉解,因此,此中之“色”虽在外,亦在内。

但现实中的“色”往往是脱离“德”的,这是因为往往只有很少的人能觉解到“德”的层面,即使能觉解到也不一定能成为“有恒者”(《论语·述而》),更不用说达到“参赞化育”(《中庸》)的境地了。与儒家“反求诸其身”(《中庸》)相反,人们往往拿眼睛往外瞧,都看到些什么呢?无论是无德者之言行,还是有德者之言行,都表现为“色”。于是,当我们向外看的时候,满眼都只有“色”。“德”在哪里呢?只有透过“色”,才能看到显藏其中的“德”。但我们往往看不到这一点,于是便觉得这是个充满着“色”的世界,其行为也就自然体现为“好色”而不厌了。这里面既有对

他者纯粹外表之“色”的喜好,也有对主体自身纯粹外表之“色”的喜好,而且对于前者的喜好最终会引发对于后者的喜好的变化,也即主体通过学习他者之“色”来改变自身之“色”。当然,这里面也还有对由“德”而生之“色”的短暂的、不自觉的喜好,即在面对君子之德相时油然而生的喜好;不过,尽管君子之德相是由“德”而生之“色”,是既在外也在内的,但由于接受主体并没有能够对“德”有所觉解,因此其对于此“色”的喜好不可能是在内的,因为其自外于“德”,因而是外在的。

由此看来,“好德”和喜好由“德”而生之“色”,都以对“德”的有所觉解为前提,这就需要主体具备一定的素质条件,这一条件除了有极少数人能够依据自身材质便能具备外,绝大多数人都必须借助于良好的教育、自勉的学习<sup>①</sup>。但由于环境所迫,现实中能够获得这个条件的人还是很少的,于是人们身陷在脱离“德”的纯粹外在的“色”之中,并以此为“好”,“皆曰予知,驱而纳诸罟获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中庸》),这正是绝大多数人的生存状态。从本章的语言来看,孔子正是要以普通人都能做到的“好色”来摹状君子所应该有的“好德”,所以,其所谓“好色”不应该是喜好由“德”而生之“色”,而应该是喜好脱离于“德”之纯粹外在的“色”。由此而言,宋儒以来所谓取褒义的理解是与经文相违的。

这当然不是要完全否定宋儒以来的诠释路径,其在哲学史上亦有其地位和功绩,那就是梳理清楚了德与色之关系,尤其是王夫之在体用一元架构中所作的诠释。正是由于德、色关系的明了,才使我们得以有以上新的认识。但我们要看到,在本章的诠释中确实充斥着男权话语,我们只有对之进行有效的批判,才能真正做到对传统的“同情的了解”<sup>[15]</sup>。

还要指明的是,本章所谓“好德”与“好色”实在只是一墙之隔。“好色者”生活在“色”的世界里,所见都是“色”;“好德者”生活在“德”的世界里,所见都是“德”。但同一片蓝天之下,哪里会有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不过是见的方式、路径

① 我们这里说良好的教育、自勉的学习,不是指一般意义上的教育、学习,而是指以塑造人、成就人为最终目标的教育、学习。

不同罢了。“好德者”处处向内观照,一者观照自身之德,再者观照他者之德,最终目的是成就自身之德;“好色者”处处向外追逐,一者追逐自身之色,再者追逐他者之色,最终目的是炫耀自身之色。所触未尝异,所见未尝同,但二者有一共同点,那就是最终目的都引向了自身。因此,在这一点上,“好德者”与“好色者”是相同的,即“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孟子·离娄上》)。

只不过,“好德者”始终在内求,而“好色者”始终在外求,只要打通内、外之间的阻隔,“好色者”便是最好的“好德者”。孔子向人们宣传自己的思想,但人们不理解、不接受,于是只得采用愚夫愚妇“可以与知”“可以能行”(《中庸》)的方式来引导启发。大家一听,就比较能理解、能接受他的思想了。这应该是孔子以“好色”来拟称“好德”的根本原因。

[参考文献]

- [ 1 ] 焦循. 孟子正义[M]. 北京:中华书局,1987:14.
- [ 2 ] 何晏,邢昺. 论语注疏[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13.
- [ 3 ] 司马迁,裴骃,司马贞. 史记[M]. 北京:中华书局,1959:1921.
- [ 4 ] 何晏,皇侃. 论语义疏[M]. 刻本. 北京:知不足斋,1782(清乾隆四十七年).
- [ 5 ] 朱熹. 论孟精义[M]//朱子全书:第柒册.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334.
- [ 6 ] 朱熹. 四书章句集注[M]. 北京:中华书局,1983.
- [ 7 ] 朱熹. 朱子语类[M]//朱子全书:第拾伍册.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1358-1359.
- [ 8 ] 朱熹. 四书或问[M]//朱子全书:第陆册.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774.
- [ 9 ] 王夫之. 四书训义[M]//船山全书:第七册. 长沙:岳麓书社,2011:584.
- [ 10 ] 黄式三. 论语后案[M]. 南京:凤凰出版社,2008:243.
- [ 11 ] 刘宝楠. 论语正义[M]. 北京:中华书局,1990:349-350.
- [ 12 ] 简朝亮. 论语集注补正述疏[M].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260.
- [ 13 ] 许慎,段玉. 说文解字注[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431-432.
- [ 14 ] 马国云. 唐代女性意识的二元视角——基于女性饮酒的考察[J]. 山东女子学院学报,2018(3):58-64.
- [ 15 ] 温航亮,安春焕,杜玉敏. 女性视角下经典现代诠释的多样性及其应对[J]. 山东女子学院学报,2015(6):64-68.

**Gender Discrimination and It's  
Correction about the “I Never Saw” Section in *Analects: Zi Han***

WEN Hang-liang

(Hu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Xiangtan 411201, China)

**Abstract:** Because of the different value judgments of the concept “loving of appearance”, there are two opinions in the annotations about the “I never saw” section in *Analects: Zi Han* in the past dynasties; identified as derogatory sense or commendatory sense. But they all misunderstood the concept of “se” as prurience, so there's gender discrimination in the classical interpretation, especially in the Confucian scholar after Zhu Xi. If understanding “se” as its original meaning and its first layer of extended meaning, we will find that it's a popular tactics in the words adopted by Confucius who tried this in order to explain the meaning and features of the concept of “loving of virtue” with the help of popular hankering for the appearance divorced from virtue.

**Key words:** *Analects*; loving of virtue; loving of appearance; gender discrimination

(责任编辑 赵莉萍)

# 大众传播中的女性形象 研究综述及对女性主义中国化的思考

卢 敏

(北京大学, 北京 100871)

**摘要:**从传统媒介形式到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时代,大众传播中的女性形象也经历着发展变化的过程。在大众传播发展的纵向维度上,女性形象总体上呈现出缺失、被动、刻板的特点,但也有突破刻板印象的趋势;在大众传播生产环节的横向维度上,女性形象仍显弱势,但女性生产者和女性受众正在寻求突破的可能。在当前中国社会环境中进行女性主义研究,应尤其注意历史背景、特殊时期政策和互联网的综合影响。

**关键词:**大众传播;女性形象;女性主义;刻板印象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838(2019)01-0081-09

大众传播为了扩大市场、吸引受众,其所展现的女性形象经历着不断分化、加强、打破、重塑的过程。对大众传播中女性进行形象研究,有助于我们认清大众传播对社会性别的刻画和表现,同时有助于发掘媒体与现实世界的互动关系。在中国学者开始关注女性主义和女性形象之后,对相关理论进行本土化建构,使之适应中国社会现状,又成为我们应当关注的问题。

笔者将首先从纵向和横向两个维度,对关于大众传播中女性形象建构的文献进行整理。纵向维度,即研究随着大众传播技术和传播方式的发展,大众传播中的女性形象表现出的特征和性质;横向维度,即在大众传播的生产和接收过程中,对参与其中的女性角色及其自我形象建构进行分析。同时,借助以上的女性形象分析,回归中国社会现实,笔者提出对中国女性主义研究本土化的几点思考。

## 一、纵向维度:传统媒介与互联网媒介中的女性形象

大众传播经历了从传统印刷媒介报纸、杂志等到广播、电视媒介再到当下互联网时代的网络媒介的发展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大众传播中的女性形象也经历着变化。然而,由于大众传播媒介对社会性别理解的僵化与局限,使得大众传播不同阶段的女性形象有着一定的继承性和同一性。

传统媒介主要指报纸、杂志等印刷媒介与广播、电视等电气时代的媒介形式。在传统媒介阶段,大众传播中的女性形象有如下特征:(1)缺失性。媒介中男性形象为主导,女性在数量和表达力上仍然处于缺失的地位。(2)被动性。女性多是“被要求”“被塑造”的形象,与男性形象的主动性形成鲜明的对比。(3)刻板性。女性形象主要停留在甜美可人或贤妻良母的阶段,显得僵硬刻

板。(4)另有部分学者认为在传统传媒方式中,女性形象正在逐步变得丰满,体现了女性主义的价值观念。

### (一)传统媒介中女性形象的缺失

女性形象的缺失首先体现在新闻报道中女性话题的缺失。刘利群等发现在五个新闻节目——江苏卫视《江苏新时空》、广东卫视《午间新闻》、天津卫视《12点报道》、安徽卫视《每日新闻报》、青海卫视《午间360度》中,2013年全年的新闻话题中有93%的新闻未涉及女性话题,而在剩下的7%的新闻中,涉及女性与婚姻、家庭的新闻仅7条,而且都是关于女性如何勤俭持家、做贤妻良母的报道,这直接体现了女性形象在电视新闻媒体中的缺失<sup>[1]</sup>。

其次,刘晓红、卜卫也提出,在电视(主要是电视剧)中,男性出现的几率远大于女性。她们认为,20世纪50年代~80年代在北美电视节目中男性出现的比例远远高于女性;同时,她们用内容分析的方法研究了中国传统媒介对女性形象的展现,发现女性在报纸、教科书等主流纸质媒介中的出现次数也比男性更少<sup>[2]</sup>。

再次,中国传统媒介中女性形象的缺失也在电影中有所体现。戴锦华在《不可见的女性:当代中国电影中的女性与女性的电影》一文中提到,文化中的“女性”变成一种子虚乌有,女性、女性的话语、女性的自我陈述与探究,由于主流文化中性别差异的消失,成为非必要的与不可能的<sup>[3]</sup>。因此,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到“文革”时期的电影中塑造的女性形象,主要是“解放的妇女”“女英雄”,从而成为了群体“非性化”的一员,并不是真正的女性,例如谢晋导演的《红色娘子军》。

### (二)传统媒介中被动的的女性形象

首先,劳拉·斯·芒福德在《午后的爱情与意识形态:肥皂剧、女性及电视剧种》一书中,详细分析了美国肥皂剧中的女性形象。她认为,肥皂剧中的女性形象都是被动的,例如,只有坏女人才会主动地知道自己怀孕,女性也不能自己控制是否要堕胎等等。同时,肥皂剧中常常塑造因为其他女人怀了丈夫(未婚夫)的孩子就退出这段

关系的“好”女人,这种品德的塑造,也体现了女性形象的被动性<sup>[4]</sup>。

其次,传统媒介也着力塑造女性“被观看”的被动形象,这同时赋予了男性“主动观看”的地位。格雷姆·伯顿在《媒体与社会——批判的视角》中提出,许多女性杂志的封面图片上所展示的女性都具有“照相机意识”——摆出各种姿态,向读者炫耀她们的服饰,这体现出杂志阅读中的女性“被观看”与男性“观看”地位的对立。同时,伯顿也分析了肥皂剧中的女性形象,认为肥皂剧中“女家长”形象的设置,也是女性被动形象的一个体现:“女家长”通常拥有对家庭的强大控制,通过这种形象的塑造,肥皂剧构建出了一个关于“母性”的神话,这样的神话对于女性的独立自主并不能够提供任何帮助,相反却在某些情况下导致了男性利用女性来满足私欲<sup>[5]</sup>。

再次,女性的被动形象在电影中也一样有所体现。在戴锦华看来,中国第五代电影的部分作品中,男性欲望的视野再次出现,大银幕上的女性形象变为被动的、“被观看”的。女性形象中的性感要素被放大表达,例如张艺谋的处女作《红高粱》、周晓文的《疯狂的代价》,女性形象的复现是为了完成对男性文化及其困境的呈现与消解<sup>[3]</sup>。李攀着重研究了近年来兴起的“小姐电影”,他提出,中国“小姐电影”传达出当代女性的焦虑情绪,电影中的女性越是反叛男权社会,就越是体现了女性的被动地位,反映了现实中女性的焦虑与无奈<sup>[6]</sup>。

### (三)传统媒介中刻板僵化的女性形象

默克罗比的《女性主义与青年文化》一书第四章《杂志《杰姬》:浪漫的个人主义及十几岁少女》中提到,《杰姬》着力塑造柔弱、可爱的女性形象,且少有变化,她们都有一个共同特点:漂亮。作者认为,本杂志强调性别角色间绝对和天然的差异,女孩需要漂亮且不自负,男孩可以多变,但女孩只能有女孩样。这种角色设置,生动地体现了杂志对女性形象的刻板描摹<sup>[7]</sup>。同时,中国学者罗慧也认为,时尚杂志在以女性为表征对象方面突出了女性“被看”的特点,同时这些杂志用整页广告蛊惑女性消费,使得女性主体意识的表征

被不断弱化<sup>[8]</sup>。

在电视媒介出现之后,女性的刻板形象被进一步强化。刘晓红、卜卫在《大众传播心理研究》中对电视媒体中的女性刻板形象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归纳:电视上的女性形象大都是温柔、迷人、少竞争性、性感、情绪化、依赖男性的形象;男性则多是理性、智慧、坚强、勇敢的重要的社会角色。在职业、能力的层面上,女性是无知的家庭角色,在社会层面上,女性是承受暴力的对象。她们认为,这种刻板印象与受众的心理过程相适应,符合她们对女性形象的期待,因此会被反复提及<sup>[2]</sup>。

#### (四)非主流声音:女性形象的上升

在众多学者批判大众传播中女性形象建构的缺失、边缘化、刻板僵化的同时,也有学者认为,女性在电视剧中的主导性正在增强。

陆皓通过对女性题材电视剧中女性角色设置(男女主角数量对比)的分析发现,女性形象在电视剧中的主导性增强,且电视剧中的女性形象日趋复杂,女性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也呈现出多样化的状态,这体现出中国女性正朝着现代女性迈进<sup>[9]</sup>。他认为,中国电视传播中女性形象的上升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女性电视从业者的介入使电视作品中的女性形象更具女性意识;其次,受众对电视女性形象的看法产生了社会影响力,自强不息的女性更受观众的欢迎;再次,电视文本的结构方式与女性形象的呈现有相互作用。

然而,在已有的大众传播与女性形象研究中,这种乐观的声音仍然处于非主流地位,且多集中于某一时段的中国学者对中国电视作品的分析中。

## 二、互联网媒介中女性形象研究

通过梳理互联网媒介中的女性形象建构相关研究发现,在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时代,大众传播中的女性形象建构有以下三个特点:第一,女性形象仍然处于缺失和边缘地位;第二,以网络新词为表现的女性形象的污名化;第三,互联网媒介对女性形象的多向塑造与表达。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在女性形象建构方面,传统媒

介与互联网媒介的传承性和同一性。

### (一)互联网媒介中的女性形象仍处于缺失和边缘地位

首先,与传统媒介中的新闻报道相似,在网络新闻中,女性形象仍处于缺失和边缘状态。顾冬梅在《网络传播:性别仍未平等》一文中,对2004年上半年国内几大门户网站的新闻报道统计发现,当时的互联网仍缺乏对女性群体的关注,而且对女性的报道主要集中在体育、娱乐、社会、生活等非主流方面,而在政治、财经、科技、商业等对社会起主导作用的相关领域,女性的报道被严重边缘化<sup>[10]</sup>。

其次,有学者通过分析网络环境中的女性议题和女性的公民身份来展现网络媒介中女性形象的缺失和边缘化。例如周翠芳在《网络媒介对公民身份的文化建构》中分析了网络环境中女性声音被压抑的现状,提出女性形象很少出现在政治、军事、经济议题中;网络中大量“女性频道”并没有成为女性汲取知识的平台,而只是为女性提供了一个消遣娱乐的场所,所提供的“知识”也大都教女性如何变美,没有脱离女性“被观看”的身份。作者认为,网络中的女性形象依然遵循着社会对女性的印象,困囿于家庭的范围之内,作为男性的附属和陪衬,处于被边缘化的地位<sup>[11]</sup>。

再次,与传统媒介相比,互联网媒介传输速度更快、画面感和表现力更强、传播范围更广,因此更有利于图像、视频等多媒体的传播方式。在这种条件下,不少学者提出,网络上女性形象“色情”意味更浓,这也是女性形象边缘化的一个重要方面。例如曾长秋、李斌在《性别与传播——网络媒体中“被看”的女性形象》中提出,“网络对女性形象的建构,除了将居家育儿、婚姻情感等类型的栏目归之于‘女人’名下之外,更是将‘女’与‘色’结合起来,极力渲染美貌、性感与女性的关联”。各种富有挑逗性的文本以及与色情淫秽有关的信息泛滥于网络之中。这种现象进一步扭曲了社会性别印象,抹杀了女性的主体性和多元性,更影响了真实世界中男女受众对性别角色

的认识和重新建构<sup>[12]</sup>。

## (二)以网络新词为表现的女性形象的污名化

近年来,互联网的快速传播使得网络新词迅速生成,与女性有关的网络新词也层出不穷,“绿茶婊”“网红脸”等正在重新定义着网络上的女性形象,一些学者由此提出了网络中女性形象的“污名化”。曹晋等在《新媒体、新修辞与转型中国的性别政治、阶级关系:以“绿茶婊”为例》一文中提出,“绿茶婊”在网络的出现,集中地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符号、身体与性三者的商品化、市场化过程展现出来;在讨伐“绿茶婊”的网络混战中,新媒体为中国都市底层青年男性与权贵阶级的矛盾提供了宣泄与可见性的平台,同时也将一大批女性形象置于被戏弄、玷污的境地<sup>[13]</sup>。

同时,一些与女性形象相关的传统语境中的“正常”词汇,在网络中也呈现出污名化的趋势,例如“女司机”。胡宏超认为在当前的环境下,网络媒介对女性的报道存在形象建构的偏差,例如“女司机”已经被贴上了“马路杀手”的标签,这种形象建构的偏差进一步强化了莽撞的“女司机”形象。作者提出,在互联网中,传统男性中心主义仍占主导,女性群体在公共领域缺乏必要的敏感性和主动性,商业文化与消费主义也对女性形象污名化这一现象起到了催化作用<sup>[14]</sup>。

## (三)互联网媒介对女性形象的多向塑造与表达

除却以上对互联网媒介中女性负面形象建构的研究,不少学者也认识到互联网媒介对于女性形象的正面塑造和女性争取话语权的积极作用。例如,在《性别与传播——网络媒体中“被看”的女性形象》一文中,作者提出,互联网也塑造了一大批积极的女性形象,这体现出性别文化与性别意识在媒介技术中的反映。作者呼吁,网络用户个人要反思落后的性别观念,同时需要从法规、制度和技术三个层面建立网络媒体的社会性别检测机制<sup>[12]</sup>。

其次,在女性话语权争夺方面,王蕾在《女性主义视角下的网络媒介传播——以网络女红人

为例论女性表达》中提出,网络媒介使一直被归于私人领域的女性得以进入公共领域,借助网络这个平台,女性获得了交流空间、话语空间和多元化的交往对象,她们抛弃了现实生活中所有的性别束缚和顾及,让自己的话语在公共领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广泛传播,这为女性提供了倾诉的话语场,女性由此能够逐步进入性别秩序内部<sup>[15]</sup>。

综上所述,从以报纸、广播、电视为代表的传统媒介到互联网媒介,学者对大众传播中女性形象建构的研究集中在其负面,主要论述了女性形象的缺失与边缘化、女性形象的被动与僵化,以及女性形象的污名化。然而,随着社会平等意识的提升,不少学者也注意到大众传播作为一个话语场域,对女性形象塑造与女性话语表达正在发挥着越来越积极的正面导向作用。

## 三、横向维度:大众传播中的女性生产者与女性受众形象

在大众传播的过程中,生产与接收是两个重要的环节,生产者(如记者、编辑、导演等)与接收者(即受众)是大众传播中至关重要的角色,直接影响着传播内容、传播范围以及在此过程中社会意识的建立。对女性生产者和女性受众的研究,也是女性形象的研究者的学术重点。

### (一)大众传播中的女性生产者形象

对大众传播中的女性生产者的研究,有助于把握传播大环境中的女性话语权,展示女性生产者的外在形象及自我定位。综观目前的研究,对女记者和女导演的研究较为充分。对她们的研究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整体传播环境中,女性生产者仍处于弱势地位;第二,女性生产者正在发挥女性优势争夺大众传播中的话语权。

1. 女性生产者的弱势地位。女性生产者在大众传播中的弱势地位,首先体现在媒体中女性生产者的数量不多、地位不高。《睡美人如何醒来》一书中收录的《营造一个小气候》一文中提到,1990年代中期,在新闻机构的编委会中,女性不到9%,部门主任中,女性不到18%,但在整个新闻工作者中,女性占三分之一以上。直到21

世纪初,在传播和媒介产品制作的决策层中,仍然存在着严重的性别不平衡<sup>[16]</sup>。这种性别层级的不均衡,体现了女性生产者在整个媒体行业中的边缘与弱势地位。

其次,随着女性进入传播行业人数的增多,女性生产者在数量上有了明显提升,但是部分学者认为,即使在数量上占了优势,女性生产者的话语权仍显不足。刘利群等通过统计发现,在其监测的五档节目中,女性主播共出现634次,男性主播共出现352次,在数量上女性主播占很大优势,但是播报主题有性别上的差异,即文化和社会相关报道更倾向于使用女性播报,而经济科技等主题则更倾向于由男性播报。同时,女性主播都年轻、形象好、气质佳,是节目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这也意味着她们承担着节目“花瓶”的角色。作者认为,这种男女主播角色的分化,是女性生产者边缘化地位的体现<sup>[1]</sup>。

再次,在当前许多女性生产者已经在媒体中占有一定地位、享有知名度的同时,部分学者也看到了她们光鲜背后被物化了的尴尬形象。李兰青在《透视女性名记者的性别尴尬》一文中,提出了关于女记者的成功与性别差异之间关系的问题。从逻辑上讲,利用女性自身优势可以与被采访者进行更好的沟通,也可以使受众不再仅仅看到来自男性视角的新闻报道;但事实上,对性别差异的突出和对女性身份的强调使得女性记者成为媒体利用的对象和受众猎奇、欣赏的客体——女性既扮演着媒体角色,同时更加扮演着被物化、对象化的审美客体的角色。例如同样是报道“非典”的记者,王志被展现出的是专业、敬业、执着、睿智的优秀记者形象,而柴静则被形容成“诗一样的女孩子”,被卷入了观赏者的视野<sup>[17]</sup>。

2. 女性生产者对话语权的争夺。与其他女性相比,媒体女性生产者与话语权距离更近,具备争夺话语权的天然优势。众多女性生产者在争取话语权的过程中,塑造了一批批勇敢但又略显尴尬的生产者形象。

首先,不少女性生产者,尤其是女导演,通过将自己“男性化”来获得自己在业界的地位。戴

锦华认为,最重要的主流电影、艺术电影的女性制作者,是成功的“男性扮演者”,她们中的大多数都公开地或间接地表示她们对女性主题、女性电影的漠视或轻蔑。在这个过程中,这批成功的女导演塑造的是略显尴尬的女性形象,但是至少她们让外界听到了女性的声音<sup>[3]</sup>。

此外,有不少学者认为,已有许多女性生产者在大众传播中占有了一席之地,传播了女性主义价值观,塑造了良好的女性生产者形象。例如,同样是对电影的分析,华晓红认为,中国女性导演往往通过对男权文化范围内的传统观念的柔性解构来突出女性主体性。女性创作者身为女性,对女性的生存状态、文化处境、心理情感有着最为深刻的体验,这对女性意识的逐渐清醒和自觉、女性主体身份的建构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其本身就意味着对男权文化围城的强力突围<sup>[18]</sup>。张会军在《影像中的感性情感——女性电影导演研究》中,从女性导演与女性的电影、女性电影导演创作现状、女性电影导演典型范例三个主要方面进行了论述,他认为女性导演用感性情感和独特风格创作的作品,为女性的意识表达、艺术创作和电影市场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他强调,当下的电影艺术领域体现出了对女性电影导演的尊重,女性导演具有优势地位<sup>[19]</sup>。

同时,也有学者对女性记者的自我定位及自我形象建构进行了充分肯定。卜卫对《人民日报》女记者卢小飞的新闻作品进行了解析,认为她的作品鲜明地体现了女性主义的文化特征。她提出,卢小飞从少数民族社会的发展、妇女儿童的发展和贫困地区农村发展的角度来透视社会,这是典型的女性主义视角。同时,她的作品还展示了女性积极追求发展和张扬个性的一面。卜卫强调,女性视角对妇女、少数民族等的关注可以补充主流文化生活,在大众传播中发挥着重要作用<sup>[20]</sup>。

## (二) 大众传播中的女性受众形象

在传统媒介时代,女性的电视收视行为是学者们的研究重点;在互联网媒介时代,女性对互联网及移动客户端的使用,也正在走进学者们的研究视野。通过对文献的总结归纳发现,大众传

播中的女性受众形象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女性是大众传播中的被动受众;第二,女性受众正在通过媒介积极塑造新形象。

1. 女性是大众传播中的被动受众。首先,在最早受到关注的家庭电视观看行为中,众多学者认为,女性是家庭电视使用的主体,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她们掌握着电视的主动权,也不意味着她们能够通过电视建构自身独立、自主的媒介使用习惯。戴维·莫利在《电视、受众与文化研究》一书中分析了家庭收视行为中如何看、看什么的问题,并提出男女在收视行为中有着明显的差异,这种差异是由男性和女性在家庭中所扮演的社会角色决定的:女性倾向于将家庭定义为“工作空间”,因此女性出于家庭责任感,只能间断地、充满负罪感地去看电视,而男性则主要将看电视当作是休闲。访谈也发现,男性在家庭中掌握着遥控器的操纵权,女性则处于被动地位<sup>[21]</sup>。

同样地,格雷姆·伯顿在《媒体与社会——批判的视角》一书中提出,以批判的视角来看,肥皂剧一方面要求女性观众认同于其所承担的家庭角色,另一方面也要求她们不加批判地接受现状。如果说这种性别化角色体现了肥皂剧中的“社会写实主义”倾向,那么这种写实主义同样也是意识形态的体现。社会现实中女性的被动性,被带入了电视收看行为中,女性变成了被动的电视观众<sup>[5]</sup>。

同时,有学者认为在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介的使用中,女性也是被动的受众。例如卜卫认为,大量研究发现,在互联网时代,妇女并没有像男性一样得到“主体地位”<sup>[22]</sup>。经验表明,女性地位并不能随着传播新技术的发展自然地得到提高,其权力也不能随着传播新技术的发展自然得到增长,女性常常被新技术置于更边缘的地位。

2. 女性受众正在通过媒介使用塑造新形象。首先,不少学者认为,媒介使用可以使得女性更加适应当代社会的要求,方便她们履行自己的角色职能,拉近她们与时代的距离。在众多研究中,曹晋对上海家政钟点女工的手机使用分析是经典案例。这项研究旨在透视中国农村妇女在

中国都市家务劳动市场化、社会化进程中,如何发挥手机的功用来适应新的都市生活与家政劳动,并在异地以电话遥控的方式来监督儿子,履行“母职”。作者借此探索传播新技术的普遍使用重塑妇女的阶级与社会性别位置的过程,也展示了新技术在重塑女性身份和角色的过程中发挥的作用<sup>[23]</sup>。

其次,女性在媒介使用中形成的对自我的认同,也得到了学者的关注。格雷姆·伯顿在《媒体与社会——批判的视角》中提到,女性杂志的使用是为女性读者所熟悉的表达模式,这使读者不仅能够具备处理日常生活的技巧,也给她们带来了快感,甚至让她们上瘾,因为女性读者在阅读这类杂志时,感到个人得到了“召唤”,同时也获得了女性群体的归属感<sup>[5]</sup>。

再次,媒介使用可能赋予女性自我减压、自我解放的机会,从而有利于她们对自我形象的建构。论著《媒介研究:文本、机构与受众》第三部分重点介绍了媒介传播中的受众研究,作者提到,女性阅读浪漫小说所传达的也可能是一种反抗性信息;阅读小说可以免除她们在看电视时的负罪感,又能给自己留出独立的时间<sup>[24]</sup>。学者卜卫在2000年前后针对女性互联网用户和非用户的定量研究发现,在使用互联网之后,女性用户比非用户有更多的接近信息与娱乐、表达与交流的途径,更能满足个人需求,在社会价值观念方面更加开放,因此对自己的认识更为丰满、深刻,对自己的形象塑造更加自主、主动<sup>[22]</sup>。

总之,在大众传播的横向维度,即媒介的生产和接收过程中,女性生产者和女性受众虽仍然没有摆脱被偏见、被边缘化的地位,但是女性生产者通过电影、新闻等作品,正在表达着自己的女性观念,积极塑造着正面的女性形象;女性受众在媒介接收过程中,也获得了获取知识渠道和观点表达的途径,这对于她们对自身形象的认同和塑造有着积极意义。

通过对以上内容的综述研究,对大众传播中的女性形象描述可总结出“刻板性-多样性”(主要涉及对女性形象的第三人称呈现)、“被动性-主动性”(主要涉及女性形象自我定位与认知)

两个衡量角度,将以上讨论的各种女性形象放入这两个角度框架中,形成如下所示的“大众传播中的女性形象描述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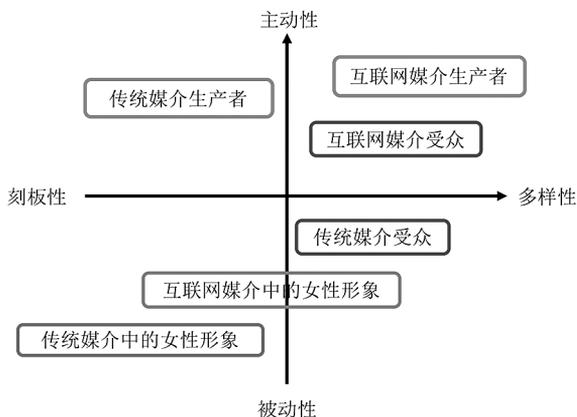


图1 大众传播的女性形象描述图

如上图所示,传统媒介中的女性形象更为刻板、被动,而互联网媒介中的女性形象则更呈现出多样性和主动性的倾向,但总体上仍然是刻板且被动的。在生产者和受众的角度上,传统媒介中的生产者主动性较强,但仍然有刻板性;而在互联网媒介中,生产者不仅主动性有了提升,更因为信息传播渠道的丰富,以记者为代表的生产者形象更加多样。传统媒介中的女性受众主要是被动接收信息,但是可以在接收信息的过程中产生对女性身份的共鸣,因此形象的多样性较为突出。而在互联网媒介中,女性受众接收信息的主动性有了质的提升,对个人形象的建构也更加多样。

以上总结只涉及到了各个类别中女性形象的主要方面,并不是全面的展示,然而从中我们也大致可以看到大众传播中的女性形象的发展过程: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纵横维度上的媒介中的女性形象,都在向着多样性和主动性发展。

#### 四、对当前环境下女性主义研究中国化的思考

在前文的综述中可以发现,无论研究者是否为女性主义的支持者,对大众传播中的女性形象研究,始终在女性主义的框架之内。因此,要更好地研究中国社会大众传播中的女性形象,就要首先做好女性主义的中国化。

由于西方国家对女性主义的研究历史时间长,研究内容丰富,不少中国学者倾向于直接将西方的女性主义思想代入中国,全盘接受,有对西方女性主义神圣化的倾向。对于这一点,有不少学者持反对态度。董丽敏在《女性主义:本土化及其维度》中提出,如果无甄别地借鉴西方女性主义思想,将会使得女性主义的本土化出现基本判断上的偏离——对女性主义的讨论更多是在文明与愚昧、西方与东方这样的大格局下展开,而不是完全贴近男性与女性这一基本性别框架。笔者认为,由于中国社会形态的独特性,女性主义的中国化也需要有“中国特色”<sup>[25]</sup>。以下是笔者在以上文献综述的基础上,关于研究大众传播中的女性形象与女性主义本土化的几点思考:

##### (一) 中国的女性研究与民族解放运动相结合

西方女性主义来源于性别不平等的社会根源,女性对女性政治权利、社会地位、独立自主意识的追求,形成了最初的女性主义。可以说西方的女性主义是建立在男女性别二元对立的基础上的。然而,中国女性主义的最早缘起却是来自近代中国对封建社会和外来侵略的反抗斗争。尤其是上世纪中叶的中国社会媒介传播水平与西方社会差距很大,因此更不能在媒介与社会性别研究方面照搬西方研究成果。

在中国近代的反抗斗争中,涌现出了大量女记者、女诗人,从女性的角度洞观中国社会,以女性的力量争取民族的解放,并由此产生了女性对社会权力、自我意识的要求和呼吁。这种吁求是建立在国家和民族的危机之上的,而不是女性自觉自醒地与男权文化作斗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妇女能顶半边天”的思想被一度认为是女性主义的吁求。然而现在看来,这是在国家建设的特殊时期,女性对于国家号召的回应,更多地传达着爱国情怀,而并非女性与男权社会的对抗。反之,这种要求男女完全平等的观念,在一定程度上有违西方女性主义对女性独特性和主体性的要求。

因此,我们必须认识到,中国女性主义的渊

源不是女性与男权社会的对抗,而是在整个民族觉醒过程中女性群体的觉醒,它与外来侵略相斗争,与国家面临的恶劣环境相斗争,而不仅仅是为女性争取自由、独立和解放而斗争。

(二)对中国女性的研究要与中国特殊政策相结合

近年来,中国社会出现的许多与性别相关的现象引起了媒体和社会的关注,例如“天价彩礼”“丈母娘推高房价”等。这些现象常常被解读为中国女性地位的提升,媒体也常常通过此类新闻渲染当代中国女性,尤其是适婚女性对生活品质的追求,这个现象对当代女性的自我定位和自我形象刻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甚至被部分民众标榜为“女性主义”或“女权主义”。

以上现象的出现,其实与中国1980年代初的“计划生育”政策有密切关系。在“计划生育”政策与中国社会“重男轻女”传统的共同作用下,中国社会的男女比例受到了重大影响。根据国家统计局2015年人口抽样调查,25~29岁性别比为102.24:100,20~24岁性别比为108.51:100,15~19岁性别比为116.12:100,10~14岁性别比为118.59:100。在这样悬殊的男女比例下,社会对高彩礼、房、车的追捧主要来源于男性娶妻的急迫性,而非女性地位的提高。相反,个人认为,婚姻关系中对物质的强调,在当前情况下,体现出的是社会对女性进一步的物化倾向。因此,对中国女性主义及大众传播中的女性形象研究,不能仅看社会现象的表面,还应分析这背后的政策原因和制度根基。

(三)对中国大众传播中女性形象的研究要注重互联网的影响

在西方,在时间关系上,对大众传播中的女

性形象研究是与大众传播媒介的发展相伴随的,即逐渐从电视、杂志等研究发展到互联网媒体中的女性形象研究上来。

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中国对媒介与性别的研究兴起之后,就遇到了互联网的大潮。互联网信息的快速、大范围传播,使得它在形象塑造、价值观念塑造等方面有着传统媒介不可比拟的强大力量。因此,在这种情况下研究大众传播中的女性形象,面临着巨大的机遇,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事实上,互联网对社会性别形象和性别关系模式的深刻影响,已经初见端倪。刘利群等在《中国媒介与女性发展报告·总报告》中提出,2013~2014年,在大众传播中出现了一些新兴的性别形象和性别关系模式,丰富了性别文化内涵<sup>[1]</sup>。例如“女汉子”,在大众传播中常被描述为职场上的技术标兵与劳动模范,是具有独立自主、坚强积极气质的女性力量;而“暖男”则是懂得理解女性需要的一类男性,这种形象的构建和传播反映了社会对多元男性气质的期待和需要,也反映了当代女性对两性关系模式需求的变化。这种变化在上世纪中期的学者看来,是不可想象的,更是不能单纯地放在传统西方女性主义框架下讨论的,必须根据当前的社会形态,进行因时制宜的讨论。

总之,要充分研究中国大众传播中的女性形象及其对女性主义话语的表达,就必须将女性主义置于中国当代社会的现实中进行讨论,要找出中国女性主义的真正来源,考虑中国的特殊人口政策,并充分意识到互联网对中国社会的深刻影响,而不是对西方女性主义生搬硬套,只有这样才能摸清中国本土的女性主义发展脉络。

#### [参考文献]

- [1] 刘利群. 中国媒介与女性发展报告[C].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20-31.
- [2] 刘晓红,卜卫. 大众传播心理研究[M]. 北京:中央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
- [3] 戴锦华. 不可见的女性:当代中国电影中的女性与女性的电影[J]. 当代电影,1994(6):37-45.
- [4] 劳拉·斯·蒙福德. 午后的爱情与意识形态:肥皂剧、女性及电视剧种[M]. 林鹤,译.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
- [5] 格雷姆·伯顿. 媒体与社会:批判的视角[M]. 史安斌,译.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
- [6] 李攀. 焦虑的“小姐”:中国小姐电影中女性形象体认[J]. 山东女子学院学报,2016(1):92-96.

- [7] 默克罗比. 女性主义与青年文化[M]. 张岩冰, 彭薇, 译. 开封: 河南大学出版社, 2011.
- [8] 罗慧. 传媒中的女性形象建构及其对女性生存发展的影响[J]. 山东女子学院学报, 2012(1): 57-60.
- [9] 陆晔. 中国电视传播中的女性形象研究[J]. 新闻大学, 1997(1): 32-36.
- [10] 顾冬梅. 网络传播: 性别仍未平等[J]. 传媒观察, 2005(2): 39-41.
- [11] 周翠芳. 网络媒介对公民身份的文化建构[J]. 社会科学论坛: 学术研究卷, 2008(8): 161-170.
- [12] 曾长秋, 李斌. 性别与传播——网络媒体中“被看”的女性形象[J]. 兰州学刊, 2015(3): 188-191.
- [13] 曹晋, 徐婧, 黄傲寒. 新媒体、新修辞与转型中国的性别政治、阶级关系: 以“绿茶婊”为例[J]. 新闻大学, 2015(2): 50-59.
- [14] 胡宏超. 互联网语境下女性媒介话语权的缺失与提升[J]. 青年记者, 2016(23): 9-10.
- [15] 王蕾. 女性主义视角下的网络媒介传播——以网络女红人为例论女性表达[J]. 河南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1, 51(2): 110-116.
- [16] 冯媛. 睡美人如何醒来[M]. 北京: 九州出版社, 2007.
- [17] 李兰青. 透视女性名记者的性别尴尬[J]. 传媒观察, 2005(3): 21-22.
- [18] 华晓红. 构建女性的自我文化空间——新世纪以来女性导演女性意识表达的特征[J]. 山东女子学院学报, 2009(6): 40-42.
- [19] 张会军. 影像中的感性生活——女性电影导演研究[J]. 北京电影学院学报, 2012(6): 2-7.
- [20] 卜卫. 女性主义的观察视角——读人民日报女记者卢小飞的新闻作品[J]. 新闻记者, 1997(1): 51-52.
- [21] 戴维·莫利. 电视、受众与文化研究[M]. 史安斌, 译.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05.
- [22] 卜卫. 社会性别视角中的传播新技术与女性[J]. 妇女研究论丛, 2002(2): 37-42.
- [23] 曹晋. 传播技术与社会性别: 以流移上海的家政钟点女工的手机使用分析为例[J]. 新闻与传播研究, 2009(1): 71-77.
- [24] 利萨·泰勒, 安德鲁·威利斯. 媒介研究: 文本、机构与受众[M]. 吴靖,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 [25] 董丽敏. 女性主义: 本土化及其维度[J]. 南开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5(2): 7-12.

## A Review on Female Image in Mass Communication and an Inquiry into Feminism Sinicization

LU Min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From traditional media period to new media era represented by Internet, female image in mass communication has changed simultaneously. From the vertical dimension of mass communication development, the overall characters of female image could be concluded as missing, passive, and stereotyped. From the horizontal dimension of mass communication production process, female image remained weak. Nevertheless, female producers and audiences are still seeking for the possibility of breakthrough. As the inspiration of the literature review, this study concludes that the effect of historical background, policy of special periods and the Internet should be paid special attention during the female image study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society.

**Key words:** mass communication; female image; feminism; stereotyping

(责任编辑 赵莉萍)

· 女性文化研究 ·

# 试论 1990 年代后王安忆创作中的女性漂泊意识

翟瑞青, 耿聪聪

(山东青年政治学院, 山东 济南 250103)

**摘要:**1990年代以后,王安忆的文学创作开始对女性的精神与灵魂的归属问题进行探究,其作品中女性的经历与体验一直潜藏着无所归依的漂泊意识。这些女性的漂泊方式各不相同,但漂泊境遇却有很多相似性。究其原因,王安忆自身的经历和上海文化的排他性,都助推了她浓重漂泊意识的形成。

**关键词:**1990年代;王安忆文学创作;女性漂泊意识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838(2019)01-0090-07

1990年代以后,王安忆作品中对“漂泊意识”的书写,从任何人都无法忽视与逃避的繁琐生活入手,真实而又清醒地描绘了广大女性群体因漂泊而经历的离合悲欢,以及漂泊过程中细微的感受和体验,从更纯粹、自然的视角展现了人物的生存状态,以追寻生命的真谛。

## 一、女性漂泊意识在王安忆文学书写中的具体呈现

王安忆对女性漂泊意识的书写在其文本中有着不同的呈现方式,具体表现为因求生漂泊、寻爱漂泊以及寻根漂泊这三种具体方式。

### (一)因求生而漂泊

著名的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提出的“需求层次”理论,将人的需要从低到高按层次分为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社会需要、尊重需要以及自我实现的需要。其中生理需要是人最低层次也是人最基本的需要,指的是对食物、水、空气、睡眠等的需要。笔者要讨论的王安忆作品中的为“求生”而漂泊中的“求生”即是如此。

为“求生”而漂泊,顾名思义就是为了满足物质生活的需要,为了生存而进行漂泊。在当代社会,许多人背井离乡外出经商、务工,因为生存搬迁到异地,王安忆的作品中有不少因求生而漂泊的人。

王安忆写过不少关于保姆题材的小说,《富萍》就是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富萍》中以主人公“奶奶”和吕凤仙为代表的扬州女人们从年轻时就到上海当保姆,这类女人多无依无靠,无夫无子,为了生存不得已离开自己的家乡,成为了连接城市文化与乡村文化的特殊文化符号。

《富萍》中的“奶奶”到上海几十年,一直在被上海市民定义为真正上海的淮海路做工,侍奉过无数个东家。以“奶奶”为代表的保姆们一直生活在上海,比年轻一代的人更懂上海。她们熟知上海的生活方式、语言习惯,经历了这座城市的兴衰变迁,能对发生的上海故事追根溯源。可是,尽管如此,“奶奶”们依然融不进上海这座城市,“奶奶”一但有了“那岔开腿下蹲的姿势,就有

收稿日期:2018-10-28

作者简介:翟瑞青,女,山东青年政治学院学报编辑部主编,教授,博士,主要从事20世纪中国文学与教育的关系研究;耿聪聪,女,山东青年政治学院文化传播学院学生,主要从事中国当代作家作品研究。

了乡下女人的样子”<sup>[1]</sup>。她们走在大街上,既不是上海人,也不是乡下人,容易让人一看就知道其身份是保姆。

为了生存,“奶奶”们离开家园,作为城市文明与乡村文明的联结者,她们因为漂泊者的身份而失去了一种纯粹的归属。她们努力融入城市,却发现自己根本适应不了城市文化。她们若回归乡村,也因为长期的疏离,而早就失去了原本的根系而被乡村文化环境残忍拒绝。正因如此,“奶奶”才过继了孙子“李天华”,随时做好“告老还乡”,回乡下“颐养天年”的准备。也正因如此,在上海棚户区艰辛生活的舅舅、舅妈从来都把自己看作是上海的外省人,尽管他们已经有了上海居民的身份。

在《上种红菱下种藕》中,王安忆也写了不少外来务工者。主人公秧宝宝迫不得已去温州做生意的父母、神秘的“打工妹”黄久香、每到夜晚就聚集在镇碑路大树下的“江西人”“河南人”……作家写他们的生存遭遇,写他们的“惺惺相惜”,以及他们不被城市接纳的孤独和无奈。这些为了生存而奔波漂泊的底层劳动者们好似在城市中游荡漂离的“鬼魂们”,无着无落,身体和心灵都没有安放之处。

《富萍》中始终以外人身份寄存在他人家的“保姆们”、居住在上海边缘地带的棚户区的居民们……这些为了生活而不得已奔波漂流在外的人,即便社会地位低下,甚至遭到排挤,但仍不卑不亢地面对苦难努力经营好生活的热切,使得她们勤劳、质朴的特点得以放大。原本已被命运定义了归宿的富萍,不服从命运的安排,义无反顾地选择“出走”,哪怕前方是更加艰辛的漂泊旅程。

王安忆写这些外来的女性底层漂泊者们,一方面倾注了自己对她们的同情和关注;另一方面,也欣赏着她们兢兢业业、吃苦耐劳的精神,努力发现她们生命中的闪光点。

## (二)因寻爱而漂泊

因寻爱而漂泊,这里的爱指的是一种精神上的归属和情感上的寄托。与男性相比,女性因为自身性别的特点,更注重生命中细微的情感体

验,对爱情、婚姻的期许和体会要比男性的感受更加复杂和丰富。故而才有“士之耽兮,犹可说也;女之耽兮,不可说也”<sup>[2]</sup>的警训。可即便如此,无数女性在寻爱的过程中依然可能迷失自我,她们会困于现在,惶惑于未来。王安忆遵从现实来写女性的“寻爱”遭遇,以及女性因“寻爱”而开始的无所归依的精神漂泊史。

王安忆在《我看〈情人〉》中曾说,爱情其实是我们漂泊无定的生涯中攀附的立足之地,为我们疲惫紧张无根无望的灵魂寻找归宿,它带有岸的面目。王安忆笔下的不少女性因为爱情而漂泊,在她们看来,爱代表了安全、保障和归宿。可在王安忆看来,爱情并不是女性真正的彼岸,它不过有恰似岸的面目,带有迷惑的性质。短暂的温暖体验过后,女性仍然改变不了要继续漂泊、继续寻觅的命运。

女性寻爱的过程是艰难的,寻爱的过程就是精神漂泊的过程。甚至在拥有了爱情之后,她们也经常因为自己的患得患失,而体会不到爱情带来的温存与美好,从而陷入更加孤独寂寞的处境。《长恨歌》是一部寻爱史,“通读《长恨歌》,每个人的爱情都是那么孤独,而每个人都在以爱情拯救人性的孤独和漂流”<sup>[3]</sup>。《长恨歌》中,主人公王琦瑶身边周旋了无数的男人。从最初的程先生,到连真名都不肯透漏的李主任,再到懦弱无责的康明逊、极度自恋的老克腊,兜兜转转,浮浮沉沉,王琦瑶周旋其中,也深陷其中。

程先生的懦弱与多虑使他对王琦瑶只有爱的想法却没有爱的能力。康明逊虽是绅士,体贴又懂情调,但危难来临时也是只求自保,给予不了王琦瑶应得的名分。极度自恋的老克腊只因为留恋王琦瑶身上的那点旧风情而与之产生“畸形恋”,与其说是爱王琦瑶倒不如说是更爱自己。王琦瑶最终选择了李主任,是因为李主任可以给予她最根本的物质保障和需要。后来李主任飞机失事,王琦瑶失去物质保障,不得已再次踏上寻爱之路。她希望用寻爱来结束自己精神上漂泊无依的处境,但最终却无奈飘浮一生,一直寻爱未果。

《我爱比尔》中的阿三在拥有了比尔的爱情

之后,一直妄图抓住爱情,可比尔一句“不能和共产主义国家的女孩谈恋爱”把阿三与他的界线划分得一清二楚。比尔喜欢的是阿三中国女子的身份,于是,阿三努力将自己塑造成比尔心中中国女人的样子。阿三努力地迎合比尔,在身体和精神方面不断改变自己。这表面上看似是回归中国文化,实则是努力地向西方文化靠拢,她愈是靠拢,比尔便愈是后退。阿三在失去比尔后,偏执地与外国人交往,在寻爱的过程中一步步走向堕落、毁灭。

《富萍》中的富萍也是如此,她最终没有选择寡淡的李天华,而是决定与残疾的年轻人结合。富萍原以为找到了自己爱情的归宿,拥有了稳定安宁的生活。但小说的最后以比较隐晦的方式写富萍怀孕,这也恰恰暗示了富萍为寻爱而付出的代价,富萍与其下一代漂泊的命运不过才刚刚开始。

王安忆试图通过自己笔下的这些女性人物来说明爱情不是女性的归宿,它不过是命运漂流过程中的一条船,带有岸的性质;可事实是女性在停靠后仍要继续漂流,继续寻找,继续无所归依。

### (三)因“独立”而漂泊

传统社会中,男尊女卑、男性主导一切的思想使得女性一直作为男性的附属品而存在。女性不像男性一样独立自由,凡事都要听命、依从于男性,更没有机会外出漂泊。

王安忆所处的时代,女性开始进入社会,不再遵从传统意义上“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的命运指令。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女性意识逐步觉醒,女性在进入社会后为了证明自己的能力,急需物质和精神上的独立,由此就有了因“独立”而漂泊的现实。

但几千年来女性的集体无意识,以及人们对以男权为主的父系社会文化不自觉的认同,外界种种因素对女性群体的约束与改造……这些现实遭遇使得广大女性在进入社会后感受到来自四面八方的“风刀霜剑严相逼”。女性进入社会虽然实现了表面上暂时的“独立”,但根深蒂固的传统思想使得女性仍然作为弱势群体而漂泊在

社会中。

富萍来到上海后见识了崭新的世界,尤其在认识了各色各样的人物后转变了自己的看法。富萍看到奶奶、吕凤仙等人尽管看起来风光体面,但实际上依然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只能默默地服从命运的安排。富萍看到了自己与女学生们生活的根本差异,当她看到爱撒谎的“跟屁虫”拖着一大堆弟弟妹妹时就好像预见到了自己以后的人生。富萍顶着巨大的舆论压力选择离开自己的未婚夫李天华,和一位残疾青年生活在一起……富萍的这一重要抉择遵从了她自己的意愿,她要自己选择生活方式。富萍有觉醒的意识,希望过上自由独立的生活,改变被别人操纵的人生。

与富萍有着相似遭遇的还有《长恨歌》中的王琦瑶以及《我爱比尔》中的阿三。王琦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自食其力,取得了护士资格,并以此谋生。阿三虽然依赖比尔,但她在物质上始终是靠自己的能力,靠卖画为生。尽管如此,生活并没有因为她们的独立觉醒而给予其优渥的待遇。王琦瑶在独立与依赖之间自我挣扎,阿三则在尝试了短暂的独立后选择自暴自弃而走向堕落。

王安忆身为女性特别是知识女性,对整个变革的社会环境的感悟要比普通女性更多。她追求女性的独立,希望女性在生活中同男性一样能找到归属,实现自己的生命价值。她在思索、追问,拷问进入到社会中力求解放的女性是否实现了真正的独立。女性追寻独立的过程实则就是离开原生家庭在外漂泊的过程,这一选择使得女性又陷入了新的生存困境,愈是寻求独立,就愈要学会独自面临生存压力,独自面对漂泊在外的境遇。

现实中男女真正意义上的平等并不存在,女性在追求自我独立时所遭遇的困难和挫折并不能让她们实现真正独立的愿望。不少女性选择看似如娜拉般壮烈地出走,实则多是自身无法控制客观环境和改变自身境遇的无奈之举。她们只能在追求独立中继续漂泊,在漂泊中不断追求独立。

## 二、王安忆文学书写中女性漂泊意识的共性

王安忆作品中的女性,其漂泊境遇有一定的相似性,具体表现为伴随漂泊过程始终的孤独寂寥、个人无法逃离漂泊的宿命、在漂泊过程中对自己的家族文化根系的追根溯源。

### (一)漂泊与孤独

王安忆写漂泊带给人的“孤独”,通过人物生命的遭遇写孤独带给人的生命体验。“她的孤独,是她对普遍生态的感悟、发现与描述,其中饱含着理解与悲悯,由此,她比先锋派充满形而上意味的孤独更平易、更实体化,在对隔离处境的表达中奇异地实现了与民间的无限切近与融合。”<sup>[4]</sup>其小说《纪实与虚构》是作者写自己的一部“孤独史”,孤独体验的最大来源是我“外来者”的身份以及“我”本身脆弱敏感的心灵。

《纪实与虚构》中,作者写未满周岁的“我”随着打着腰鼓扭着秧歌的同志们,坐在火车的痰盂上,跟着母亲一起漂进了上海。来到上海后,母亲“同志”身份的特殊,要求我们不准与弄堂里的世俗市民来往,环境交流的阻隔使我觉得孤独,感觉被周围所抛弃。

母亲明明会上海话,却要求我们用南腔北调的普通话。语言上的隔阂使“我”感到难堪不已。“外来户”身份的自我暗示,在“我”幼小的心灵里投下了阴影。童年的“我”对上海没有任何的归属感,尽管我渴望进入上海,但是“我”并没有把上海当作真正意义上的家园。孤独感一直伴随在“我”的生命历程中。

从始至终,“我”都是作为一个孤独的人而存在。此外,母亲、小五、张先生这些人也是孤独的,他们的孤独是由人与人之间的隔膜造成的,缺乏沟通、彼此隔离,于是人们便陷入自我臆想、自我封闭的状态中,精神上也始终处于放任漂泊的状态。

《长恨歌》中作者写王琦瑶年年岁岁、岁岁年年的寂寞与孤独处境,写上海这座城,写它的世俗与灯红酒绿,及其战争动荡背景下的觥筹交错、兴衰荣辱。王琦瑶的孤独是自己选择的孤独,这孤独是小众的,虽是平常,但却最显示悲剧性。她的无所寄托、无依无靠,从踏进“爱丽丝”

公寓的那刻起就已命中注定。愈是繁华的外境,也就愈彰显出个人精神的无所归依,漂泊孤独。

《我爱比尔》中的女主人公阿三同样是孤独的,只不过她的孤独带着太多自我和极端。阿三是一名画家,她热爱艺术,性格孤僻,后来认识了年轻帅气的美国外交官比尔。阿三是真心爱比尔的,比尔离开后,阿三承受不住失恋的打击,陷入更加孤独的处境。她开始自我否定,开始为恋爱而恋爱,出卖自己的身体,无可救药地堕落下去,活在自我封闭的世界里,抛弃了这个世界,也被这个世界所抛弃。

失落感、寂寥感、沧桑感、萧瑟感,这些都是个人漂泊过程中产生的孤独体验,带有一定的悲剧情蕴。王安忆擅长写孤独,漂泊与孤独是王安忆对于女性漂泊意识书写的一个典型特点。

### (二)漂泊与宿命

命运,是一个带有玄学色彩而又很难阐释清楚的现象,它裹挟着看似永远无法预测但似乎又一切都早已命中注定的神秘面纱,让人们对之既恐惧又敬畏,既畏缩又反抗。古代儒家学说宣讲的“天命观”、古希腊悲剧《俄狄浦斯王》中体现的“宿命观”,似乎都在告诉世人愈是妄图摆脱命运的摆布便愈是深陷其中而遭到命运的戏弄。

正是由于命运的不可预知性和人自身能力的有限性,使得人在命运之中始终处于被动无奈的位置,默默承受着命运带给人的苦难。在王安忆看来,人类没有归宿,漂泊是永恒的,个人逃脱不了命运的戏谑安排。故而对于漂泊的书写,特别是女性漂泊的书写,王安忆往往把其与宿命联系起来。在《伤心太平洋》中,作者指出,漂泊是人类的命运,人类将永远处于不断的漂泊之中。

《长恨歌》中最能体现宿命漂泊的就是主人公王琦瑶这一悲剧人物。综观小说,王琦瑶的命运其实在一开始就已经被预设好了,她的命运从接触“片厂”开始,从看到“片厂”拍戏的那幕场景落幕。

王安忆以“戏”作比喻,颇有象征韵味,暗喻着人生的虚无和不真实。王琦瑶人生如戏、戏如人生般的命运,一切不过皆是虚妄的存在,如泡影、浮云般到头来竟是一场空。这无疑给人一种

苍白和凄凉的感觉,加强了宿命感和悲剧的意味,让人为之叹惋、感伤。

小说以《长恨歌》作为题目也颇有暗示之意,“那一句‘玉容寂寞泪阑干,梨花一枝春带雨’却是《长恨歌》中,杨贵妃玉殒香消,魂魄在了仙山的情景。阿二不由生出悲戚来,他想起的美人图,全是不幸的美人图,正应了红颜薄命的说法。”<sup>[5]</sup>自古“红颜薄命”,萦绕在王琦瑶身上的也是美人薄命的不幸气息。

上海在改变,王琦瑶也在改变,但这改变是被动的,入不了时代变迁的法眼。王琦瑶似乎难逃宿命,历经沉浮、几经辗转,一颗漂泊无依的心始终没有归处,开始如此,结局仍是如此。

王安忆在作品中描述的保姆们也是如此。保姆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符号和象征,连接着上海与其他地方的文化。她们自出生时起,就逃离不了命运的预设,世世代代的传统延续下来,就好像有了一个生来就要做保姆的使命,也似乎注定了个体势必漂泊在外的命运。

宿命般的人生使个体生命均无法逃离命运早已织好的天网,这些意识都彰显在王安忆对女性漂泊意识书写的作品中。

### (三)漂泊与寻根

以往的中国文化不论是历史的纪实还是文学的虚构,都以男性为中心。在以男性为主导的民族文化中,女性很难找到自己的精神归栖之地。即使是在养育自己的故乡,哺育自己的家庭,女性始终要嫁作他人妇的命运也让她们很难找到系根之地。

女性漂泊不同于男性漂泊,男性漂泊是有历史文化传统的,而女性在古代史上没有外出漂泊的机会,这使得她们始终作为“深闺者”的形象而存在。历史留给她们的标签只是等待和守望,女性寻根却无根,这就决定了女性在精神上得不到如男性一样以故土文化为自己血脉根源的安全感。

在《纪实与虚构》中,幼年的“我”随母亲从江浙移居上海,在上海生活一段时间后,深切感到自己与上海本地人的差异。王安忆及其家庭一系列的生活经历,使得她试图为自己寻找一个恰

当的归宿,让自己能在上海这座城市落地生根。“家族神话是一种壮丽的遗产,是一个家庭的文化与精神的财富,记录了家族的起源。”<sup>[6]</sup>仿似“黑夜里的火把,照亮了生命历久不疲的行程。”<sup>[6]</sup>王安忆描写“我”的邻居小男孩家隆重繁琐的祭祖仪式,祭祖寻根这一古老的文化仪式看似与这座现代化大都市极不协调,但从王安忆字里行间的描写中依然可以感到她对小男孩家庭这种传统仪式的羡慕。作者在文本中自我探求、追本溯源,回归到家族历史,去努力追寻自己家族文化血脉的根系。

作者想从追寻自我家族的历史中找到自己的根系,结束这种精神上的漂泊无依状态,但到头来却发现,自己的祖先不论是母系家族还是父系家族在历史中也是处于长期漂泊的状态。

王安忆通过无根、寻根、寻根未果、依然寻根等一系列的书写创作,把漂泊与寻根相连接,不论是对家族文化的追根还是对民族文化的溯源,她一直没有停下探寻的脚步。

### 三、王安忆文学创作中女性漂泊意识形成的缘由

#### (一)作家主体因素

上海对王安忆来说,无论怎样都不是其灵魂与心灵可以驻足的地方。王安忆对于上海而言,也仅仅是一个“寄宿者”的身份。1954年出生的王安忆,在不满周岁时便随母亲迁至上海。作为一个孩子,幼小的王安忆所表现出来的与这个城市想要热切融为一体的愿望被一次又一次打击,所居弄堂里发生的所有或新奇或平淡的事都与她没有关系,她根本无法真正参与其中。

这种童年时期形成的性格让她对上海这座城市始终持着疑惧的态度与观望的距离,她对自己的身份认同也始终抱着“不确定性”的认知态度。作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外来户,似乎没有一种确切的身份来证明王安忆的存在。王安忆所感受到的人情与世态都让她有一种深刻的疑惧,自身外来者的身份,使她没有办法真正接近上海这所现代化都市的灵魂。

所谓上海的真正灵魂正是植根于弄堂、石库门里,植根于真真正正的小市民的衣食住行、言

行举止当中。尽管生活在上海,因为生活环境和文化的差异,王安忆对上海这座城市灵魂的这些精髓并未真正熟知与了解。

此外,王安忆的作品之所以有浓重的漂泊意识,在很大程度上带有作家自我主体意识的投射,这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无根”意识。在王安忆的观念中,城市人是没有根的,她据此创作了《纪实与虚构》,在现实和历史的接轨之处以一种虚构的方式重塑了现代城市人的历史。

王安忆写漂泊、写寻根,这不仅仅只是其自身生命体验的真切感受,还是她通过虚构和想象来满足对现实的弥补所获得的精神上的自我慰藉。王安忆重视家族文化的血脉渊源,但现实生活中无法摆脱的漂泊感使她对家族文化根系的追寻达到了热切甚至偏执的程度。

正是因为创作主体具有强烈又清醒的文化观,才会在自己缺失这种文化元素的基础上通过强烈的诉求来实现,由此可见,王安忆作品中的漂泊意识不仅有现实的因素,也带有作者理想的成分,具有独特的意义。

除了创作主体强烈的无根意识之外,这种诉求还表现在作者选择了漂泊的另一种隐性形式——写作。

在《纪实与虚构》中,王安忆提及成年后的“我”走上了写作的道路,认为写作的过程实则就是在自我反思、自我对话、营造自我空间体验的过程。王安忆热爱写作,对她来说,“书写真是一件快事,它使一张白纸改变了虚空的面貌,同时也充实了我们空洞的心灵”<sup>[7]</sup>。王安忆自小敏感细腻,对生活的体验关照更是感触深刻。她多思善感的性格加上漂泊不定的生活经历使得孤独感和宿命感时常萦绕其身。王安忆意图通过写作这种形式把现实中无法纾解与排遣的矛盾心理转移,甚至通过写作来弥补现实的缺憾。但其实写作本身就是一种精神上持续漂泊的过程,写作过程中精神漂泊所获得的体验与感受甚至比现实生活中的无所依靠还要壮烈与彻底。

1990年代的都市充斥着光怪陆离与人情冷暖,“漂泊”已经成为一个被普遍认可的社会名词。王安忆1990年代曾旅美游学,异国漂泊的体

验,使她站在人类的制高点上,以一个作家应具备的人文关怀来俯视全球化背景下整个人类的漂泊命运。她通过写作来关照时代巨变下的个人,通过对普通人生活经历的描写来展现漂泊,王安忆选择了写作也就选择了漂泊,写作的过程也是她精神上虚拟漂泊的过程。

## (二)客观外界因素

王安忆描写漂泊意识的作品中,给人漂泊体验最明显的就是上海这座城市顽固的排外性。上海作为东西方文化交融的中心,应当随着时代的发展更具兼容并包性。但直至今日,上海的排外性,仍作为一个典型的地域文化标识而存在。

一个地方所产生的地域文化与其所受传统文化的熏陶感染有关,儒家文化讲究“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故而成就了“好客山东”。上海独特的文化精髓使得大部分本地上海人对外来人口持有巨大的排斥性,不管是居于经济优势的上层还是处于底层的小市民阶层。

作为一座现代化大都市,高级人才的引入和外来务工者的加入,势必要与居于上海的本地人争夺宝贵的发展资源和机会。上海人对于这些人的蜂拥而入既惶恐又憎恶,倘若与迁入的人相比,自身没有可与其竞争的优势,那么,上海人居于劣势的处境势必会让他们以宝贵的上海居民户籍身份来压制与反抗这一现象。从根本上来讲,这应当属于一种对自我及文化不自信的表现,对自身文化的不自信导致其要摧毁别人的自信,这是一种消极的文化心理。传统意义上的上海文化,是由小市民阶层的言行举止、衣食住行构成的。即便是上海的作家,譬如张爱玲,她写上海,也对上海狭隘的小市民观和精明的市井文化持或隐或显的讽刺态度。上海顽固的排外性是一种延续下来的地域文化心理,这种心理表现愈明显也就愈使漂泊在上海的外地人感受愈深刻,漂泊在上海的情感体验也就愈复杂。

20世纪90年代,产业社会化和消费社会化使得宗法制社会迅速解体,传统文化中建构的信念、坚守、理想、道义等文化风尚逐渐被急功近利、欲望膨胀、物质享受所取代,血缘、亲情、文化根系在人们的意识中逐渐淡漠。

这种以经济效益为中心的时代也出现了一系列问题,数以万计的农民工从讲究人情世态的乡村漂泊到追逐经济利润的大都市。农民工离开乡村涌向发达城市所遭遇的现代化冲击是无法避免的,他们在城市中感受到的是人情世态的炎凉与淡漠、自身与家族文化血脉根系的脱离、异地漂泊的无归属感、孤独感……

1990年代的时代巨变,使得文学也在很大程度上沾染上了商业元素,“文人下海”“文人经商”等一系列文化现象使文学的地位从正统与中心滑到了边缘位置,以王朔为代表的痞子文学对正统的精英文学的嘲弄足以看出经典文学正遭受着史无前例的挑战。

在时代的发展过程中,社会中的人总是被不断发展的文明所异化,这也使作家产生了对于社会与人生的思考。时代是反映作家创作的一面镜子,同样,作家作品也在某种程度上与前者存在着相互渗透的意义,王安忆具有“漂泊”意识的作品,便具有这方面的意义与价值。

总之,随着创作水平的提升和思想意识的深化,王安忆在1990年代的创作不仅在创作方法和风格上有所改变,而且也开始进入到对女性自我进行深入认识和剖析的阶段,开始把目光投向女性的精神和灵魂领域。1990年代后王安忆的文学创作,一直有一种无所归依的漂泊意识潜藏其中,这对王安忆来说是个突破性的探索。

#### [参考文献]

- [1] 王安忆. 富萍[M]. 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00:4.
- [2] 朱东润. 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C].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7.
- [3] 王茜茜. 论王安忆[M].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77.
- [4] 王向东. 孤独城堡的构建与冲决——论王安忆小说的孤独主题[J]. 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1999(2):23-28.
- [5] 王安忆. 长恨歌[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132.
- [6] 王安忆. 纪实与虚构[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49.
- [7] 王安忆. 米尼[M]. 北京:作家出版社,1996:372.

## On the Female Consciousness of Wandering in Wang Anyi's Creation after 1990s

ZHAI Rui-qing, GENG Cong-cong

(Shandong Youth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Jinan 250103, China)

**Abstract:** After entering the 1990s, Wang Anyi began to explore the spiritual belonging of women's self in her literary creation. The experience of female characters in her works always had a sense of wandering without any belonging. These women travel in different ways, but there are many similarities. As for the reason, Wang Anyi's own experience and the exclusiveness of Shanghai culture all contribute to the formation of the writer's strong sense of wandering.

**Key words:** the 1990s; Wang Anyi's creation; women's wandering consciousness

(责任编辑 赵莉萍)